

中國 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著

新生命書局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931

新生命書局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二 全書一冊——實價大洋

2.00

二

版權所有

著作者：——

嚴 靈 峯

發行者：——上海海甯路傳薪里

新 生 命 書 局

翻印必究

印刷者：——上海林肯路一〇〇號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卅日初版

序言

序 言

兩三年來由革命的挫敗，致陷羣衆運動於消沉狀態；一般找不着正確出路，同時又不願意找正確出路的知識分子、文丐們，因為對自己的悲觀，對統治者的失望，進到憤懣怨恨，至而組合了不少所謂社會運動之思想的集團，一般自矢爲『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擔負者與宣傳家；於是乎，叫囂東西，奔突南北，大有壟斷文化市場，造成在中國出版界中之清一色的勢力與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些先生們的努力與活動并非沒有結果和意義的，他們曾經在此項運動中睥睨一時，且向着許多革命青年撒播了不少錯誤而不可救藥的觀點。

毫不足怪的，在反革命的歷史階段中，只有在革命的反面，或者是介乎革

命與反革命階級之間的投機，狡猾分子會達到勝利者的地位；而這般自恃太過的知識分子，一時的得勢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不僅不是偶發的，而且是歷史上無有例外的！

自然，在這樣可悲的歷史條件之下的中國，那有不使『醉眼矇矓』的魯迅，可『赤』可『慈』的蔣光赤，不生不死的郁達夫，『共產主義』式文氓的潘漢年，國家主義式俗界大王的田漢，高等騙子的周全平（他因為發現了『革命高潮』的真理，於是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擔任所謂全國蘇維埃大會的主席團，紅色救濟會的重要工作；以後又發現了『革命退潮』的真理，捲去了紅色救濟會的經費一萬多元逃之夭夭，溜之大吉！），都可以成爲，并且也已成馬克思主義（？）『文化運動』之最重要的作用與所謂鬥爭健將。聚蚊尙可成雷，這樣，牛鬼蛇神的總匯合，安得不造成一個出版界籠罩着五里雲霧的黑暗世界，真理也因此被跳梁的小醜們禁錮到九幽十八獄底下去了。

諸如此類的人物和脚色，他們之武斷與滑稽不但由於他們的淺薄無知而且起於他們的卑鄙齷齪。在『新修正派』的『虛偽』馬克思主義旗幟掩蔽之下，羣小們既可『彈冠相慶』，於是『名利薰心』的一般『名流』也者，或正在企望做一個『赤色名流』的人們，便十分巧妙地運用其神秘的『斂財術』，在『文化事業』的美名底下實現個己『惟錢是務』的目的。我們試一窺探今日的出版界，『想』做中國恩格斯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著者郭沫若；『想』做中國列寧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的著者朱新繁，便是這一類文化運動家最典型的代表者！在各種刊物上，從布爾塞維克到紅旗，由新思潮至文化鬪爭；都是極力宣揚行屍走肉的布哈林機械論哲學體系，史達林的民族保守主義，馬爾丁洛夫的孟雪維克政策；因此，便形成了一種臭氣薰天，令人酸鼻之惡濁的反動思潮，狂也似的向着革命的真理加以不顧惜地修正、曲解、改竄和閹割。此之謂『文化運動』；結果，祇不過成爲『銀樣蠟槍頭』，在歷史的事變和社會實際的生活不可克制的現

實而偉大的革命創造性面前，通通地淹死，沒落，破產，沉淪下去了。

當此，異端邪說有如洪水橫流支配天下的緊急關頭，別開生面的動力雜誌就在這樣複雜而惡劣的環境之下產生了；這個刊物的出世，決不是偶然的，或由於動力社幾個人自由意志和願望創辦的；牠是現社會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之真實的產物！牠不僅要與所有一切唯心派、機械的物觀派、人權派，等等進行有肉有血的思想鬥爭，並且第一步便給那橫行霸道的馬克思主義『新修正派』的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牠不僅從經濟的分析上，證明他們理論的庸俗與乖謬，並且從哲學的基礎上，推翻他們機械論的系統。牠的歷史意義之重大與挽救馬克思主義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前途是息息相關的！

世界未見光明，動力竟遭了無辜的摧殘至於停止出版；這是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一個莫大的損失！

二

本小冊子便是作者集動力雜誌上第一、第二兩期內所發表過的兩篇經濟論文和一篇未發表過的『我們的反批評』三篇而成的。在這幾篇論文中的意見與論點，也不是作者一時的創作，牠是由許多革命教訓及歷史事實所淘治過的個人之思想的結晶。牠腹稿差不多有兩年的光景，因為，當時尚在國外，沒有機會接近實踐的中國社會生活，不能得到實際的材料來證驗自己的見解；更因為在當地受着許多冷虐的政治限制，於是使不會把這些意見比較有系統地用文字發表出來。一九二九年回來上海以後，經過半年的實際觀察，第一次便在去年三月間寫就一篇『中國××黨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批評』的長文內，發表過對中國問題的見解與主張。沒有享受自由的我們，以致這篇論文直到今天還得不到與革命讀者相見的機會。這篇論文不但對於『新修正派』理論有嚴格的批評并且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階段問題也有過詳盡的論列。至於本小冊子的三篇論文中的中心思想，還是根據這裏來的，也可說是這篇論文之較有條理的擴充罷了。

若說到內容方面，三篇中雖是用分述的形式，但彼此間却有個順序的連繫；第一篇，批評『新修正派』機關報布爾塞維克月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與曲解，並對新思潮雜誌一蹋糊塗的誤謬議論有過簡略的指摘。中間概論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指出目前的支配全社會的生產關係，以及國際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前途之間的相互關係。第二篇即對於這些問題作更進一步的敘述，指明城市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農村階級分化的劇烈，更進於方法論上列舉『新修正派』對於判別歷史階段，革命性質，階級作用，以至對於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土地關係等等的不瞭解。第三篇前半係答覆『新修正派』人們對上述兩篇論文之零碎的和斷章取義的造謠、中傷、謾罵和誤解；中間特別在說明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相互間關係中，提到蘇聯的經濟結構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問題。後半則是答覆一些『冒充』所謂『革命派左(?)翼』的任某等人，在他們到處『分送』的中國經濟研究的第一卷中對我們之無

來由與無常識的瞎鬧。本來這類不值一笑的無方法的『胡柴著述』可以置之不問，可是牠在淆亂是非的作用上，是深隱着陰毒的反革命性！因此，我們不得不在他們這個『自信』爲『偉大』的著作『緒論』出版當頭作個『一斑窺豹』的工作，并對他們的詭計以無情的揭穿！至於他們以後在其『大』的計畫中五大卷加上幾個小卷是否可以實現，以及我們是否再把寶貴的光陰浪費在閱讀這類『襲人牙慧』而又冒稱『建立』的理論上面，大概此時總可預料到一大半呢！

因爲，我們在經濟分析上與『新修正派』有截然不同的方法，所以，必然在結論上有種種對立的意見，這種對立性乃是辯證唯物論與機械唯物論之間對立的表現。現在把我們與『新修正派』之間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上幾個不同的重要結論列舉於後，務使革命的讀者有深刻的認識與判別：

I. 『新修正派』的結論：

1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是封建制度的生產關係居支配地位，中國社會內

部主要的統治者是封建的軍閥和封建的地主階級；換言之，中國目前是封建社會。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維持封建勢力，阻礙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

3 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強大、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發展，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不能發展。

4 中國農村階級的分化係由於有嚴酷的剝削關係。

5 中國的土地革命不能超過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範圍，因為這是革命主要的『客觀任務』之一。革命的性質是由『客觀任務』來決定的。

II. 我們的結論：

1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雖是複雜，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是居領導（亦即支配）的地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於資本主義生

產方法的經濟部門之再生產行程的。中國社會內部主要的統治者是資產階級，他們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勢力爲其後盾，換言之，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向着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但在國際生產力發展與民族界限發生衝突的條件之下，帝國主義要排擠中國的民族企業，操縱整個國民經濟命脈，使之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

3 因爲，帝國主義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直接因素，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有造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條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一般社會發展公律而發展的，并且現在還是繼續發展着。

4 中國農村階級的分化係由於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農村，不斷地瓦解和

侵蝕自然經濟的結果。正確地說，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

5 中國的地主與城市資產階級是不能分離的。城市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也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並且要推翻資產階級以至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因此，這個革命必然要超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革命的性質是由於社會階級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

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結論，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以自行比較的。

三

現在來簡略的一說，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中一些關於方法論上的意見，以作我們後此研究的指針與向一般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同道者以小小的貢獻。

我們認為，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之先，必需注意下面各點：

第一，必要懂得辯證的科學方法之應用於實際的研究上，以及對於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基本知識的深刻了解。沒有這些基本方法和知識，那可說談不上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

第二，要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考察各分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生，發展，變遷之具體事實，來截驗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是否切合實際，是否可以適用於一般國家。

第三，認識了科學社會主義一般理論之真理性，實際性和革命性，那末，便可採用這個體系的研究方法和經濟理論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

第四，在中國的經濟研究中，首先必需考察到，是否發現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基本現象：資本、賃銀勞動、商品、交換、生產集中、階級分化、無政府狀態、危機等等。由於這些抽象的認識，進而從事具體材料的搜集，來印證一般的抽象理論。

這樣，

1 要拿實際事實來證明在中國社會內是否具備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前提：原始積累、自由勞動者、生產原料、技術等等；并考察這些條件的來源。

2 歷史的條件：資本主義前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社會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如何的作用。

3 外圍的條件：國際帝國主義以及其他有關係的國家和自然環境：即天然富源、河流、山岳、土地肥沃、海洋、氣候等等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處於若何的位置。

第五，既發現了中國社會係依照一般社會進化的發展，同時又考察了許多複雜的條件對於這個發展過程的作用和影響；於是便可分析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把牠分解為幾個主要的經濟成分，找尋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的領導全部經濟

生活，支配整個社會再生產行程的經濟成分；更從國家制度方面，考察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這樣，便可確定中國社會發展在目前是達到那一個階段。

此外，在方法上，不但要注意歷史上的連續性，並且要注意邏輯上的聯繫性；不但要注意事物的形式，並且要注意實在的內容；不但要注意社會外表的具體現象，並且要注意社會內在的抽象公律。在整個社會進化過程中、國際關係中，不僅要把握從質量到數量的轉變，並且還要把握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在一般法則的認識中去理解其發展的歷史性、必然性和規律性，在特殊條件的認識中去理解其發展之畸形性變態性、和不平衡性；這樣，也只有這樣，然後纔可以領略和考究中國經濟實際狀況的全面，纔能辯證地瞭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四

最後，作者要來對於這小冊子本身說幾句話；大家知道的，這小冊子僅僅

是三篇『論戰體』的經濟論文，並不是什麼巨大的系統著作。在數量上既不能滿足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一般讀者的要求；在質量上還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如：材料搜集的不充分，偏於理論上對『新修正派』的消極批評等等。但是，讀者自會原諒的，因為作者這些論文，是受不少困難的環境、苛刻的條件、倉卒的時間種種限制的，牠只是在中國思想舞台上第一次公開地向『新修正派』一流人開始宣戰；牠也可說是我們工作的『發端』；其進步與完成，則還有待於作者今後實踐社會生活的經驗與未來具體歷史的事變來充實這部思想活動和工作的內容。牠雖只是作者個人目前對於社會的一些微弱的貢獻，然而，牠的歷史的和革命的意義也是不能與以忽視和抹煞的！

固然，誰也不應，並且也不該僭越、武斷、妄自誇張自己的『偉大』與『正確』，這只有最流俗而鹵薄的學問家纔會做出如此『蠢事』來！

我們以為，與其說，『十分正確』，毋寧說還有不少缺點；與其相信，某部

分工作業已完成，毋寧進一步，從頭到尾再加一番深刻的研究。

偉大的歷史大事變——社會主義革命，不是跟隨我們的後面，而是站在我們的前頭；艱難困苦的任務，不但蘊蓄着火與劍的光芒，同時還飽滿着肉與血的成分。政治的和經濟的鬥爭與思想的鬥爭是分不開的！『精神武器』不但在已往的經驗中現在的搏戰中去鍛鍊，并且要充分準備在將來的事變中試探自己犀利的鋒芒！革命是一切行動和思想的『試金石』，革命理論不但取自豐富的革命經驗之中，而且必要溶化於革命的實踐活動之中！

這裏要附帶向讀者申說一句：作者現在正擬預定一兩年內專門從事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工作；其成功與否不但依賴客觀的環境與個人的心力，并且還厚望於國內外高明的經濟研究家和革命的讀者，能夠供給以必要的實際材料；及不斷地與以有益於革命的指示和批評！

人類固是周圍環境的產物，然而，能夠改造環境的却惟人類！只有，努力

的創造者必定會在一切創造中去努力呵！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於上海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目次

自序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一

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六一

我們的反批評…………… 一五八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解題

不幸得很！同時又是對不起得很！我們竟從開口閉口「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雜誌上，找出一個想不到的疑題；這疑題便是新思潮社諸君，「誠懇地希望全國的青年學生之踴躍的投稿」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我們將相信雖然這樣的一個題目，會有許多青年朋友，在未看清題目之前便把文章做好的。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我們知道，形式邏輯

中有這一個最通用的公式：『是——是和否——否。』在這一點上，便充分的證明了，新思潮社的根本精神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為他們不會在具體的研究問題當中提出這樣的公式：『是——否和否——是。』假使拋棄『辯證法』觀點的人來談馬克思主義，不消說會把馬克思主義壓縮在『機械唯物論』的圍欄內，使它消失一切革命內容！

自然，被列甯斥為『不懂辯證法』的布哈林之門徒們在中國問題上，不但過去，或現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個題目，陷於機械唯物論觀點，即在將來，我們此地尚可預言，必定還有許多像新思潮一類的作家，將機械的舉出許多『孤立』而『個別』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和責難我們。因為他們的聰明處就在只知機械的應用經驗；經驗論者又像螞蟻一樣，他們只知搜集材料，隨後貯存起來，加以消耗便算滿足；他們不懂得先將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人工造作然後再來消耗，因此，始終是『食古不化』！這便是機械唯物論的特徵，我們發覺了在中

國思想界中會有這樣一個掛「馬克思主義」旗幟而其實是機械論本質的哲學體系之後，我們要探求這個體系思想上的病源便覺容易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應明確地向讀者諸君指出的。

現在再談到「題目」。

爲什麼新思潮雜誌那樣的提出問題，乃非馬克思主義，非辯證法的提出呢？

假使大家不是「機械」地了解問題，那便很容易懂得馬克思主義的ABC。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序言中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就是說，社會之經濟結構如何，要看社會內部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如何而定。但是社會愈發展，則其所存留在社會內部的各種生產關係也愈複雜。這是歷史上的事實。自然，更沒有「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或「單純」的封建制度經濟。

列甯說：

『現在俄國有各別的社會經濟層次的諸成分……』

1. 家長制的經濟；即大部分自給的農民經濟；

2. 小規模的商品生產（這裏大部分屬於出賣麵包的農民）；

3. 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

4. 國家資本主義；

5. 社會主義。

『這樣龐大和這樣雜色的俄國，所有這些社會經濟層次的各別形式在境內是交相錯綜的。這正是特別的情形。』

『若問到底那一種的成分佔優勢呢？很顯然的事體，在小農佔優勢的國境內，也不能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要素佔優勢；多數和大多數的農夫就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列甯全集第十五卷P. 二六四）

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尚有五種經濟成分的存在，這便證明蘇聯境內生產的關係不只一種或兩種。我們能否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假使這樣的提出問題，乃是以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形式邏輯來嘲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為俄國除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外還有自給的家長制經濟等等。俄國可以說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為在國際範圍內是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的地位，并且境內還有資本主義成分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經濟；俄國可以說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因為無產階級業已取得政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領導的地位。

中國生產關係的複雜當不亞於俄國；這當然，經濟的結構也不會像新思潮諸君所想的那樣簡單，以為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便是封建制度經濟，我們從其機械的系統中看來，也許新思潮諸君在新思潮雜誌第五、第六期上會有這樣的論文出現，即論文的結論是：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近似於這種結論的。

但是，我們是否因為新思潮社之無馬克思主義常識的提出問題，我們就不做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文章呢？不，決不！不過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因此，我們不得不換一個題目，以免馬克思主義無辜遭人糟踐！我們在下面就開始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先了解一般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序言中，曾說：

『在一般說來，可以從亞洲的、上古的、封建的、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為社會經濟進步的各時代。』

這就是說，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必須適應於各種生產方式。

生產方式對於社會形式關係具體的表現怎樣呢？

馬克思又說：

『社會關係都是與生產力有密切聯結的。人類獲得新生產力時，即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而由生產方式，和謀生方式的改變，同時他們所有的社會關係也要改變的。用手推的磨子產生了封建主的社會，用蒸汽的磨子就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哲學之貧困)

因此，生產方式的改變主要的就是表現於技術的改變。『由於新武器——銃礮——的發明，那軍隊內部的組織隨着全部改變，并且各軍隊間之彼此相互關係也同樣起了變化的。』(馬克思著，工資勞動與資本)

所以，我們要劃分社會發展的各階段，必須從事於研究歷史的各時代所採用的勞動工具如何？馬克斯說：

『骨骼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的動物的組織，有重大的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有同樣的重大意義。』(資本

論第一卷，第三編，第十章。）

我們先從一般的生產方式來研究中國經濟的結構罷。

一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顯然地受着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雖然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然始終不只一種『單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的。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中——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遺跡，與其他形形色色異常複雜的封建殘餘，這是很明顯的。技術程度與經濟形式的複雜，實比革命前的俄國更爲厲害，新式技術最近的設備與洪荒時代的生產工具同時并存——有製造龐大汽船的造船塢，製電泡的工廠，以最高程度機械化的玻璃工廠，與那千百萬從前時期遺傳下來的木織機同時并用；有飛機、汽船、汽車，亦有馬車、人力車、粗笨的單輪車；有用木頭造成的犁鋤，與古代

的水車，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還用電機的。

由上面生產技術的複雜自然反映社會內部有各種各式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層次。我們可說，從資本主義前期的原始家長制經濟，中世紀奴隸關係的殘餘，到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又從各種非常複雜形式的手工業，到標本形式的手工廠，再到新式工業與最後階級的財政資本。

這裏的複雜狀況，簡直令人目迷五色，我們又怎麼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呢？

但是，我們此地也不妨依照列甯的方法，把現在中國各別的社會經濟層次的諸成分分別列舉於下：

1. 原始家長制的自給經濟（爲自己生產的牧畜和農耕等）；
2. 小規模的單純商品生產（農民的穀物商品的生產，農業副業的商品生產，手工業的商品生產等）；

3. 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包括外國的、本國的和中外資本家合資經營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為基礎的工商業資本）；

4. 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經營的鑛山、鐵道和其他交通機關）。

若問中國現在到底是那一種成分佔優勢呢？我們也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
小資產階階的要素佔優勢；多數和大多數的農夫就是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

那末，我們答覆了一切問題嗎？沒有的，我們必需進一步來研究在中國境內現時，到底是那一種的社會經濟成分居『領導』的地位；然後我們纔能了解中國社會經濟上中心的問題。

可是，在我們尚未確定，那一種經濟成分佔統治地位之前，有許多重要和已經爭論的問題必須提前解決的。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的民粹派，以缺乏國內市場的論據，認定俄國資本主義的衰落；不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機械論者，也以帝國主義只是取得中國商品市場，保持封建勢力的論據，來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此間相去歷史的篇幅雖不到一世紀，然而，我們的時代乃帝國主義的時代，竟有馬克思主義的不肖門徒的反動思想與前世紀的民粹派後先輝映呢！

a.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之理論上的根據。

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便已說這：

『資產階級既激急的改良了生產工具，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把所有一切，甚至於野蠻的人民都推入於文明的道路上了。那價廉物美射擊力，即中國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極端排外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降服了。世界各國爲要免得滅亡的運命，也只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牠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就是要把自己也變成資本家。』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將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這段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幾點：

第一，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造成了國際交換關係。

第二，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商品輸入野蠻民族的國家，將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勢力。

第三，落後的民族要圖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照先進國的模型發展。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新修正派』，怎樣地修改了這個意見呢？他說：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李立三）

很顯然地，列寧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和馬克思一樣，不從各國家分離的

發展來看，而是站在整個世界立場上來考察。他說：

「這樣看來，找尋國外市場之必要……是很明顯地表現着資本主義之前進的歷史任務，牠破壞了舊時經濟制度之獨立與閉塞（同時也就破壞了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牠把世界上的全體國家聯結成爲整個的經濟單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列甯這裏更明顯地指出，資本主義之前進的歷史任務，不但要破壞舊時獨立和閉塞的經濟制度，并且同時還要破壞了在這種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換句話說，同時還要破壞舊時的社會制度。

這樣便證明，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勢力乃是無稽之談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修正！

實際上，自從世界歷史發展到新階段——帝國主義時代，恰恰相反，不但保持封建勢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列甯說：

『帝國主義是經濟發展到這樣階段的資本主義，即在這個階段中，壟斷與財政資本已獲得統治地位，資本輸出有極重大的意義；國際托拉斯已開始瓜分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對於全地球的幅員已分割完竣。』（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我們在這裏只限於指出重要而關於本題的三點：

第一，依列甯的意見，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國家都捲入資本主義的漩渦。

第二，財政資本已獲得統治的地位。這就是說，統治今日世界的已非單純的工業資本主義。

第三，資本的輸出已成爲非常重要的事實。

這裏的論據應用到中國來的，便可得到如下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使中國經濟加入於國際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的經濟統治權必定操

之有財政資本的帝國主義列強之手；帝國主義在中國不但輸入商品，并且還要輸入資本。列甯還說：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民族問題）

這裏也正是指出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就是說，資本主義先進國在與殖民地只是進行商品貿易的時期，在殖民地尙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因資本的輸出而引起殖民地極迅速地發生資本主義生產，這是說，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更不能排脫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

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這樣，起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在中國只是起了破壞中國農村經濟的作用，反使中國經濟趨於停滯狀況，自從建築鐵路和資本主義生產技術搬到中國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初，帝

國主義的資本輸入直到現在都是促進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過這種發展，不是趨向民族工業完全獨立的道路發展而是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發展。就是說，中國發展經濟的真正領導權不是操之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手，而是操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手裏。民族資產階級只是處於或多或少買辦的地位而依靠於強力的外國財政資本家。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祇是相對地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而是絕對地要在他們領導之下，使中國向着更殖民地化的方面推動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前進。而成爲宗主國經濟不可分離的部分。不然，近代帝國主義之把「輸出商品」變爲「輸出資本」的話便失去意義。這就是從數量傳變到質量之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在殖民地國家內，外國資本的企業常比本國資本的企業爲多。然而，不管企業的主人是誰，其在這個領土內的鐵路，工廠，礦山等等之加多，無產階級勢力的發展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經濟不平衡的發展爲資本主義世界絕對的公律。」（列甯）

使殖民地在曲綫的道路上以達到發展。

修正派的意見怎樣呢？恰恰和馬克思、列甯相反。他說：

「因為這些資本輸到中國來，差不多完全爲着榨取原料（建設初步製造原料的工廠）或者用在擴大交通，（現在美國的投資就是這樣）藉以便利商品與原料的運輸，加緊對中國的束縛。」（李立三）

看罷！『建設初步製造的原料工廠』，這都不是工廠，都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而是『原料』！不是『工廠』！因為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不是中國資本家開辦的，因此，這樣的工廠爲的『榨取原料』？！

列甯的帝國主義的理論經過了修正派的曲解，便成爲不可思議的庸俗理論了。列甯說：『而資本輸出可造成了許多後進國也踏進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去；在後進國中，最重要的鐵道都已敷設或正在敷設之中；工業發展的根本諸條件都已經確立而存在了。』（帝國主義）呵！這是『便於商品與原料的運輸』

呀！『現在美國的投資就是這樣』！中國可以便不便呢？縱使中國人不能享用美國人所擴大的交通機關，然畢竟『交通』在中國地域內『擴大』了。列甯繼續又說：『資本輸出影響輸入資本的國家資本主義之發展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發展。所以，資本輸出底國家的發展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與尖銳化。』（同書）他又說：『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經濟基礎之一。』列甯這意見不適用於有特殊情形半殖民地的中國麼？恰恰中國又是『後進國』，而『輸入資本的國家』！

由上面研究結果，我們可說，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的資本與技術推動之下，資本主義的生產可向前發展，但是，要在帝國主義經濟支配之下，而更趨於殖民地化。

b. 事實上又怎樣呢？

中國社會長時期是沉澱在半封建制度，和商業資本長期侵蝕的進化過程之

中。這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不曾起過轟轟烈烈的技術革命，因此，商業資本雖然發達，然始終不能轉變爲工業資本，祇是在農村中不斷地削弱封建制度的基礎。到了中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接觸之後，外國的商品便不斷地深入中國農村更加速了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破產的過程，而擴大了農村階級的分化。然而在廉價商品輸入的初期，也只是一般輕工業的商品罷了。這時期內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作用，不但不能夠發展中國經濟，并且用他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關係，使民衆中間發生了異常的變化。自從鐵道建築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纔開始發展。固然，鐵道的建設最初還是爲帝國主義運輸商品，然而，因爲建設鐵道的工程不得不輸入種種進步技術，繼而開採鑛山籌設工廠等等，都是帝國主義輸進新式技術之後纔有可能的。有了新式技術的幫助和中國的廉價勞動與豐富的自然富源，不管原始積累的薄弱，總能多多少少地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萌芽發葉。在一八九五年英國人在上海的紡織工廠達七萬二千錠和七

百架紡織機；在一八九六年，工廠的設立就到了九萬六千錠和九百八十架紡績機，基金已達五百萬元。一八九七年成立上海工廠有四萬五千錠和四百四十六架紡績機，基金一百五十萬元；一八九九年成立了『東洋』工廠，有五萬二千錠。在這個時期內有五個英國工廠，共有三十萬錠，紡績機三千架。近代工業的開始最先是在上海。上海成爲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

我們現在試舉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受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的障礙而不能發展呢？

1. 中國大工業機器進口的增長

年 代	機器價額
一九一三	四、六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〇	一二、三〇〇、〇〇〇兩

以上是各種工業機器的。

年 代	機器價額
一九一三	一一二、〇〇〇兩
一九一六	二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一	二、〇〇〇、〇〇〇兩

以上是屬於農村的機器，一九二一年特別是從美國來的獨多。

年 代	機器價額
一九一八	六四六、〇〇〇兩
一九一九	一、六四〇、三〇一兩
一九二〇	二、三七六、一二二兩
一九二一	五、一六三、七八一兩

上面是各種各式的發動機。

年 代	機器價額
一九一三	九三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四	二、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六	一、六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一九	三、七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一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兩

以上是紡績機器，其進口之突飛猛進更是令人驚詫！

我們就上面各種機器的輸入年年不斷地以倍數增加，便是證明中國社會之如何迅速地採取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為生產技術是測驗社會經濟結構的最好方法。

我們現在再舉一個重要的統計，便可證明上列各表所指示的機器進口每年增加是與大工業的發展相符合而正確的。

2. 中國輕工業的發展

工業部門	企業數	一九二二年(中國的)	一九二二年
製蛋工廠	一九一五年	一九二二年(中國的)	一九二二年
餅乾及罐頭工廠	九	五〇	三二
	八	三五	三三

由上表看來，無論在那一部門都是長足進步的趨勢。
至於紡績工業的發達更是急劇。

年 份	工廠數目	紡錠數目	織機數目
一八九一	二	六五、〇〇〇	
一九一二	一七	五六五、二五二	
一九一四	—	六四二、〇〇〇	
一九一六	四三	二七二、九四一	五、九六四
一九一八	四九	一、三六六、〇〇〇	六、一九七
一九二一	六三	二、八三八、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一九二六	一一八	三、四一四、〇六二	二、五、九三四
絲織工廠	一七、(一九一三)三六一		
皮革工業	一七	四六	三九
製紙工業	一一	一七	一四
製糖工業	六	二六	一五
火柴工廠	五三	八九	七五
製煙工廠	一五	七九	二一
水泥磚瓦工廠	七	六四	三二

從這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紡績工廠不斷的增加，同時自一九二一——一九二六，五年之間幾乎工廠的數目增加一倍；我們同樣可以推論在這五年之間，其他輕工業部門在此同一的條件之下一定會有同一程度發展的。至於在反面，家庭工業年來不斷的衰落已是表現新式資本主義企業佔優越的地位。

至於重工業方面情形又怎樣呢？

煤的採掘有二二、七〇〇、〇〇〇噸，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要高得多；而比一九一三年的俄國二九、〇〇〇、〇〇〇稍差一點。

五金工業的出產量，沒有充分統計材料，不過造船業比戰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可以建造整個很大的海船與汽船等等，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中國許多兵工廠，完全製造手鎗，步鎗、機關鎗、野砲與過山砲、無煙火藥，甚至製造毒氣。

中國經濟變動還有個顯著的象徵，就是電氣廠的數目於一九一三年為十二

個，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四百個。每年平均增加三三又三分之一。有兩個製電泡工廠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並且做出口品。

農村方面在全國各地都可看見農業之日益發展而成爲專門化，地域分工日見顯著。而以種茶、植棉、養蠶等等爲尤甚。漢口、南京、上海、以及沿運河一帶和其他各地均有很好設備的精製蛋糕、蛋餅等公司（且常有採用最新式康弗爾機器的）。機械磨米企業常有最完善的英國機器。各種各式的榨油廠、沿海一帶之罐頭工廠等等，都表現農村經濟漸漸走進資本主義生產範圍。我們雖然缺乏詳密統計。但據上面農業機器入口之逐年增加，便不能否認農村生產方式日趨變化的過程。如滿州一帶在日本帝國主義影響之下農村生產方法之資本主義化，更爲一般人所公認。

我們在此地，并不着重於說明在目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登峯造極，如何順利無阻，或與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媲美；而主要的在於證明，自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或更確切些指出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雖然，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束縛日益堅固；雖然在有封建殘餘的條件之下，雖然，歷年不斷地國內戰爭的破壞。然而，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政治作用之擴大等等都是反映中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成分的增高。

四

若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或沒有發展，這只是『新修正派』迂腐之談；但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沒有任何障礙，這也是誤謬見解。我們記得，當蒲列哈諾夫還是革命的時代曾說過這樣的話：『輕氣球是向上飛騰的而不是向地下降的；這是事實，但這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不是說輕氣球是不受吸引力定律的影響麼？反之，只有它的作用纔能說明輕氣球的浮動。』（昂格斯

著，德法農民問題序言）中國社會內部經濟的發展，一樣也要受歷史發展一般定律的支配，這自然是毫無疑義的了。縱然，有任何的民族特殊情形，但終不能改變根本法則。許多反動思想從『四五』到現在，從國家主義到第三黨的理論都是以中國國情來抹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今日修正派諸君已經向我們提出嚴重質問道：『那麼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三大矛盾，——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和工農革命勢力，資產階級却未將他克服，資產階級可以暢利的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完全有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麼？』（李氏原意）我們的回答很簡單：『運動乃一切之母』；『矛盾是向前進的』！

我們這裏還可以反問道：『資本主義是否永不沒落的制度？是否永無阻礙發展的纔算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現在應轉到幾個特殊的問題來說。中國有否封建殘餘的勢力呢？我們且堅決地答覆：『有的！』有的不但中國，即資本主義極發達的國家帝國主義的

英國和日本尚有落後中國所無的『皇帝』呢！封建勢力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之帶抵抗性和阻礙力，亦如城會市行會制度的小手工業對進步產業一樣；而且是必然的；這就是矛盾的表現，這個矛盾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展與以解決；而不是由於保持封建制度來把這種矛盾壓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解決得了的；這矛盾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愈趨緊張直至解決為止。其實，在中國社會內部，像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封建領主經濟早就不存在了。純粹的封建經濟是怎樣呢？恩格斯說：

『中世紀社會：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為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封建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纔拿去出賣，纔拿去交換；商品生產尚在初生狀態。』(從空想社會主義

到科學社會主義)

據恩格斯的意見，封建制度只是建立在自給經濟的基礎上面，中國目前不論在城市或農村中，商品經濟的發展，絕對的足以證明此種制度之不能立脚。

不要說一般小生產經濟大部分是為市場的需要或供給國際市場而生產；任何一個政治上的統治者他都不願直接消費其統治下的被剝削者的自然生產物，而是要坐美國式的鋼甲汽車，睡着德國式的銅床。棉花、煙草、桑、豆、粟、絲繭、茶葉等等重要的農產品，大部分都是供國際市場的需要而表現一種國際分工的形態與外國進行交換；所以自然品佃租也不是像封建時代專供領主自己消費；而是由於商業化的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或地主化的商業家、富農、高利貸者所聚集，運到城市去供給工業部門或出口。尤其是，在中國貧困農民佔優勢的情形之下，這種自然品佃租有可能保持相當的時期，因為『自然品佃租以最窮困的農民經濟中為最發達。』但『租戶要利用一切最小可能性以繳納貨幣租金，俾可減低耕種別人土地的價值。』（列寧全集第三卷）這因為自然品佃租

貴於貨幣地租，特別在佃農佔優勢的中國；一般貧困的農民往往因缺乏擔保品與信用，借貸貨幣的困難，或不能等待生產品出賣後交付地租，或地主本身就要農民直接交納生產品以應城市工業和國際市場需要。於是自然品的地租便可在交換經濟發展的社會中立足，因為像中國這種自然品地租與自給的封建領主經濟下的自然品地租在形式上即數量上雖然沒有什麼分別；但在質量上業已截然不同；因為此種自然品地租僅是表現地域的分工——即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自然分工；并不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反而，促進發展過程。一切都依賴於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一個同一現象會因各有機體全部構造各不相同的緣故；會因它們各個器官各有差別的緣故；會因那些器官所依以作用的諸條件各各相異的緣故，會因其他種種的緣故，遵從一個完全相異的法則；舉例說，馬克思否認，人口法則在無論什麼時候和無論什麼地方都是相同的那件事。』（資本論，第一卷二版序）這個論據恰好給我們，可以用在中國的自然品佃租上面

的。最主要的區別，就在前者的產品是專以滿足領主和農民自己的需要爲出發點，後者是以滿足市場的需要，準備交換爲出發點。這種自然品佃租，在中國正是表現特殊情形。

至於徭役制度在長期爲商業資本侵蝕，自然經濟崩潰的中國其殘留的程度自應是微弱的；因爲『自然經濟與中農愈趨崩壞，則徭役制度將愈爲資本主義所推倒。』（列甯）其實推倒中國徭役制度的還不只中國內部長期的商業資本，此外還有是以打破中國城壁的帝國主義廉價商品的。

那末，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又怎樣呢？

馬克思說：『由重利盤剝與商業構成的貨幣資本，因鄉村封建制度與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不能變成工業資本。』（資本論第一卷二十五章）這就證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不是屬於封建制度的本身而是與封建制度相對立的。同時，『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範圍

擴大，使生產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成爲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爲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以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程度及內部結構如何爲轉移。『（同上）那末，商業資本不但與封建制度相對立，而且使之『解體』。固然，『商業資本的發達，就其自身講，尙不足以爲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的媒介與說明』。（同上）然而，這也只是說明商業資本的『自身』作用；是說『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達，就是指資本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的時代商業資本而言。即指『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即在中古時代的西歐）是商業支配工業』的時代商業資本而言；但是，在『近世社會中是工業支配商業』。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商業資本由他從前的獨立的生存，降至一般投資中特殊的一種，而利潤的平均化使商業資本的利潤降至一般平均點；商業資本的作

用從此僅爲生產資本的經理者。』因爲『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展固是奴隸經濟自身的結果。……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達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毫無疑義的，在今日世界，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是錦上添花，商業資本不能『獨立』發達只是受工業支配。這就是說，商業資本愈是隸屬於工業，則和一般經濟發展，就不是成爲『反比例』而恰成爲『正比例』了。

中國農村中的商業資本，不能不與城市的買辦發生關係，城市買辦，不能不與世界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家發生關係，即不能不依賴於近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中國的農村與城市和世界分立起來看，以爲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不普遍，就得出，商業資本尙可在中國『獨立』發展的錯誤結論。殊不知帝國主義世界鎖鍊一環的中國，不能和百年前閉關自守時代的中國同日而語的！古諺說：『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商業資本，也

是這樣的。

高利貸資本更是爲資本主義發展前期原始積累的必需要素之一。而原始積累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但是高利貸在農村的發展可否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一定是停滯呢？恰恰相反，『在資本主義生產就靠貨幣經濟和大工廠的媒介，結果了他（農民）的運命。……這樣農民使一步步地降低到破產的地步了。賦稅、荒年、遺產的分割。這樣的行程，就會把個個農民都驅入於重利借貸者的虎口中去。負債一天天地成爲普遍的現象了。』（恩格斯著德法農民問題）這是說什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不能削弱農村中高利貸的勢力，反而『把個個農民驅入於重利貸者的虎口。』修正派先生們，千萬不要錯怪恩格斯寫了這段話不能爲他們留面子，應當怪歷史不應這樣的發展，使他們機械式的理論破產無遺。恩格斯不過指出這歷史發展的事實罷了。

最後，歷來在國際帝國主義直接間接指揮之下的內戰是否障礙中國資本主

義的發展呢？是的，任何戰爭、革命，都是破壞生產力；可是，任何戰爭、革命始終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這種生產力發展之結果的戰爭，革命，對於生產力的破壞只限於暫時的，並不是以消滅社會生產力，並且經過這戰爭和革命之後，生產力更在新的更擴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馬克思說：『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力』！

矛盾呀！你儘管發展罷！看你自己解決自己！我們將要用主觀的力量幫助你來解決！

五

賜我們在這裏不作經院派式的討論問題，來咬文嚼字；說：『優勢』呀！『領導』呀！『相持』呀！『穩定』呀！『失敗』呀！『暫時失敗』呀！『勝利』呀！『最後勝利』呀！等等字義來作詳密地研究，因為我們這裏探究社會問題，不是想

作名辭學家。我們現在只確定某種經濟在中國社會上在質量上佔優勢爲「領導」作用；而在數量上佔優勢，縱然數量比其他各成分經濟爲多，而不能在社會再生產行程中起左右一切經濟的作用的不能算爲「領導」作用。

帝國主義時代的人類，假使對於一切政治經濟問題不從國際的眼光去考察，只是證明他的生活是孤立，是野蠻的種族。因爲我們現在要用一枝縫衣針都要和外國發生關係的。帝國主義世界是整個的經濟系統，各個獨立的國家由於自然的和社會的分工所發生的交換關係的發展使整個世界生產打成一片。在世界經濟領域內，國民經濟乃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一切個人企業又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企業中各部門又是企業中的一部分。彼此都是結成不可分離的聯繫。中國與世界關係密切自亦不待言的；尤其是在近日海關改爲金本位更足證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連結之發展。因此，更因中國是個農業國，所以，牠和國際交換關係發展，只是進一步證明牠對於工業國工業品需要之增加，中國農

村不得經過各市鎮和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重要商埠發生交換，各市鎮不得不經過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重要商埠和國際發生交換。鄉村不能不與城市分工，亦如中國不得不與國際分工一樣。在今日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時代，工業國不能不是農業國的領導者，農業國的城市又不能不是農村的領導者。換句話說，就是農村不得不依賴於城市，中國不得不依賴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小生產不得不依賴大生產。這樣由帝國主義經濟統治下的中國一面不斷地使農村階級分化，農產品轉成商品的過程日益擴大。另一面，家庭工業經過各大商店占買人的供給原料，并爲之代售整批製造品。使在『實際上等於僱傭工人，在自家裏爲資本家做工，這種占買商業資本，已變成爲工業資本了。』（列甯）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早就是失去領主和采邑賜地形式的封建關係，只管有貨幣的人便可成爲新的地主。於是商業家、高利貸者、富農多半是兼作鄉村地主的。列甯指俄國『高利貸者，商人與富農是農村經濟中的三位一體。』而中國農村資

產階級常常是這『三位一體』中兼作土地所有人。同時還直接間接與帝國主義的買辦和城市工商業部門結成不解之緣。

托洛斯基說：

『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基本的農村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發生了有機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中國資產階級同樣不能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形式和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P.2/2)

因為，中國『大中地主(按中國的規模)與城市資本(外國資本主義在內)是有最密切的關係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主階級。農村中的一般最廣泛的而極慘酷的剝削者就是富農和高利貸者，即城市銀行資本的經紀人；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時亦是反資產階級的。』(同書P.28)

這因爲中國過去農業經濟生產技術的落後，不能發展土地上巨大生產的組織；長期的商業資本之侵蝕農村，破壞了自然經濟，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礎，土地商品化過程之不斷地擴大，高利貸——尤其是外國財政資本家買辦帶入農村中的重利盤剝；不但使農民破產日益加劇，即封建式的地主亦擺脫不了破產的厄運。於是新式商業家，高利貸的地主便起而代之。另一方面關稅不獨立，使從鄉村所剝削的農民血汗大部分流入帝國主義之手。因爲『保護關稅制度是使製造者從事製造，剝奪獨立勞動者的產業，使國民生產工具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并強制縮短中世紀生產方法到近世生產方法的過程之方法。』（馬克思）外債之高築，國家支付外債利息逐年之增加，一切正稅的收入多半也歸入帝國主義的荷包。使中國農村的富有階級如高利貸者、富農、新舊地主、和城市買辦、商業家，在轉變爲工業資本家之『蛻化』過程，一面必須多多少少藉助於外國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家；另一方面還要加緊採取封建形式的剝削方法（如創設釐

企圖抵補不自主的關稅以挽救自己，巧立名目設立種種苛捐雜稅等等）以促進原始積累最後的成就。同時中國重工業、銀行、礦山、鐵道等等都是直接間接操之帝國主義手裏；更令拖泥帶水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因自己幼稚和脆弱，不得不屈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威力之前；不能以『自由競爭』的方法來擺脫自己危亡的運命，祇有採取『依賴』帝國主義的道路以圖苟存。所以無論中國任何一派的資產階級都要或多或少帶帝國主義經濟經紀人的性質，在政治上不得不勾結帝國主義以自重使自己真正成爲政治上的代理人。這由於世界強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導中國，由中國重要的工商業城市領導農村，反映到政治上，帝國主義統治中國城市，經過代理人——中國的資產階級統治農村。然而，修正派還是大夢方酣，在那裏大聲疾呼：

『中世紀的封建關係，在中國國內經濟中和其上層政治建築中，都佔統治的地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

托洛斯基說：

『這是根本錯誤。什麼叫做統治？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數量而定嗎？抑或按照在中國經濟上起統治與領導作用而定呢？建築在包羅全國的商業與銀行資本基礎上的國內工業非常迅速的發展；重要農民區域之完全依賴市場；對外貿易之偉大與日益增長；中國農村之各方面方隸屬於城市；——所有這些都顯出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的佔優勢和直接的統治的地位。封建與半封建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分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響影而新形成的。然而這并非『封建』的（更正確的說，農奴及一般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的統治，而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的統治。正因為這種資本主義經濟佔主要地位，我們纔能夠真正的說到中國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領導的遠景，否則豈不是首尾不相顧嗎？』

『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都遠過於其在全國人口數量中所佔的地位，因為經濟上無產階級統治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經濟系統的中心和主腦，而且因為政治上經濟上無產階級代表資本主義下廣大勞動羣衆的真正利益。因此，無產階級雖於其全民中佔少數時（或者自覺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佔全民中之少數時），能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從半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吸收許多同盟者到自己的方面來，這些小資產階級於先時是不會贊成無產階級的統治的，而只有在以後繼續的經驗中，纔使他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正確性及自然性。』（列甯全集十四卷P.185 一九一九年寫的）

『中國無產階級在生產中的作用，早已極大了。在最近幾年，此種作用必然繼續增大，即在政治上的作用，據長年事變的證明可算是極偉大的。』（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第二集 P.69——71）

喂！封建勢力統治，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無產階級又可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勢力從那裏來的呢？從天下降呢？蘇聯派來的呢？或是僱傭來的呢？

六

a. 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或發展可能性，並且以爲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這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新修正派』的最反動思想的論據。這樣必然推論到中國無產階級力量不能發展，或如陳公博一流人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存在，即存在亦是極少極少；和前時代封建勢力可以復活。且必然會把農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過於無產階級的水平綫，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幻想代以其牠政權來履行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和忽略國際的階級關係。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可否發展問題，我們在上面業已經詳細答覆，我們這裏只說一句，牠是歷史進化必然的階段。馬克思說過：『對的，社會要隨於自身發展天然法則的足跡……牠却

不能把那個天然的局面飛跳過去，也不能夠由指令的結果把牠除去；不過，牠却可以縮短和減少分娩的痛苦罷了。」（資本論一卷序言）至於發展到若何程度，或在何種速度進行，則要看整個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來決定。至封建勢力的復活或復辟，則我們可堅決地加以否認！因為在國際範圍內，不管從數量上，或質量上，都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和統治地位；封建勢力只是成爲過去歷史的殘骸；決不能重新在中國恢復舊觀的，即目前中國封建的殘餘勢力的抵抗，正是表現一種「迴光反照」的作用。人們若反問我們說：「爲什麼說蘇聯新興資產階級有復辟（即走「特爾米圖」的道路）的可能呢？難道蘇聯社會的進化特別『要開倒車嗎？』我們肯定的回答：『假使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急速到來，整個世界還是資本主義統治着是有可能的！』因爲蘇聯不能離開國際市場的關係而孤立存在。所以，縱然境內有社會主義經濟，但比起整個世界經濟看來是受資本主義勢力包圍之中。

b. 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以內質量的關係便可決定的；譬如列甯說俄國小生產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社會主義成分的經濟佔領導地位。中國小生產一樣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資本主義柴等日常生活工業品，假使這種工業品在城市發生恐慌，馬上便引動到農村去的；然而，農村的農產品或米穀發生恐慌，城市一時還可得到國際市場的接濟避免危險。這便證明鄉村再生產行程不但依靠城市的再生產行程，並且依賴於國際市場交換的順利進行。反之，我們可看到年來中國邊境不斷的災荒，不但不足以影響到倫敦、巴黎、紐約；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響。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罷工，不但影響到全國如大難將至，而且影響到英國、日本等等國家。一旦世界大戰爆發，或美孚、亞細亞煤油公司倒閉，我們以為不但上海、漢口、廣州、天津、要發生問題，即極偏僻的農村都要引起

騷動的。所以中國農村的農業經濟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城市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行程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c. 中國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各種矛盾和障礙是有的，並且是必然的！正是有矛盾、有障礙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纔能發展。這是宇宙間一切辯證法的進化過程。

末了，我們要說一句：

『人能委棄真理，然而，真理永遠不會消滅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於上海。

上文業已付排，而經過一星期忽然得讀新思潮雜誌第五期，本擬把上文整個改作，將『應徵』的形式變為『批評』的形式，但事實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惟是上文也有不少地方預先指出『新思潮派』的錯誤觀點——尤其是指出他們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佔支配的地位。所以即不改作亦無傷大體。現在因出版時

間忽促，只得關於中國經濟領導權問題，對於「新思潮派」的錯誤和矛盾的理論加以單簡的指摘。至於詳細問題以後再當另文論及。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作者附識。

王學文君說：「……或在說，中國資本經濟已經在中國經濟佔得支配的地位，這種見解，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盲目，不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什麼。」（新思潮 No5 P. 19）

他在另一地方又說：「……這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是在中國經濟佔支配的地位。」（同上 P. 17）

這位作者已經肯定的結論是：支配中國經濟生活的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和半封建的！

潘東周君說：「因為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這些半封建關係在農業經濟中的優勢，實際就佔領了整個中國經濟中的優勢。……就整個中國經

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的地位，整個經濟發展的趨勢確已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站着比較的優勢。……什麼叫做城市經濟領導着農村呢？就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他將要隨着城市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前進。城市既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則農村經濟一定也是走向資本主義，但是就他發展的方向說，絕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點子是我加的——作者）。……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全國國民經濟中，封建的關係仍然站着極強度的優勢。……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築鐵路也好、開大港也好、建築新式的工業也好，但若保持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外債、航業、工廠本鑛山及一切政治與經濟的特權，則中國無論如何，不能跳出其他的經濟發展的方向——走上殖民地，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民衆將要長受帝國主義的剝削，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同上 P.P.17—20）

這樣混亂錯雜的思想，簡直是表現對於經濟問題沒有一點研究和了解！

我們現在祇得把上面所引證的話歸納如下各點來說；即據『新思潮派』的意見：

1. 中國經濟佔配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經濟。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佔絕對優勢。

3.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加緊了封建的束縛，加緊破壞中國國民經濟。

我們在這裏仍是照上文的假定，關於『優勢』與『領導』當作數量與質量的優越而言，那麼，所謂『支配』者不得不是『領導』的作用。然而，潘東周君所理解的那種『領導』，簡直是我們聞所未聞的新鮮解釋！固然，『名無固宜』，我們可把『領導』，改為『支配』、『統治』、『優越』亦無不可；我們把『馬』叫做『鹿』、『哈叭狗』；把史大林稱做『濫用權力』，或『無論什麼菜都要用胡椒的廚子』等等

亦無不可；但要社會上一般生活習慣所公認。并且還要加以正確的說明。潘君的解釋也可以說不能使人承認的謊謬絕倫的解釋！因此我們先就『領導』一名詞的意義來說。

據東周君的意見，『領導』是指經濟發展的方向而言，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那就是說永遠沒有鄉村領導城市的事實。因為社會發展始終是向前進的。如果，潘君的意見是正確的，那末我們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說，蘇聯是佔現在整個世界經濟『領導』的地位；因為，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始終要向社會主義方向走的，這豈不是太滑稽嗎？假使問題是這樣的簡單，我們老早便不須提出在經濟生活中城市對農村的『領導』作用的問題了；我們可說，共產主義的經濟領導一切，因為社會總是走向共產主義方向去的！我們為什麼多作此學院派的推敲字義之無謂的一舉呢？

事實上，經濟上的領導作用，本來就是『質量』的問題，就是說那一種經濟

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佔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會再生產的可能。在古代世界，交換經濟初期，一般單純交換的商業都會是在農村支配和領導之下的。因為這時代的主要的是農業生產，農業經濟社會生產的基礎本來就建築在農村之上。領主和農奴在某種時期之內，可以離城市而生活，而絕不能離開農村土地而生活的。這時城市發生重大的事變雖然可以影響農村，但決不能破壞整個農村的經濟基礎；農村如果生產發生危機，人口過剩，天災水旱等等馬上便影響城市，立時隨着而發生恐慌。在資本主義社會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我們所認為『領導』作用，應在這樣的意義上來理解，同時，我們不能承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或歐洲先進資本主義經濟，在此刻能夠領導中國雲南、貴州山谷間不與外來發生交換關係的苗族經濟生活；因為彼此之間，此時尚無若何經濟的聯繫。

所以，我們不管潘東周君是否願意這樣了解『領導』的意義，我們始終是這

樣了解和這樣解釋的。

第一，關於封建經濟是否能夠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支配地位的問題。

『新思潮派』諸君爲要垂憐中國資產階級起見，一致把一切罪惡歸到封建勢力身上，堅決地承認，封建經濟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支配的地位。最可憐的理論則莫過於潘東周；他一面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領了領導的地位。』同時又說：『但是，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關係仍然站着比較的優勢。』隨後又說：『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全國國民經濟中，封建的關係仍然佔着極強度的優勢。』最後又說：『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觀念的糊塗再沒有比此更甚的！豈有在同一的歷史階段內一個國民經濟系統中忽而『資本主義領導』，忽而『半封建關係佔比較優勢。』忽而『封建關係佔極強度的優勢。』忽而『帝國主義佔絕對的優勢。』若說『領導』只是指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言，我們試問：『當着資本主義還沒有在城市

佔領導地位時候的經濟狀況是怎樣？那時代有否領導當時經濟生活的其他經濟成分？」若說『優勢』祇是指數量之多而言，那問題便容易解決多了。譬如說在小農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小生產者必然在全人口的數量上比重為多；但是小生產者必然地要隸屬於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的；或趨於破產。然而數量雖多，在經濟生活中不能起『領導』或『支配』的作用。我們不能說，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小生產便一定居支配的地位。假使說，封建經濟佔優勢便是居支配全國經濟生活，那就是說，中國整個的國民經濟要視封建的經濟成分作用如何為轉移。

在上文我們業已說過，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因為貨幣經濟的發展和帝國主義商品的侵蝕，早就將封建領主自給的經濟基礎嚴重的破壞。農民的貧困與破產就是促使農村經濟陷於停滯，生產力衰落唯一的表現。封建勢力唯一的基礎是靠農村的土地生產，農村經濟的衰敗便證明地主階級經濟基礎的削弱，愈促

成農村依賴於城市的過程。我們現在再就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再生產而言：假使城市資本主義工業中生產停頓和恐慌，馬上便立刻影響到農村中去。在今日中國的農村生產中，雖然沒有普遍的採用資本主義式的技術，但在農村經濟中再生產行程，所需要於城市資本主義部門生活資料如：棉紗、縫衣針、布匹、火柴、煤油，等等的供給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甚至在粗笨生產工具上的鐵器也要在城市資本主義式的手工業工場購買的。一旦城市與農村交換的關係斷絕，農村的生產便是束手待斃的。而城市資本主義工業則不然，他雖然在輕工業的食料和原料要靠農村經濟的供給，但農村不能封鎖城市使之決絕地馬上發生危機，因為城市在相當時期內還可以得到世界市場的救濟。尤其對於重工業的影響更爲微弱。這就是說農村經濟，（即說封建經濟吧！）雖然可以影響城市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不具第一等的意義。而且農村經濟只有一天天擴大與城市進行交換而愈趨於隸屬的地位。就是說農村要受城市的領導，而城市資本主義經

濟成分爲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命脈。在中國現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正是如此。承認中國封建經濟佔支配地位的『新思潮派』諸君！請回答我們一個問題：『現在中國的農村是否支配城市呢？』

固然，城市假使絕不與鄉村進行交換，那末，不但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并且也是不能生存；可是，城市受農村的影響最少最少也要說比較有程度之別；最少最少也要承認城市比較農村爲優越罷。國際交換的發展，表現國際分工與隸屬於帝國主義之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便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之唯一的而重要的表現。鄉村農業經濟之依靠於城市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產品而再生產而生存；這便是資本主義關係支配農村的一種表現！我們不能像機械唯物論者那樣笨重，將鄉村和城市分開，又將中國和外國分開，來討論問題說：『中國農村中還缺乏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吳黎平的意見）因此，照（？）馬克思主義不能發生資本主義關係？！中國城市比農村數量爲少，於是封建關係佔支配地位！

固然，在水鍋下面未曾架火時，冷水不會增加熱量的；但我們若從別處弄來的開水沖進去，難道這時鍋內原來的冷水不會起變化嗎？難道還是原來的冷水自冷水，後加的開水自開水，各不相犯而截然分開地并存於一鍋之內嗎？

馬克思主義簡直被不肖門徒糟躐比『教條』還要無用！

第二，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問題。關於這點，幸好『新思潮派』諸君也承認，『帝國主義是佔絕對的優勢』，帝國主義是什麼？牠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列寧）。牠是最發展的資本主義；牠不但在中國佔絕對的優勢，並且在全世界佔絕對的優勢。牠勢力所能達到的地方，一切經濟都要受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支配；中國的國民經濟不外就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單位。中國國民經濟不能離開世界市場而生存，正像中國農村不能離開城市而生存一樣。帝國主義既然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佔絕對的優勢』；何以在中國居支配地位的又是封建關係呢？難道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外國人』的資本主義關

係不算數嗎？要中國資本家開的工廠纔算得資本主義的關係嗎？這是很難索解的一個疑謎！

第三，就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和封建關係的影響問題。

我在上文業已說過，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經濟的發展，只是使中國趨於殖民地化，即愈使帝國主義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愈佔絕對優勢和支配的地位。我們絕不能因中國之更淪為殖民地，而否認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與勢力的發展；我們不能將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把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企業、礦山、鐵路等等，推到國民經濟系統以外。只有最無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叛徒纔會說：『築路也好，開大港也好，建築新式的工業也好，但是保持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外債、航業、工廠、礦山及一切經濟特權，則中國無論如何……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承認帝國主義只是在中國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阻礙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留着

最難堪的污點！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固然在中國要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卵翼下培養一部分中國買辦、半買辦式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以，帝國主義之破壞中國純粹民族工業，只是『相對』的，但他在中國勢力的發展要『絕對』的破壞封建勢力和關係，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進化的過程。難道，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開辦的工廠、礦山、建築鐵路等等不是增加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難道不是在中國領域和國民經濟生活中，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嗎？何以還要『長受現在這些封建關係的束縛』呢？若果如『新思潮』諸君所說帝國主義佔絕對優勢，而帝國主義又勾結封建勢力；而封建關係在中國又極強的優勢又佔支配地位，那簡直不但中國民族工業不能發展，即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廠、礦山、築路，也是無從進行的，何以，帝國主義的新式工業又可以在中國會發展呢？帝國主義不怕中國這麼厲害的封建關係嗎？中國民族工業何以又這樣的怕封建關係呢？其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不怕封建勢力，

他們所怕的乃是擁有雄厚的財政資本和操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帝國主義和他們競爭呵！歐戰時期中，中國民族工業之在更順利的條件底下發展，便是證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怕中國封建關係而怕「外國人」！

若果一面說，佔絕對優勢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永遠維持佔支配地位的封建關係，另一方面又說：『中國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工業革命的過程確實已經開始。經過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最近幾年的變動，中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是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他的種子。』（同上P.17）這不是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存在，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兩大桎梏』（同上P.22）這『兩大桎梏』，一種『桎梏』是『佔絕對優勢』，一種『桎梏』是『佔支配地位』。這樣不但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並且會使中國資產階級的運命漸趨滅亡，難道中國資產階級一天天會消滅了嗎？帝國主義既不算數，難道中國會發生沒有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

嗎？

我們最後還希望『新思潮派』諸君要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中國民族工業』弄個明白！

末了，我們承認：中國社會經濟中是資本主義成分佔『支配』或『領導』的地位。

我并引王學文君的話來作爲對他們的總評：

『那種見解，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盲目的，不能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甚麼。』

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作者在本書前段業已發表過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意見，並且對於新思潮雜誌第五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也有過簡略的批評。但是，還不充分，因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分析，爲估量革命前途和政策最基本的出發點。因此，不厭重複對於此問題作更進一步的說明，同時并指摘一切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及其反動性！

歷史是前進的，前進的人們不要與歷史背道而馳啊！

—

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濟問題，假使不將牠和整個世界經濟相聯繫起來，那便證明沒有辯證法的觀點。因為，我們必需把關聯於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之主要的許多事實，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來探討。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實權大部操諸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手。難道我們可以把中國和國際的經濟生活分開嗎？可以把中國的資本家和外國的資本家看成兩個不同的階級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牠是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向着國際範圍擴大再生產的結果。其主要的特徵：

1. 資本與生產的集中發展到最高度，變成壟斷而操縱全世界經濟的生

命；

2. 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變成世界財政資本，在這個財政資本的基礎上，造出財政的寡頭政治，

3. 商品輸出之外，又輸出资本，資本輸出已成爲極端重要的事；

4. 國際資本壟斷的形成，分割了全世界的地域，並且全世界的地域已被列強分割淨盡。

把這些特徵括起來說，便是，帝國主義時代『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輸出商品進到輸出资本，並且輸出资本又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的經濟基礎之一。固然此時帝國主義更需要商品市場和原料出產地，但統治世界的并不是工業資本，却是財政資本。確切些說，財政的寡頭政治已經在整個世界經濟生活中起支配的作用。這種支配是由少數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世界地域中表現最爲透澈。

因此，後進國的經濟與先進國的經濟，殖民地的經濟與宗主國的經濟都是脈絡貫通，窒息相關的密切聯繫着。帝國主義列強領土和勢力範圍的擴充便是反映其經濟密網伸張的結果。所以，財政資本觸鬚所到的地方，同時也是金融寡頭政治統治所能達到的地方。於是殖民地和宗主國不但在國際市場的交換關係上表示自然分工和社會分工，並且在經濟發展的強弱程度上表示彼此間之支配和隸屬的關係。在帝國主義世界自身的特點看來，自然主要的還是在境內已經具有財政資本威權的國家佔取宗主國的地位，而殖民地縱然可以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所謂殖民地工業化，終亦不能隨便擺脫殖民地的運命，因為宗主國的壟斷業已經形成，而殖民地總從事於自由競爭。因此，殖民地的民族工業始終不能與宗主國的工業對抗，最後，只得屈服隸屬罷了。在這樣的進化過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便是宗主國在自己國內和殖民地境內的銀行。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銀行的基本任務業已改變，即『從多數小媒介機關

向少數壟斷者手中移轉；構成了從資本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根本的要素。』簡截說一句，銀行發展最後的旨趣便是『壟斷』。於是，宗主國的少數壟斷者可以利用銀行的關係及熟悉流水賬項和金融業務之狀況，先能正確地計核孤立的資本家的財政狀況，而後用縮小信用或擴大信用而統制孤立的資本家，最後，決定孤立的資本家的運命，決定他們的資本應該怎樣；他們的資本可以任其隨意增減。自然，在殖民地境內稚弱的民族工業資本家，更經不起帝國主義銀行的操縱和蹂躪。所以，在他們羽毛未豐的時代便遇着萬能的財政魔王，於是，由於外國大銀行的操縱借款、參與、收買，終至使殖民地的民族工業直接或間接歸於帝國主義的宗主國支配之下。然而，這還不是說殖民地完全不會發生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祇是說，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新陳代謝的一步一步的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最後要成爲他們的買辦或半買辦纔能夠勉強生存。因此，殖民地民族工業縱然經不起外來財政勢力的傾軋和吞併，但

是，民族的輕重工業仍是此起彼伏的發生，不過他們的獨立性要看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對之迫害到若何程度而定。這就是說，後進國殖民地化過程之緊張由於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勢力的擴張來決定，也就是說，國際托拉斯間對於世界分割愈迫切，則後進國的殖民地化過程便愈迅速；其經濟生活之隸屬於宗主國的經濟構造也就愈密切。然這始終不是說，因為殖民地化了便不能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

有一個中國著名的政論家李立三其人者，自命為無產階級政黨底『理論中心』（？）他說：

『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發展的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尤其是不會直接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

這位『理論中心』的政論家，說出如此這般的一段不完全的概念之後，我們以為他的『理論』業已失去了『中心』！或可說抓不着『中心』！

他懂得『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發展的有機組成的一部分』；他也懂得『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和原料的供給』。但他又說『尤其是不會直接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

自然，鬼也不會去相信帝國主義有這樣寬宏大度樂善好施來直接幫助殖民地民族工業的發展，使殖民地走上『獨立』的道路脫離他們的束縛以養虎遺患；然而，難道在不獨立的，走向殖民地化的條件下，帝國主義也不可以推動殖民地工業發展嗎？

機械論者根本的邏輯便是：『是——是，否——否』；用簡單言語表示就等於說：『不是這樣，便是那樣』。他既承認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經濟為『有機組成』；但同時又用『主觀』的方法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關係分工起來。好

像帝國主義只管奪取原料，專門製造商品出賣給殖民地，而殖民地只是供給帝國主義的原料并購買牠的商品。以爲殖民地一發展資本主義馬上便離開宗主而獨立，或是宗主國的商品便不能在殖民地銷售或得不到原料；這種見解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這僅是以『自由競爭』時代的眼光來觀察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關係。他忘記了一宗很重要的事，就是，帝國主義時代主要的特徵乃是財政資本的『壟斷』。他以爲帝國主義還是以『自由競爭』爲主要的方法來對付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忘記了在先進國家中『資本過剩』這麼一回可驚而重要的事實！他又忘記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根本的出發點，不是『原料』，也不是『出賣商品』，而是取得『更多的剩餘價值』；『更高的利潤』！不會自詡過爲『理論中心』的列甯說：

「但是資本主義若去發展農業和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就不成爲資本主義了。（這是指發展帝國主義自己境內的農業和提高境內人民生

活而言——作者）爲什麼呢？因爲發展的不平衡與大多數人民的貧困狀態是這種生產的根本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國家中，當資本主義仍舊存在，過剩資本亦不能停止而使大多數人生活的程度向上，這樣雖必減少資本家的利潤，然而資本家亦可將資本向其牠後進國輸出，藉以增加利潤。在後進國中，利潤大概是比較很高，這是因爲資本缺乏、地價便宜、工錢低廉以及原料的賤價種種關係。而資本輸出且可造成了許多後進國也踏進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去；在後進國中，最重要的鐵道都已敷設或在敷設中，工業發展的根本的諸條件都已經確立而存在了。』這裏可歸結成三個要點來說：

第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甯願自己境內農業落在工業後面，甯願使境內大多數人民生活陷於貧困和饑餓狀態，爲要增加自己的利潤，把過剩的資本投到後進國去；

第二，因為後進國資本的缺乏、地價的便宜、工錢的低廉以及原料的賤價種種關係可得較高的利潤，即是說，後進國正是先進國過剩資本的消納場；也就是說，便於先進國的投資開展資本主義的生產；

第三，資本輸出的結果，使許多後進國也踏進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確立了工業發展的根本諸條件。

由於資本大量輸出的結果，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後進國工業更有發展的可能，更促使半殖民地從『過渡形態』漸漸變為殖民地。

我們且引列當所舉的數目字來證明帝國主義資本之輸出於殖民地，不但十分可能，而且很厲害的。

如下表（以十億佛郎為單位）：

	英國	法國	德國	總計
歐洲	四	二三	一八	四五
美洲	三七	四	一〇	五一

亞、非、澳三洲	二九	八	七	四四
合計	七〇	三五	三五	一四四

投到亞、非、澳、美四洲的資本已佔三分之二以上，因為這些地方大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後進國居多。列甯特別地指明說：『就英國而論，縱使僅計算美洲方面（加拿大）而不及亞洲與其他各國，則殖民地總佔第一位。由此可知資本的大量輸出與殖民地的佔領實有很密切的關係。』（帝國主義）至於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從輸入資本變為輸出資本的國家，其到處找投資的孔隙這是盡人皆知，此地不須多說的了。

其次，資本輸出不但可以在殖民地得到更高的利潤，並且更促進了商品的輸出，因為帝國主義時代，生產的基礎仍是建立在商品生產之上的。如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必定引起宗主國機器和種種進步技術、鐵軌、火車頭，等等的輸出。這不但如列甯所說：『資本輸出實成為激勵商品輸出之法門』，并

且還有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所發生的交換，各國間不只是質量不同的生產品纔行交換；即同質量的生產品也要進行交換。例如，某一國可輸出於某幾國的，不單是這幾國所不生產的；或且生產極微的貨物，而且可以輸出其商品與外國的生產品進行競爭的。不但後進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給先進的宗主國以原料，并且宗主國也時常供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的。而在帝國主義財政資本支配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但不會完全把原料只留給本國工業部門的自己使用，而且將從前用落後的技術所製造的原料變成用進步技術來製造原料，以供帝國主義的需要和操縱。機械論者的觀點唯一的特徵，便是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他們不了解時代的特性；與現象的具體聯繫。他們以為假使一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發展，好像馬上便脫離帝國主義的宗主國而獨立似的，所以極端來否認殖民地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發展的一回事。他們以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一發展，馬

上便使帝國主義失去商品和原料市場似的；因此，便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以在殖民地發展和起領導作用這一回事。他們既已承認了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又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固定為容納商品和供給原料的限界以內，這裏很顯然地，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投資輕輕地放過不談。

再則，資本輸出的結果，使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已成爲馬克思主義不可否認的重要理論之一！誰個再來無恥的狡辯，以爲生產原料的工廠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分，或在帝國主義壟斷之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廠、礦山、鐵道、運輸等等……企業，不算爲殖民地經濟組成中的資本主義因素，把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工業截然分開（截然分開與『有機組成』是不耐立的）！我們只得稱之爲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與庸俗化，而嗤之以鼻！

三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牠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經濟的發展一般的趨勢當然與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發展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差別。至於某些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馬克思主義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發展一般的法則來說明，而不能以特殊情形來否認一般的法則！因此，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特徵的認識與不肖門徒的認識，主要的分野就在這裏！

我們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探究，不管李立三、或與他同一鼻孔出氣的『新思潮派』的長篇巨製的大文中，在前提和分析上如何的自相矛盾，但我們只是將他們重要的結論拿來作批評的對象，以免濫費筆墨。

王學文君在新思潮雜誌第五期上關於『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發展及其前途』一文內，很勇敢地做了如下的結論說：

『由這看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這種狀態壓迫之下，不能向上發展，如果想向上發展，非先打破二重束縛不可。』（P.26）

這『二重束縛』是什麼呢？當然，在整個『新思潮派』的思想中心都是堅決的認定：

1. 帝國主義；
2. 封建勢力；

實際上從他們的一貫的觀點看來，這兩種束縛，只是結成一塊的一種束縛罷了。因為他們唯一的結論便是：『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但是我們對於上述這兩種力量，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影響如何，應預先明白地指出，然後再作詳細說明，以免紊亂讀者的注意力。

我們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影響是這樣：

a. 在整個方面是推動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前進；

b. 相對的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

封建制度又怎樣呢？

a. 相對地阻礙（但這種阻礙只是消極的反抗作用，并到阻礙不住時還要

投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b. 牠的經濟基礎是不斷地受帝國主義破壞，不是受帝國主義維持。

至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兩種束縛對於未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纔起同一的作用。若說，中國能夠排除這兩種束縛之後，還是向着資本主義發展，這樣的經濟『向上』，如王學文君所說：『這是中國整個經濟的前途，也同時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前途。』這只有馬克思主義最無恥的叛徒纔說得出來。

帝國主義推動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發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輸入資本和機器。

我們試舉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一年，帝國主義輸入中國機器的增加，便足證明他們不但沒有方法阻止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加緊向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反而輸入進步的資本主義技術來促成這個過程的。

機械輸入表：（註）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紡績機器	六四三、〇〇〇兩	五、一〇九、〇〇〇兩
農業機器	一一三、〇〇〇兩	二一、一九二、〇〇〇兩
其他機器	三、七〇〇、〇〇〇兩	二六、七三二、〇〇〇兩
附屬機械	五〇、〇〇〇兩	九三一、〇〇〇兩
合計	四、五〇六、〇〇〇兩	三四、九六四、〇〇〇兩

註：本表係摘自日本伊藤武雄氏著的現代支那社會研究；與作者在本誌前期所引的機器進口表，在價格的數目上略有出入，然而，其證明機械輸入增加的急速總是毫無疑議的。

僅在八年之中機器輸入的價目增加七倍以上，可見中國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往前發展的。

至於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方面，第一步便是在中國用借債的形式投到敷設鐵道方面，確立了中國工業發展一個基本條件。這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更不能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敷設鐵道只是便於交通，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素。或者更不能用滑稽的文句來說，敷設鐵道可以維持封建勢力！

茲舉列強在中國鐵道借款的數目於下：

國別	鐵路數目	款項
英國	八	二九、九〇〇
法國	一	六〇〇
俄國	一	四〇
比國	二	三三五
美國	一	一、一二〇
日本	二	三〇、〇〇〇

上列諸項外，還有幾條鐵路是幾個帝國主義共同投資合辦的：一為英德合辦；一為美法合辦；一為四國銀行團合辦的。

註：本表款項，英國以千鎊爲單位，俄國法國均以千佛郎爲單位，美日以千元爲單位，俄國在戰前乃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這樣的向中國開關交通，難道也是爲着維持封建勢力，造成分區割據的條件嗎？恰恰相反，這正是給分區割據者的保守派的領主們之閉關主義的企圖以致命的打擊！

帝國主義投入中國電話電報的資本：

國別	經營的數目	款項
日本	四	四五、〇九二
英國	三	二一〇、五四八
德國	二	四七

這種電話電報的建設很顯然的係適應於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銀行需要的。

註：上表款項，日本以千元爲單位，英、德以千鎊爲單位。

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的礦業：

國別

產地

所出產之礦素

日本	撫順	煤
日本	管城子	煤
日本	煙台	煤
英國	四川區域	各種都有
英國	新疆	煤油
英國	廣東	煤
英國	山西	煤與煤油

此外帝國主義和中國合辦的煤礦約有三十處。

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重工業的工廠：

工廠種類	數目
船渠造船	二二
蒸汽機關	二二
鋼鐵及鋼鐵細工	九

比外有許多輕工業工廠未曾列入。

至於紡紗業日本的投資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爲二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磅。

假使上列這許多企業還不能算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領域——亦即世界經濟一個部門——之內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那末，我們將不知把這些部門歸納到那一類的經濟系統中去。

此外，帝國主義足以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就是資本主義式的銀行。現在中國總共有一百四十一個，其中十九個爲中外合辦銀行，四十二個爲外國銀行。在十九個中外合辦銀行中的資本總共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中洋；四、五〇〇、〇〇〇兩；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六〇、二七五、〇〇〇日金。

外國銀行的確實資本，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戈爾登；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

其中重要的許多銀行的總行都是在倫敦、香港、巴黎、紐約、橫濱、台灣、大阪、東京。這都證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銀行，乃代本國財政寡頭政治壟

仲介統治的作用。此外，還有四國、五國、六國銀行團的組織，專門爲的宰制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這種宰制的作用，我們并不是像不肖門徒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以爲可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不能發展；乃是說，使中國的經濟更隸屬於帝國主義，更和資本主義的勢力密切起來。

我們再看中國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〇年止，十八年間銀行的發展情形怎樣：

年份	銀行數目	分行數目	名義資本	已付資本
一九〇二	一	—	二,〇〇〇	—
一九〇四	三	一	二,三一四	六一〇
一九〇六	四	六	六,七〇二	一,三一四
一九〇八	七	一五	一三,二一九	三,一八九
一九一〇	一〇	二三	三五,〇〇〇	八,五九六
一九一二	二三	六九	三五,〇〇〇	八一,一五九
一九一四	三四	一一九	五八,九七〇	二〇,八三九
一九一六	三九	一六一	七二,七七〇	三八,〇九九

一九一八 四八 一七八 一〇〇、一五〇 五九、九八五
 一九二〇 五八 二七七 一八八、八九〇 八六、六七六

由上表看來，銀行資本的增加，每隔兩年，約增百分之三〇，並且有增無減，於此更可見資本主義勢力統治範圍之逐漸擴大的了。假使這還不足證明，那末，世界上將沒有更好的事實！

註：上表以金盧布爲單位。

此外，還有兩種事證明中國經濟之向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工業和農業公司逐年資本的增加。

工業公司

年份	公司數目	資本總額(元爲單位)
一九一二	五三一	五四、八〇八、二〇二
一九一三	五六五	四九、八七五、一六〇
一九一四	六四一	六二、一〇八、二一八
一九一五	六四四	一〇六、九〇一、二一四

年份	公司數目	資本總額(元爲單位)
一九一六	六八五	一三二、七七九、八〇八
一九一七	五五七	一二八、二四三、七二三
一九一八	五三三	一〇八、九〇二、八一
一九一九	四二五	一二九、二二一、二四七

農業公司

年份	公司數目	資本總額(元爲單位)
一九一二	一七一	六、三五一、六七二
一九一三	一四二	六、〇〇九、九六二
一九一四	一二九	四、九六〇、二〇九
一九一五	一二九	六、二四一、〇七五
一九一六	一三三	九、七九一、四八九
一九一七	一三二	一〇、六六三、四五六
一九一八	一九一	九、四九八、三〇九
一九一九	一〇二	一二、四六八、八〇四

若說中國民族工業能夠痛快的發展，使中國達到完全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這當然完全是一種幻想！因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不但操縱一切財政機關，並且在政治上得了許多優越地位，尤其使中國關稅不能自主。況且當現在二十世紀

帝國主義已到了壟斷的地步，而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之下的競爭終於遭帝國主義最後的打擊。但也不能說中國民族工業一些也沒有發展的可能。更不能說帝國主義不許中國發展重工業。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某時期內某些國家經濟停滯而某些國家却順利發展；某些國家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登峯造極，而某些後進國尚在發展的初期。我們不能像機械論者們以為某些國家在經濟停滯的時期，或緩慢發展，便認為資本主義不能發展。尤其是以中國重工業不能有重大的發展，便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不理解這種現象便是『不平衡』，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絕對的公律』！至於中國民族重工業之不能重大發展，主要的原因還不在帝國主義的主觀意志之恩准與否，而在乎中國民族資本原始積累的薄弱，與本國大部分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多靠外國供給。所以，偏於輕工業方面的發展，正是表現這種民族工業的特性與經濟力。

我們試拿中國紡績業的發展中與外國在華的紡績業比較一下，便可發見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證明帝國主義只能相對的阻礙中國的民族工業。

所有者	年份	工廠數	資本	錠數	織機
英國	一九一五	四四	一二	一九五	九二四
日本	一九一五	四三	二七〇	一六六	二、三四八
	一九二五	四五	一、三二六		七、二〇五
中國	一九一五	六七	一三〇	二五九	
	一九二五	六九	一、八八二		一六、三五〇

從這表可看出，在十年中不管外國和中國的紡績業都是向上發展。若說帝國主義只讓中國人發展輕工業，何以英國、日本，也在發展這類輕工業呢？難道中國人的紡績業的發展不會打擾他們的生意嗎？在紡績業中中國與帝國主義有平行發展的趨勢，就是表現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工業只是起相對的破壞作用，不能消滅中國整個民族工業，因為，第一，帝國主義在某種限度內不得代表資本主義的共同利益；第二，有些中國民族工業有時被帝國主義傾軋、吞

併，但還可以更迭交替的發生。這種現象便表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掙扎。

最主要的上表中表現了日本和中國的紡績業是平行併進的狀況，這個給與機械論者以歐戰和排貨作基本的原因，來解釋中國民族輕工業的發展以迎頭痛擊！他們不了解戰爭和排貨固然可以影響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能專以戰爭和排貨來說明！不然，必定會結論說，帝國主義不戰爭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便不能發展；或中國不排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便不能發展。不肖門徒必然會得到這樣謊誕的結論。因為，他們具體的意見就是帝國主義不發展時中國就發展，帝國主義發展時中國便不發展。所以，遇到上表的事實時他們便無法解釋。他們根本不了解戰爭，排貨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發生的現象，反而把這些現象來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命！我們再舉一個今年在申報上上月十日所發表的一個統計一來說說罷。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國內紡績廠的統計

	廠數		紗錠		布機		線錠	
	一七年	一八年	一七年	一八年	一七年	一八年	一七年	一八年
總計	110	134	3,649,210	3,893,553	27,683	29,333	185,996	333,684
英商上海	3	3	153,310	153,310	1,000	1,000
日商上海	3	10	1,010,000	1,050,000	8,556	8,900	27,544	261,744
其他	11	13	387,233	435,016	2,540	2,547	1,010
計	47	46	1,550,553	1,643,680	10,896	13,547	27,544	263,684
其他	1	1
計	110	134	3,649,210	3,893,553	27,683	29,333	185,996	333,684
其他	1	1
計	110	134	3,649,210	3,893,553	27,683	29,333	185,996	333,684

這個統計由資產階級報紙的說明，也是說由於濟案發生抵制日貨，全國統一而一起，實際濟案發生後，各地排日運動多受政府干涉，并且所謂統一的去年，同時也是到處混戰的一年。自然，資產階級只有這樣說明纔能引起人家去排貨，

去幫助他們統一。

由上表看來，中國紡績工廠在去年一年中增加了五個，紗錠和線錠都是增加的，日本紡績工廠雖減少一個，但紗錠和線錠仍然還是有增加。可見在去年那種可憐的狀況之下，紡績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發展的趨勢。抵制日貨的結果，日本的紗錠和線錠也都增加起來。排英運動在去年是沒有的，并且去年李濟琛還把沙基慘案的紀念碑拆毀以保證中英的『友誼(?)關係』，但英國的紡績業在中國境內還沒有多大起色。排貨運動的解釋可說是最皮毛的解釋了。我們以為假使申報大主筆先生也曾看到李先生等的大著之後，定會拍案自喜說：『吾道不孤了！』

申報內按着一個統計，謂本年內還可以開工的紡績廠如下：

廠名

地點

紗錠

布機

申新八廠

上海

四〇、〇〇〇

濟生

上海

未詳

益豐	華昌	宜昌	普益	雍裕	遼營	沙市
大倉	紹興	宜昌	山西	山西	營口	沙市
未詳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五〇			九六	

上面屬於華商的。

廠名	上海第五	大康	公大第三	豐田第二	裕豐第二
地點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紗錠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布機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上面屬於日本的。

由我們看來，輕工業的發展在半殖民地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發展中是

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因為這可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擴充，家內紡績業的破產，賃銀勞動者的增加，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等等事實。但是，若由李立三們看來，這不過是輕工業，算不得什麼資本主義，因為這是供給帝國主義的『原料』？

其實在今日世界經濟密切聯繫中，帝國主義固然要到處奪取原料和商品市場，但並不是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專為供給原料和銷納帝國主義的商品。所謂殖民地化的意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展，而是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雖然發展，終不能脫離帝國主義宗主國的統治。更不能說沒有重工業的發展便算不得資本主義發展。到底要多少重工業和多少輕工業的配合發展纔算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呢？這個問題就是那些喜歡講『數量』的不肖門徒們也是不能答覆這個『數量』的！殊不知正因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經濟有了有機的組成，於是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發展重工業，能夠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

方法。這也是由於帝國主義輸入商品——特殊的商品，即重工業所生產的進步之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

實際上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給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原料；并且帝國主義也有供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

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原料：

原料種類	年代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二年
燐寸材料	四九五,〇〇〇	二,二八一,〇〇〇
棉花	三,〇一七,〇〇〇	三五,九六七,〇〇〇
合計	三,五一三,〇〇〇	三八,二四八,〇〇〇
		四四,八一三,〇〇〇兩

這表證明所謂只要中國原料的帝國主義在九年中也不斷地增加輸入原料到中國來，并且所增加的價目在九年中竟達到十五倍。

現在再就去年七月至十二月各國對華輸入的棉紗看看：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九二七年(同時期)

增或減

日本	一〇、一五四、五一七正	一一、八三八、一三二正	減一五%
英國	二、四五二、四五五		增七五%
美國	三三、〇〇三		增三九%
德國	九三、一一九		增四八%

帝國主義這樣地供給原料來幫助中國輕工業發展，這又使機械論者摸不着頭腦！然而，他們唯一的回答便是：這無非是帝國主義「輸入」的「商品」！

於是不肖門徒恍然大悟說：原來「原料」即「商品」，「商品」中也有原「料」！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掠過程中，只有向兩方面——即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擴大交換的領域、擴大商品的生產、擴大剩餘價值的剝削範圍。也就是說，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趨於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至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獨立與否，是不能破壞和代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法則的！所以，不管中國成爲帝國主義怎樣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中國社會可因帝國主義的統治而逃出资本主

義發展的公律！或如經濟學家的王學文先生所新發明的：『中國經濟實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新思潮 No.5.P.23）我們只懂得列甯所說的：『資本輸出影響輸入資本的國家的資本主義之發達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發展。所以，資本輸出的國家的發展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擴大與尖銳化。』

我們只懂中國是輸入過資本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有時雖被阻於某種限度；但中國畢竟還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之擴大與尖銳化』的一部分！

潘東周說：『所以，帝國主義經濟必然成爲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發展的障礙，這并不矛盾，這正是馬克思辯證法的基本原則。』（社會科學講座第一卷 P.288）這正像李立三先生所解釋：『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一語，乃是辯證法的觀點一樣有趣的無恥！

『辯證法』是個矛盾邏輯，『錯誤』是最矛盾的事，因此，在形式主義者的思

考領域內一切『錯誤』都可成爲『辯證法』；於是他們把一切『錯誤』的思想都要找『辯證法』做護符！所以市僧、文氓、不肖門徒、機械論者，都可以在『不矛盾』掩蔽之下，站在一邊貼着『辯證法』的商標到處招搖撞騙；世界上之侮辱馬克思主義還有比此更甚的嗎？

四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通常先在城市中發展，首先在工業領域內發展。而農業經濟大部分長留在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上，至於已經受着工業影響之下的農業經濟的生產便會帶着另一性質。

中世紀的農民家庭幾乎完全就是自給經濟的公社，他們不僅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產手段，並且自己建築住宅、家具、織布、縫衣等等。他們固然也到市場上去，但所出賣的只是他所生產多餘的東西，所購買的除生鐵以外大都是奢

侈品，並不是他們生存主要的對象。

城市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便把農民的手工藝排擠了。因為城市工業發達，便採用了進步的技術製造許多農民所需要的生存對象。於是農民漸漸把自己許多生存手段依賴於市場的供給，便漸漸失去了過去一切手工藝的技能，自是農民家庭也失了獨立的可能性，就是說，若不和市場上發生交換便不能生存。更確切些說：「不出賣不生存！」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愈發展，則農民的原始家內產業便愈崩潰，愈使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他們現在對於貨幣的需要不僅為購買次要的對象或奢侈品，並且為着購買最必要的東西。沒有貨幣他不能從事經營自己的經濟，再也不能生存。農民取得貨幣唯一的方法，便是把自己的生產物變成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兇年饑饉的結果，他們得不到貨幣時便出於借貸，於是便把自己的土地抵押於重利盤剝者；漸瀕於破產，結果使他們轉變為無產者而與土地分離。

中國農村也和一切社會一樣，也要受着歷史發展一般公律所支配的；不過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過程，其促成的主要因素，雖不全在於本國城市工業，而在於歷史上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長期侵蝕與夫價廉物美而有射擊力的帝國主義商品。然而，在閉關時代以前商業和高利貸就已蠶食自給經濟的基礎，在中外通商開始之後，帝國主義商品之侵入農村正是蒸蒸日上無可遏止。這樣便不斷地引起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之增加；同時發展了農村的交換關係；農民家庭手工藝技能漸漸因一切必要日常用品靠市場的供給日漸消失。這樣生活之依賴於市場不得不將自己的生產物變為商品向市場出賣取得貨幣，購買日常所必要的東西。從前自給經濟時代，他們一切生產為滿足自己家族的需要，現在他們要滿足自己必須先去滿足別人，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把自己所創造的生產物出賣之後，得到貨幣再向市場交換日常所必需的用品；這樣，農業經濟再生產的行程必須依賴於城市的交換。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貨幣的需要亦不斷地

增加，於是農民沒有貨幣便不能夠生存。天災、水旱、賦稅、遺產分割，等都是使農民逐漸依賴於高利貸者。中國農村中的高利貸者則多半係帝國主義的經紀人、商業家、一部分鄉村富農。農民迫於窮困而借債，結果不得不把家財和土地抵押，而這些經紀人、商業家等等，更因自己資本蓄積的微弱，城市中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浩大，只得逃到農村中用少量的資本投到土地或借債以剝奪農民。農民既在高利貸資本宰制之下，要挽救自己的最後危亡的運命，只有用盡自己一切的勞動；然而，終竟得不償失，流於破產，土地漸為債主所有，而自己便投入鄉村無產階級的隊伍中，或作雇農，或向地主佃地耕種，或流為兵匪。於是農村中階級分化和對立的過程便漸趨顯著。一方面便是農村中的新式地主、高利貸者、富農，另一方面，便是佃農、半佃農、雇工等等，我們現在試舉一個統計來證明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事實：

中國農民分量表

有土地的農民(地主亦在內)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無地的僱農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佃農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游民兵匪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上表有土地的農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中便包含了所有的主地、富農、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那末，我們從這裏約略可看出，在地主和富農剝奪之下的佃農和僱農有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了。再加上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兵匪游民，失去土地的人口計有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就是證明在中國農民中有半數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

然而，在有土地的農民中（當然照上表包括一切地主計算）的土地又怎樣分配呢。

貧農(一——一〇畝)

戶口數的百分比

四四%

佔有土地面積百分比

六%

中農(一〇——三〇畝)	二四%	一三%
富農(三〇——五〇畝)	一六%	一七%
中小地主(五〇——一〇〇畝)	九%	一九%
大地主(一〇〇畝以上)	五%	四三%

這樣我們可得出一個結論；全農業人口中有土地的佔四五%，無土地的佔五五%，只有五千萬的地主和富農，便佔有八一%的土地，這裏無論如何都要證明兩個在資本主義制度影響之下的事實：

1 土地的集中；

2 農民向兩極分化。

任他李立三和新思潮先生們，怎樣的爭辯說，這樣結果係帝國主義侵略所致，而不是中國本身民族工業發展的影響；那最少限度也不能說，這是封建關係統治的結果使然罷！恰恰相反，農民的破產墮落，與土地集中到執有貨幣的地主手裏去，更是表現封建領主經濟基礎的崩潰與向着新興的地主讓位的。我

們固然可以在一般的言語上可說『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我們不能在經濟學的研究上隨便的說『有地主皆封建』！因為地主不但在封建社會內部有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也有的。可是這兩種地主在本質上業已不同了。因此，我們必須研究在封建時代地主怎樣地佔有土地；今日中國農村中的地主怎樣的佔有土地。其所處的條件與中世紀時代有什麼不同。

五

在封建時代，人民對於領主的經濟從屬之最普遍狀態，便是把封建領主看做人民所賴以生存的全體土地的所有者，如孟子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形一樣。因為當時農業在社會的生產生活中演了最重要的作用，封建領主當然也要完全支配土地，同時亦就支配人民。所以，封建領主佔有土地的形式完全靠政治上的特權，并非由什麼自由買賣的方式購買來，領主的土地既直接由

權力佔有而來，於是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便也取着公開露骨的形式。領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並不是隱存在交換和欺騙掩庇之下的。農民不能隨便離開土地，而要拘束在土地上面以供領主的榨取，這種榨取的主要的形式：第一是強制勞動；第二是付納租稅；這些剝削完全是對領主統治下的『義務』性質。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農民乃是租借地主土地而支付地租。這時代的特徵還是封建主義常保持有『超經濟的強制力』。

在中國土地關係上雖然還存留着許多封建制度的殘跡；但在土地佔有的關係上很普遍地是以貨幣購買土地的新式地主佔絕對優越的地位。可是這種地主絕不同於封建時代的領主。他們佔有土地并非單純從自己政治上的特權霸佔來的，而是由於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條件之下，他們用貨幣購來的。我們不管這些地主貨幣的來源如何，（或由工商業中積蓄的利潤，或因重利盤剝的結果，或從作了貪官污吏軍閥等搜括來的，或從帝國主義供給的等等）但他們要

取得土地必須向農民購買的。而農民向這種地主出賣和租佃土地，多半帶『自願』的性質。地主也不能強制農民去租佃他們的田地。建立在這樣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上的土地佔有形式，地主自身不是把自己當做政治上特權者來剝削農民，而是藉其在經濟上握有萬能的貨幣向農民進行榨取的。這一類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單純的地主或兼工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富農等等。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不外把地租當作投資的利潤和利息來看待的。所以，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五〇%或七〇%）！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若在富農直接僱用之下的僱工，其受資本主義方法的剝削更無疑義的了。

至於中國土地上剝削形式的複雜和剝削程度的厲害則完全受舊時代的歷史和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殘跡所影響。但也僅是表現形式上的特異，而不能表現中國地主對於農民剝削之經濟上的實質與內容。

中國農業經濟中能夠代表時代的特徵的便是交換和地域分工的發展，這樣就充分地表現了農業經濟的生產很廣泛地都是爲市場而生產，也就是說，農業生產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的。這種商品生產決不同於商品發達初期的偶然交換，或把多餘的生產品提到市場去交換，而是以交換爲出發點的去進行生產以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要求。

當着封建時代領主固然因爲要滿足自己的精練欲求，有時也會利用交換，但交換總是例外的事，他的大部分必需品還是從農民身上取得來的。自然品貢獻本來就是表示這時代的特徵，因爲領主的必需的消費品，係直接由農民供給的。所以，這時領主對農民剝削的主要目的是在『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中國今日的地主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於農民直接供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消費品，——實際上農民已經沒有可能直接製造近代地主所消費的一切必需品了——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納給地主以近代本資本主義社

會最流行而時髦的商品——生產物或貨幣——至於這種地租由地主看來，是他的耗費購買土地的資本上應有的利息；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

中國農村中階級分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商業家的地主、佃農和流民無產階級之平行的增加；這些現象最主要的原因係中國海禁未開以前『獨立』發達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已有長期的在農村中破壞封建經濟的基礎，造成農村中農民破產的普遍現象。於是鄉村人口過剩、農業危機、戰爭騷動等等在一方延續農業經濟的衰落和停滯狀況，另一方面又不能使生產方法自身很快地過渡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使無處容納這廣大的破產農民。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品侵入農村更急劇地促使廣大的農民破產，農民破產的結果脫離土地，農村生產更趨衰落，於是乎使舊時靠着剝削農民爲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

族、官僚，也因此站腳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經濟掠侵而結果之貧困的農民、要出賣自己的田地，即舊式的望族宗室也要將自己的土地整批出賣的。其次，城市的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已開始發展，但大部分還是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民族工業以資本積累的薄弱，不能與帝國主義工業對抗，於是擁有小數貨幣的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者，便趁土地上投資輕本厚利的機會出買其土地來了、這是新式地主發生的重要原因。農民破產的急速，使城市新式資本主義工廠無法盡數容納，於是一部分流為農業經濟中的雇用工人之外，另外的破產農民則移於海外，如到南洋、新加坡、菲律賓等處，最後則流為兵匪，造成了軍閥制度強固的基本部隊。這些都表現着中國資本主義之工業發達還不能適應封建勢力急劇崩潰的需要。最後大多數的就出租地耕種以維持自己垂亡的運命。於是佃租制度便成為中國農業經濟中最廣佈的現象。這種佃租制度完全建立在新式的——即資本主義的——土地佔有形式的基礎上面，與封建領主的

『賜地』是截然不同的。中世紀領主對於農奴的關係，主要的乃政治上特權者對於奴屬的關係，而土地的佔有形式主要的還是靠政治權勢來維持（固然有時農民因借債而成爲農奴）；因此，領主對農奴的剝削是取公開的形式，農奴不能自由離開土地，而中國佃農對於新式地主的關係主要的還是貨幣的關係，佃農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這種佃農與新式地主之間無論如何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雙方同意爲前提，這種佃地關係亦如城市工人把自己的勞力出賣給資本家一樣，不管資本家把工人的工作延長二十小時也好，極端進步的合理化也好，支付極低微的工資也好，在工廠內隨便打罵工人也好；但在法律上雙方都應有『名義』上的平等，是以交換爲原則的。所以，新式地主對於佃農也是在地租的形式掩蔽之下掠奪了一部分剩餘價值。

所以，在中世紀的農民解放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在廢除封建領主的特權，

使自己排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縛（如一切『超經濟的強制力』等等）變成爲自由生產者，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使自己變爲資產階級；中國農民最主要的并非土地私有制不自由而是大多數缺乏土地，也就是農業經濟中的生產者最重要的一個生產工具——土地——的缺乏。因此，要解決中國農業上的根本問題，就要剷除現存的佔有制度，而佔有中國廣大土地的，又不是維持舊時代殘存下來的貴族、宗室，而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資本家；總之，佔有大部分土地的只是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工業家、買辦、商業家、高利貸者、富農。中國不但沒有與城市工業資產階級絕對對立的地主，而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又是直接間接作了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農村的忠實經紀人。因此，中國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城市和農村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并且也要推翻帝國主義之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切特權！

六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不但推進了和擴大了中國國民經濟中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斷的發展，并且也推動了和加緊了農業經濟踏進資本主義的領域。我們從上面農業經濟生產技術進口之不斷的增加，和佔有農業全人口十分之一的三千萬雇農，和佔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一萬三千萬的佃農；便證明農業經濟中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以及農村資產階級勢力與數量的增加；換言之，即農村中資本主義關係之不斷的擴大。

我們上面業已說過，帝國時代的基本特徵便是向外投資造成壟斷。所以各帝國主義輸入中國的資本對於中國殖民地化和資本主義化都具一樣重大的意義。國際帝國主義直接的投資如建築鐵路，海關政策，外國銀行的兌換等等；間接借款，就是戰爭的賠款等等加重了中國國債的擔負，與一般經濟的和政治的不獨立。幾乎全部的重心都架到農民身上。強迫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爲帝國主義剝奪的對象。農民家庭工業的破產，使農業經濟的結構根本起了變更；就是

長久的發展以交換爲目的農業生產。

在交換經濟統治中國農村的條件之下，中國農業經濟大別可分如下數種：

1 手工業式的農業生產；

2 爲販賣商人而經營的農業生產；

3 純粹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生產。

第一種經濟的特點，就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直接有交換的關係，此種經濟多爲近於城市之小農經濟，這些小農經濟把自己的生產品如荳類、蔬菜等等供給城市。這些經濟普通不用僱傭勞動，以自己家庭勞動爲主體而工作。城市愈發達，城市居民增加愈快，此種手工業式的農業經濟亦發展得愈快；這種農業經濟在中國農村中是最普遍的現象。

第二，爲販賣商人經營的農業生產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這種經濟也和手工業式的農業一樣，包含大批小農，他們生產表面上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

實際上却完全依賴於商業資本，這些商業資本家大部分是帝國主義間接的買辦或經紀人向這類農民收集大批的原料；所以他們的生產主要的為供給外部市場，經過販賣商人的仲介把生產品傳達給各地消費者或出口，在實際上，他們只是在自己家內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利潤的家庭工人。這種經濟好像城市中家庭手工業者在家內為大工廠部門製造某部分半製品，成如裝訂圖書、粘貼商標、製造匣子等等，由工廠主或經紀人供給原料；在形式上好像還是獨立，而實際就是坐在家裏為資本家做工。這種經濟得以普遍，其基礎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大了內外市場，又使小生產者沒有與市場直接發生關係；另外，農村生產者的數目較城市工業生產者為多，生產品超過於內部市場實際上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加以生產品大批出口，於是便造成了販賣商人的壟斷。這種農業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其說是生產品超過市場的需要，無寧說是因為貨幣關係的發展和農民的破產，致不得不將生產品出賣的。

第三，就是純粹資本主義性的農業生產；他是以資本主義形式生產和以資本主義形式出賣的。這種經濟是依照資本主義企業的原則組織的，牠包含了資本主義生產各個根本的現象，如僱傭勞動、投資、爲利潤而生產等等。關於這種農業經濟的例證泰羅爾曾給我們許多的材料，他明白地說，農民是在起分化，一方面形成富農；另一方面形成破產的農民，脫離自己的經濟。出賣自己的勞力以維持生活。於是——一方面發生無地或極少土地的僱農，另一面發生剝削僱傭勞動的富農。泰氏說到中國農村中資產階級的形成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話，他說，一部分農民因商品經濟的發展漸漸變成鄉村的小資本家，這種小資本家一方面租種土地，剝削僱傭勞動，另一方面經營商業，取得額外利潤。佃農本來是農民中最痛苦最受剝削的分子，因爲他們是藉納租而生活的勞動者，但蕪湖佃農却與此相反。那裏的佃農，一方面是租地生產的農民；另一方面又是僱傭勞動的剝削者，而在剝削勞動以取得過度的利潤，中國農村資產階級一部分

就是這樣形成。

這些事實不但證明資本主義關係可以在農村中長足的發展，并且關於蕪湖的佃農更足證明他們與地主的關係絕不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了。假使這種事不限於蕪湖一處，那麼中國土地關係的問題上，我們就敢斷定已是十分正確的了。

至於中國農業經濟中很多地方都採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已實用蒸汽甚至電氣摩托與電抽水機來灌溉了。在常州一帶，用電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約有稻田四萬餘畝。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機，即以煤油和石油為發動力的抽水機。此種抽水機在五年前已開始試用，一九二六年僅在滬寧路一帶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幾個工廠差不多完全為此種抽水機而生產的。

此外農業企業亦日漸發展，春米機器多係英國產的，在揚子江一帶尤為推

行。產棉區的榨油廠日益發展、產茶區製茶企業之普遍、沿海一帶罐頭和煙草企業之日漸發達，都是不可置辯的事實。

如販賣商人經營農業的經濟，在產米區最爲發達；蕪湖一縣爲中國米糧出入最豐富的區域，那裏有幾十個代辦的商號，在任何鄉村內都有販米商人的足跡。在蕪湖城內的穀物交易所內，有米多種，又有一定的價格，與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聲氣。秋收時候，春米公司以新式機器舂米，運往上海、芝罘、甯波、廣州各地轉爲銷售。

最後，荳、棉花、絲、茶、桐油等等銷售尤廣，大都都供應國際市場。

中國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中另一形式便是外國資本參加中國農產品的製造。如山東英美煙公司的經營，便是用這種形式投資於農業經濟。此外中國資本直接投於農業生產的事情我們也常可看見。廣東的米廠和糖廠，中國中部等處的棉田，都是例證。雖然年來政局不靖（如內戰、土匪等等），這些企業還

是發展。農業中的大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他地方，如察哈爾也有。固然山西北部每年有大批農民來到這裏開荒，但此地沒有開闢出來的土地還很多。農民春季來到這裏工作，秋收後便回去。農具、耕牛、種子、居屋等等都是地主供給，甚至一部分食糧，也是向地主借來的。在其他省內，我們也可找出大的農業企業。特別是滿州里地方純粹的資本主義大企業最爲普遍。

總之，不管中國農業經濟中土地雖然多集中於小地主手裏，但資本主義式的大地主也必然會隨經濟的發展而繼續發生和增加的。但不管怎樣，目前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統治者無疑的是，鄉村的資產階級；即列甯所謂『農業經濟中三位一體』兼作地主的高利貸者，商人與富農。

七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并非現存社會中唯一的生產形式。與這種生產方法同

時并存的還可以遇見（保持到現在）資本主義前期生產方法的殘跡；從另一方面在國家經濟或公社經濟與協作團體的某些形式中業已可能發現新的、更高的生產方法。所以，資本家階級與僱傭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不是現代社會唯一的矛盾；與這兩個階級同時并存，在於兩者之間還有許多社會的中間、上層和渣滓的其他階級：一方面就是貴族與宗室，另一方面便是各種的浪人；他們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前期社會形式的產物，一部分也由於資本主義自身的需要而發生，或最低限度說，由於他們維持自己的發長的形態。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利益和運命始終是在現社會基本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生死決鬥來決定；但同時也不能忽視這些舊時代的遺物在政治和經濟的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這就是我們不允許人們否認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同樣也不允許人們否認中國還存留有資本主義前期一切的殘餘，不過我們要確定那一種經濟勢力是居於支配的地位罷了。

我們假使深入中國農村中看一看，我們必定可以發現許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陳跡。我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族長社會、純封建式的地主，並且還可以遇見中世紀的人口買賣，大家族之畜婢養奴；此種制度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並且有由於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商品掃蕩了農村之後，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不但要出賣自己的田宅、家具、財產，最後爲償還債務或履行宗族祭祀還要出賣子女妻兒。許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權慣例，而今日軍閥制度的存在，苛捐雜稅、拉夫、勒索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遺孽。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以至於雞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擔等等無疑地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隨處可以找到。然而，這些都不過證實歷史進化過程中遺留下來的一些殘餘；而不能在現時中國經濟生活中佔最重要的地位。固然，這些複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

殘餘渣滓足以阻礙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但也不過障礙罷了。這種障礙的作用并非積極地征服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而是日暮途窮向不可克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作最後頑強的抗爭。總而言之，起消極的反抗作用罷了。這種反抗正如城市手工業行會制度之抵制資本主義產業一樣，結果一敗塗地。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是發生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是承認中國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殘餘存在；但我們承認舊制度的殘餘，并不否認新制度已經發展而且發展到了有支配舊制度所殘留的一切勢力的程度了。

在歷史上具體的事件中，過去的成分（如專制、農奴制度、君主、特權等等）與現在的成分（如，私有財產制、僱傭勞動等等）以及將來的成分（社會主義、財產共有等等）自然不會不有怎樣絕對的分明；都是前前、後後，交互錯綜的。我們要理論切合於實際，便不得不顧慮到歷史的具體事實，并且不得

不根據這些事實來證明我們的理論。同時，我們要真正確切地了解歷史的具體事實，便不得不以這些事實作為研究的資料而從事於抽象的理論之研究。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因此，我們不得不最後進而討論一些關於不肖門徒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中之方法問題；我們就在下面開始罷。

八

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第一步的變節企圖便是拋棄辯證法；因此，他們一開始便向機械論和形式主義投降！因此他們第一步進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便是以數學運動的說明來代替了物理運動的說明。

1. 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經濟和民族工業。

不肖門徒們根本不了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的關係是構

成有機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於是便發展了機械與孤立的結論。如潘東周則以爲：『帝國主義經濟必然成爲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障礙』，王學文則以爲：『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這種狀態壓迫之下，無論如何得不到發展的條件』，如李立三則以爲：『帝國主義要維持中國做他的純粹的商品市場，極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

我們上面已曾舉出了許多事實證明中國整個國民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勢力的發展是毫不置疑的了。現在只是指出他們方法的錯誤罷了。

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最後的一階段，也可說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發展到最完備的系統。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所以，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便具國際的性質，帝國主義不過把這種生產之最後的擴大範圍罷了。因此，在世界經濟領域內在邏輯上各個國民經濟只是世界經濟一個單位，一個部門，這好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各單個企業成爲國民

經濟的一個單位，而企業內部的各部門又是該企業的一個單位。但無論如何是有機的構成和存在自然和社會的分工。若把各國民經濟、各企業、各部門隔絕起來不生關係，那末，整個世界經濟再生產便無法進行；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生產便無法進行。所以，資本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正如各企業、各部門營業的先後隆替一樣。但無論如何都是要擴大商品的生產。在先進國的境內每多是發展重工業，在後進國發展輕工業，這種現象很類似各個國民經濟中某一企業生產生產工具，另一企業生產生存方法的現象一樣。我們不能說，生產機器的部門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和要素；生產日常生活的部門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他一樣要擴大生產商品和剩餘價值的行程。所以，殖民地雖然偏重於輕工業方面的發展，但仍是資本主義關係的向前發展。

不成器的馬克思主義門徒李立三們，最可笑便是不懂『國民經濟』的本質是什麼？他們以為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一切工廠、礦山、銀行、鐵道等等都不是

屬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以內，所以不得不將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國民經濟』兩個概念含混起來。因此，一見某部分民族工業受打擊或發展緩慢，於是便結論說：中國國民經濟不能夠發展，甚至說受帝國主義的束縛不能發展？！他們不了解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帝國主義企業和民族企業就像各分立企業的相互關係。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正如他自己國內各企業間之互相排擠一樣。某些企業有時因資本力量的薄弱被大企業排擠而倒閉，但佔優勢的企業還是發達的，這樣排擠作用并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排擠中國民族工業，一樣不能證明帝國是完全破壞整個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要想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領域內，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破壞別的企業。所以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帝國主義資本和民族資本好像在世界經濟一個部門內合股經營；不過資本家內部不一致，大資本家想吞併整個企業傾軋小資本家一樣，資本家的傾軋固然可以影響於營業方面，但主要

的目的還是要這個部門營業可以發達，要使小股東受大股東支配罷了。實際上，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也沒有自由意志能夠限制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中國資本主義成分經濟的發展是受資本主義發展客觀法則支配的。資本家時常要多取利潤改良技術，結果技術提高不變資本增加，可變資本減少利潤下降，最後違反他的目的。只有從機械唯物論轉到唯心論的墮落的不肖門徒，纔會結論說：帝國主義『只許』中國怎樣，『不許』中國那樣，等等鬼話；他們完全走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營壘中去了。

2. 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不肖門徒們最反動的理論，便是武斷地斷定帝國主義在中國維持封建勢力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甚至說最近中國封建勢力完全復活起來。王學文很大膽地說：『這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內的交互作用進行不已，遂使中國經濟因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常處於二大壓迫力之下，日益被壓迫與破壞。』這裏

不但說帝國主義維持封建勢力，不但中國境內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能發展，而且整個國民經濟還要日趨於破壞！這樣看來，好像帝國主義在中國完全代表封建社會的利益的！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固然，在一個社會內部因經濟層次的複雜，在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重大發展，有力的破壞了封建制度；同時在某些落後區域還有新生的微弱封建勢力。但是這裏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中，封建勢力只是起了消極的抵抗作用，而日趨於衰落，並不是取積極作用日漸擴大。比如說在中國農村中貨幣經濟的急激發展，固然一方面也可以使鄉村中繼續發生人口買賣、奴婢童養媳、姬妾等等，甚至一般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常常因促農民加重高利貸的剝削。但是，在整個方面看來，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發展資本主義呢？還是維持資本主義

以前的一切封建和半封建的勢力呢？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常常保持舊時代的一切殘存制度來適應資本主義自身的利益，但我們決不能說資本主義因此反要去維持封建勢力使自身不能發展。歷史上的事實可以數見不鮮，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反利用一切破產貴族來推翻舊制度，即在現時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意大利、日本尚利用皇帝的統治形式來代表資本主義的利益。我們固然要承認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但我們不能說，英國、日本、意大利的資產階級的要維持封建勢力，所以，英國、日本、意大利，受此資產階級所維持的封建遺制的阻礙，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最明顯地，宗教制度是十足的中世紀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當資產階級向宗教作激烈的鬥爭之後，便感覺到利用宗教對於他們是很有利的，於是便允許『信教自由』，扶植基督教勢力的發展，我們能夠說，資產階級是保衛封建勢力嗎？主要的這時宗教的形式雖仍舊存在，而內容業已改變，牠不是代表封建社會的利益而是代表資本

主義社會的利益了。

中國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制度，不但帝國主義盡量想利用去統治中國擴充自己經濟的勢力即資本主義的勢力，而中國資產階級不管是獨立的、買辦的、半買辦的也都想利用軍閥來擴張自己的經濟利益，然而，結果，不管帝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礎崩潰愈速，軍閥愈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據而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爲他們所充分的役使；實際上，中國今日軍閥制度已經失去經濟基礎，所以，不依賴帝國主義，便依賴於買辦工商業者和鄉村的新式地主。機械論的觀點，往往只是直覺的，他們看到了樹木不見森林、一見了森林，便頭暈腦亂他把構成森林的樹木忘記了。

事實上又怎樣呢？中國自辛亥以來，沒有一個軍閥不勾結帝國主義，然而

目的還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不但帝國主義的工業發展，即民族資產階級的工業也是發展。日本在東三省維持可說最得力，然而，東三省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更是擊破了不肖門徒冥頑不靈的腦袋！但他們無言可說之後，又用他們機械論最重要的法寶——形式邏輯中的『例外』作救星，說『這是他的特殊原因！』（李立三）

所以，這種思想不但是馬克思主義之淺薄而庸俗化的曲解，而且簡直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他們不但把資產階級的統治看做中國目前主要的力量，並且根本否認了有資產階級統治的存在，一切罪惡歸到封建身上，替資產階級掩飾迴讓。這正是近來陳公博譚平山鄧演達一班人所努力的工作，然而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最得力的還是我們『理論中心』的李立三先生！他公開同中國工人階級說：『總之無論是誰，除掉他是佔領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局部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主要的基礎放在封建剝削方式——封建生產方法上；因為在生產

落後，農村經濟佔優勢的地方，決不能從海外找資產階級的基礎，從天上掉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來的。」他在別處還舉許多事實證明南京都要恢復到封建秩序去。這很顯然地說，除江浙以外中國是沒有資產階級的，並且資產階級要到海外去找，他們現在沒有政權，因為還要等着『天上掉下』來！這樣將得出什麼結論呢？中國廣大的區域內不但資產階級沒有政權而且還沒有資產階級本身！即使有了資產階級的存在大概他們還要一度進行奪取封建政權的鬥爭！假使，這種鬥爭發生時候我們不曉得這位李先生站在那一邊！我們這裏要再說一下，我們說資產階級統治，並不是說不要與封建和半封建的一切殘餘鬥爭！我們把李先生這段最標本的欺騙工人階級的誑言介紹一下，想覺悟的讀者一定會理解他的反動性到若何程度！

3. 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

新思潮們把商業資本在封建經濟中『獨立』和『優勢』的發展與商業資本不獨

立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發展完全混亂起來；所以到處發生矛盾的論調。如潘東周一方面說：若有人以為長期的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便可以剝弱封建的關係，這便完全是反科學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又說：『……商業資本主義，一方面固然破壞了粹純的封建制度……』他們根本把破壞純粹的封建制度的『破壞』還不算得『剝弱』是什麼呢？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的商業資本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全部都是『獨立』和『優勢』發展時候的與生產分離的商業資本一樣看待。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的性質，而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為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這種商業利潤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買辦形式專門為帝國主義即直接屬於外國資本家的買辦或本國工業資本家由生產部門中抽取一部分資本向農村購買原料；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

自身業已失去自身的『獨立』和『優勢』了。還有許多省分中有這樣的商業資本，如各大商店的商業仲介人與經紀人等等，對於家庭手工業的生產，逐漸形成很大的作用，如供給家庭手工業者以原料，並為之銷售整批的製造品。此外還有仲介人或經紀人先向家庭手工業者定貨，然後再向他們領取製造品，而付以一定的包工工錢。這正如列甯所說：『家庭手工業者實際上已等於僱傭工人，在自己家裡為資本家做工，這種仲介人的商業資本，已變成工業資本了。』（全集第三卷）另外，還有許多商業家把資本投資於土地生產上面去的。實際上現在中國還是上列這種商業資本很普遍的發展。這些商業資本的作用完全與商業支配工業時代的商業資本的作用不同的。至於高利貸資本在中國農村的發達，並不是因為封建制度基礎強固的結果，反而是因為農村中侵入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的發展使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增加，因此更加劇農村高利貸資本的發展。然而無論如何獨立和優勢發展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是封建經濟

發展的產物，終於破壞封建經濟的基礎，促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兩者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和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中國今日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發達并不能機械的證明封建經濟的強盛與發展。

列甯在俄國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一書內關於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關係說道：

『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發展得愈有力，那末工業資本的發展便愈見其薄弱（此外所謂工業資本是指資本主義的生產）。反之，前者愈薄弱，則後者愈見其強固了。』

『因此我們俄國情形就得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俄國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同工業資本之間是否相聯繫？在打破了舊生產方法之後，我們的商業和高利貸者是否能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來代替那舊的，抑還是用別種生產方法來接替？』

『這些都是事實問題……照一般民粹派人們的見解，以為富農和小康農民所表現的并不是同一經濟現象的兩種形式，而是毫無相互關係且互相衝突的兩種經濟現象的形式。這種見解是毫無根據的……事實的論據所說却是相反。農民是否為着擴大生產而僱傭工人，農民是否在那裏買賣土地（按列甯的意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便是有真正的自由土地私有權；『這私有權乃自由投放資本於土地之障礙物。』如果保持這種土地私有權，『那麼資本不得不用繞道的形式——如農民與地主的土地典押、高利貸之役使農民、出租土地給有資本的人去耕種等等形式——侵入農村』。『因此，土地的典押與高利貸可以說都是免除土地私有對資本自由侵入農村所給與的各種障礙。』——作者）或雜類商品，他們是否在那裏用細麻、乾草、家畜等等做買賣，或是用貨幣來使交易（高利貸者就屬此例）。再則，在俄國一般的鄉村資本的作用并不是僅僅在奴

役和高利貸上表現完盡了的，這種資本同時也是爲生產而流轉，我們看見富有的農民他們不僅是投到商業上的建設和企業上去……而且還把牠投入改良經濟、購買及租借土地、整頓家財、以及僱傭勞動等等的途上去。假使我們農村中的資本，除造成奴役和高利貸之外，便創造不出什麼東西的話，那末，就關於現有生產條件而言，我們不能確切斷定農民的分化，和農村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那末，全體農民就都只是代表被貧困所窘迫的一種農戶的形式，在這些農民中，祇分出一部分高利貸者，而他們之所以特出，只是由於他們貨幣財產之多，而不是由於農業生產範圍和設備來的。總上所述，就發見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我們的農村中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之獨立的發展，是「阻礙」農民的分化的，商業資本的發達就是使鄉村與城市接近，排除了原始的市場，破壞了鄉村店主的壟斷局面愈是向前進行；而歐洲式的正確信託制

度若愈發達，擠倒了鄉村的高利貸者，則農民的分化將愈迅速而深刻的发展。從小商業和高利貸所括剝來的那些富農的資本，就轉向到範圍更擴大的生產事業上去，這種過程現在已經開始進行了。』（列甯全集第三卷第二章第八節）

很顯然地中國農村中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主富農和城市工業家都是處於交相錯綜的關係，也就是或多或少的與生產事業有密切的關係，其『獨立』發展的成分比較薄弱。所以，在中國農村中不但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沒有阻止中國農民的分化，而且因為商業和高利貸的發展農民的分化非常劇烈。農民中不但有僱傭工人，自由買賣田地，雜類商品、細麻、乾草、家畜等等；并且還買賣到必要的糧食如米、麥、穀物等等。農民之普遍的用貨幣做交易那更不必說了。

機械論者只知道商業和高利貸的發達，馬上便得到結論以為封建經濟佔優

勢，他們忘記了馬克思所說的『獨立』發展。他們不懂得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和高利貸的發展在某種條件之下比封建時代還要厲害的。他們不懂得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過渡性。以為不是資本主義便是封建！

4. 生產關係、剝削關係、技術。

機械論者更沒有深切了解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也把技術的作用一概用機械的觀點來了解。他們不了解中國農村中土地所有權本身就是生產關係之一種（馬克思說：『生產關係用法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財產關係。』），牠是決定生產關係中的分配關係。剝削關係本身也就是分配關係之一種，牠自不得受資本主義制度的私有財產關係所決定。沒有資本家佔有生產機關，沒有空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自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僱傭勞動，和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上的交換關係。不肖門徒在承認中國農村土地佔有關係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形式的佔有，同時又用技術來解釋不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他

們根本不了解鄉村生產關係可受城市生產關係發展的影響而有所變動，這都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今日世界資本主義已發展最高度——彼此經濟生活都締結了有機而不可分離的聯繫。固然，在整個世界直到現在假使都還沒有進步的技術，那便表現現社會物質生產力所發展的階段還是處於很低級，自然不會發生更高的新的生產關係，或且現在中國的農村與城市還是在互相隔絕的時代，鄉村中沒有更高的技術，自然也表示着生產力的衰弱沒有更高的生產關係。然而，已經密切聯繫了，那末，農村的生產關係不會受城市的影響嗎？實際上，問題并沒這樣簡單，以為『沒有新式技術就不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怎樣的判別經濟的各時代的社會關係和剝削關係和技術的作用呢？他說：

『區別經濟的各時代不在於生產，而在於由什麼勞動的工具，怎樣去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並且也是在那社會關係中間完成勞動的指示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他在別處又說：

『骨骼構造的遺骸，對於研究滅跡的動物的組織有重大的意義；勞動工具的遺型，對於研究社會經濟的組織，有同樣重大的意義。』（資本論，第一卷，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說只有一種新的技術，便可發生新的生產關係。而是說，有新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纔會發生新的生產關係，自然，物質生產力不像新思潮派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似乎只等於一種技術，實際上，牠包括技術和人類勞動自身。馬克思的基本觀念：技術是測量社會經濟制度最好的標誌，並不是說只靠一種技術纔發展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還說：『機器若不供諸勞動行程，那便是無用的。』（全上）

當然，進步的技術對新的生產關係發生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經濟的各個時代的區別到怎樣去生產。並且還要注意到外來的關係對於這個經濟領域的影

響。歷史的發展是曲折複雜的，不像新思潮派的眼睛那樣直，頭腦那樣簡單。中國土地佔有關係完全受城市和帝國主義商品衝入的影響。這種土地之資本主義佔有關係上面，自然，更容易促使在土地上的剝削關係漸次發生變化。列甯說：『農民愈是脫離土地的狹小狀況，愈是掃清地主壓迫，愈是脫去中世紀社會關係和土地關係，愈是脫去奴役的淫威，那末，農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也愈厲害。』（全集第三卷）我們自然不能也和機械論者一樣，以為土地佔有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形式，就相信在這土地上的剝削關係也馬上就是十足的資本主義形式。但我們總可相信，土地佔有關係應是決定在土地剝削關係之一個重要的因素。

最可笑的就是他們抱定以中國農村的剝削形式來作說明農村經濟封建本質之唯一論據。特別是以數量來決定一切問題。他們認為封建剝削關係主要的論據：『地主向農民徵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

農民』，『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自然品地租』等等。其實這都不是主要的方法。我們以為地主自然要『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的，這正如資本家要依靠資本權來剝削工人一樣。因為土地是農業經濟中的主要生產工具之一，同時在中國的土地佔有關係上又是他用一副貨幣購買來的商品，他不靠這個剝削農民還靠着什麼！至於『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這更不足奇怪，資本家向來是不參加生產的，地主假使要參加生產，他便失去其純粹剝削者的資格！至於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這並不證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要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為重。資本家所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通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如說，工人每天六小時的工作便可維持他自己個人家庭的生活，但資本家常要工人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在現社會技術進步，生產合理化的結果，恐怕工人被資本家所剝削的還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罷！他們根本不了解封建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形式上根本的不同不在於剝削數量之多少，而在於公開的強制性

之如何。封建領主雖然公開地強迫農奴的貢稅，但當天災水旱還幫助農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在形式上平等和名義上自由之下悲慘的剝削工人。列甯不但說過自然品地租是封建制度剝削的形式，並且還說，有時貨幣地租不過是自然品地租的變相。但這就是形式上說明地租的本質，並不是『教條』式的教導我們自然品地租一定是封建剝削的實質。正如他所說，貨幣地租不一定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一樣，我們知道，社會上有許多東西還是保留着舊的形式而帶着新內容，有的蒙着新形式而且着舊的內容的；假使，貨幣地租只是代替貢稅以義務式的去交納地主，這仍然不失其封建性質。假使自然品地租代替了剩餘價值或資本利息的形式去交納地主，這已經具有着資本主義的性質。中國農村這種關係是非常錯綜的，形式主義只是把農村中的剝削關係都歸納到封建上面去。此外，在西歐也有不少的事實，如當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威尼斯和法羅斯商人也有利用奴隸勞動的（從近東運來的奴隸），但這種剝削的實質，無論如何不

是封建式的而是資本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常因技術提高造成大批失業之後，這些被擯斥的失業者往往爲自己生活所迫，反跑到落後家內工作爲最後逃遁藪，然而，在這種落後技術的家內工作上，完全帶着另一性質。過去婦女和姑娘的家內工作，純爲滿足自己家庭的需要，此地是爲着資本而逐日工作的；因爲在家裏很慘酷的受着資本家剝削的。難道這裏也可說沒有新的技術不能發生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嗎？形式主義者只看到形式，因此，他們只懂得工人的兒子要做工人，雇農的兒子要做雇農；却不懂得，他們之所以做工人做雇農，被人剝削，乃是因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財產關係存在着。因爲資產階級佔有一切生產手段。他們除出賣勞動力以外便再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出賣。可以維持自己生存；也就是說幾乎不受這種剝削便不能生存。

由於他們專以剝削形式來做基本的說明中國經濟制度，於是他們便不得不專去剝削關係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他們一切的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

鬥爭，不能更進一步。簡單的例子就是：不沒收富農土地，不沒有資本家財產。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所認的封建剝削太厲害了，資產階級只要他們實現八小時的工作制便夠了，因爲八小時制的剝削沒有地租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那樣厲害，所以是允許的！他們不懂得地租本身就是全社會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全社會的剩餘價值是在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的基礎之上發生的！

5. 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

不肖門徒們之錯誤蟬聯不絕的發生就因爲沒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之故。他們不但不了解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而且把『領導』作用與『支配』作用分開。世上那裏有『領導』不『支配』，或『支配』不『領導』的事實嗎？我們可否認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領導』，而受其他階級『支配』；能否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權力是受資產階級『支配』而爲別階級所『領導』的嗎：新思潮派一貫的認定封建經濟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居『支配』的地位，他們同時又承認城市資

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矛盾，於是便不得不乞援於詭辯術以圖自圓其說，於是潘東周便藉這個法術大出風頭說：『什麼叫城市經濟領導着農村經濟呢？就是農村經濟的發展，他將要隨着城市經濟發展的方向而前進。城市既是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則農村經濟一定也是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就是他發展的方向說，絕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質說。』這種解釋自然有潘君自己的苦衷，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欲蓋彌彰，醜態終是百出的！我們這裏先發一個問題：在純粹封建經濟沒有資本主義城市的時候的社會經濟受着什麼經濟『領導』呢？這種經濟是否也是走向資本主義發展，或走向其他經濟制度發展呢？最初的資本主義城市受什麼經濟『領導』來的呢？講『方向』的先生們！請指示，指示我們了解這段大著意義的『方向』罷！

最大膽不過的便是否認『領導』和『支配』之『質量』的作用，而代以『數量』多寡來說明！

這樣毫無經濟內容的見解，我們最好請馬克思自己來答覆好了，馬氏說：

『每個社會形態，都有優越於其他生產部門之一定的生產部門；因此，那種部門的條件便決定其他部門的地位和作用。』

『一切其他顏色都沉溺在這普遍的光芒裏，并依那普遍的光芒的特殊性而改變它。這是特種的以太（ether），牠決定表現於以太中的一切存在之特別比重。』

『我們且舉游牧的民族爲例，（特別從事於漁獵的民族，處於實際發展起點的境界）在他們這裏可遇見着一定形態的農業，土地所有權零散地就由這些農業形態所決定的。這土地所有權就是集體的，并且這種形態保持到多少程度，要看這些民族所固守的自己傳說到多少程度爲斷，例如斯拉夫人的土地所有權，在有定居的農業之民族——這種定居已是一個大進步——那裏農業是優勢的產業，如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裏，

產業自身，牠的組織，以及與牠相適應的所有權的形態，多少都帶有現行土地所權的特性；社會或可說完全依賴於農業的社會，如在古羅馬或如中世紀城市的組織中都是模仿樹立於農業中的關係。資本，她還算不上純粹貨幣的，即在中世紀，處於手工藝（？）等等傳統工具的形式中，這都具有土地所有權的特性。

『反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內，農業僅僅漸次成爲產業的一部門，并且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這樣。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凡土地所有權處優越作用的地方，自然關係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資本處優越地位的社會形態中，支配的作用便轉於社會的和歷史上所創造的要素。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完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便是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她應當造成起點與終點，并且她的概念要在土地所有權的概念之先發展的……。』（馬克思經濟學批評導

言。

馬克思怎樣注意土地所有權和資本的性質，而我們潘先生偏說『絕不是就她本身的性質說』馬克思怎樣地指出封建時代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支配』（領導）經濟性質之不同，在從前城市跟着鄉村後面模防鄉村農業關係，在近代土地生產成爲城市工業生產一個部門。我無須此地廣事發揮了，最好要大家自己去吟味馬克思的整個意見好了。不過我們一定要說一句話爲馬克思辯冤，就是向讀者諸君公開宣佈：『潘東周的意見不是馬克思主義乃是潘東周主義』！

在中國農業經濟中很顯然地一切經濟生活都是爲資本主義公律所支配，如在鄉村中所發生的資本主義最重要而普遍的現象：商品生產、無政府狀態、定期的農業危機、農業人口中的階級分化，最基本的事實，農業經濟中假使沒有貨幣，嚴格的說假使沒有與城市交換不能進行農業經濟的再生產的，這難道不是城市『領導』鄉村的『性質』的關係嗎？難道今日中國農村可以一天不和城市發

生關係而可以走到他所要發展的『方向』去嗎？這樣的發展決然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從馬克思主義隊伍內發展了不肖徒們！

6. 矛盾、發展、革命。

用孤立、不動、直覺的觀點去考察事物就是機械論的特色。因此，他們看見到了矛盾便忘記了發展，看見了發展便忘記了革命，看見了革命就忘記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現在簡單的舉一些來說罷：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矛盾也，李立三們看來，這矛盾沒有解決之前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然而，資本主義永遠是在與封建勢力不斷的矛盾之中發展出來矣；結果阿三忘記了發展！關門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由史達林看來一個國家單獨可以和平發展不須世界革命很快到來社會主義建設可以勝利的，技術書記先生忘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來『四個階級聯盟』可以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攜手并進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最後矛盾爆發，『統一戰

線』分裂，革命失敗，千百萬工農犧牲，書獃子忘記了矛盾！

不肖門徒觀點的『孤立』在那裏表現出來？就是沒有看到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發展與世界經濟——或可說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聯繫，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城市也是有密切的聯繫。他們只看中國農村比城市落後中國比外國落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抵不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於是便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他們根本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的界說，只能縮短資本主義的局面，但不能跳過這個局面的真理！他們跑到俄國民粹派方面去了。他們只懂得資本主義制度與封建關係矛盾，又忘記了資產階級已取得了政權。不信任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由於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社會發展的公律所支配，反而去拿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和『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來說明中國的工業發展，他們不知道沒有大戰以前中國工業也是開始發展的，他們不懂得抵制日貨運動恰恰由於民族工業發展的結果，並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以先抵制

日貨後纔去發展工業。固然，世界大戰和抵制日貨對於民族工業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如果以這些事實，來作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根本上之原則的說明，必然得到的結論就是：世界不大戰，中國不抵制外貨，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簡單，沒有世界大戰時和沒有抵制日貨的過去中國經濟是否發展呢？進一步說，世界大戰也許可以把中國拿去做戰場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破壞，抵制外貨也可以使外貨進步機器不能進口的。解釋問題說明歷史不求之馬克思主義初步真理，而採取庸俗主義的皮毛論據，最後，發展了不肖門徒！

『不動』的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不了解一切事物依賴於時間和空間的條件。一則曰，『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要根據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上』；再則曰，『農村中沒有一種新的生產技術，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因之也就沒有造成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喂！中國農村經濟中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嚴格地應說只有少數新的生產技術——而堂乎皇哉而絕對真確的

XX黨六次大會的決議便大書特書：『土地所有關係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蘇聯並沒有比英、美、德更高明的技術，何以會有無產階級專政，何以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何以有新的生產關係，而英、美、德，還沒有一個最主要的生產關係，無產階級領導全社會去生產呢？

機械論者蒙着中國文化落後的恩賜，得施行其對廣大多數革命青年腦髓中深入『客觀任務論』的毒劑。到處廣事宣傳『革命性質』由於『客觀任務』來決定，他們的觀點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觀任務沒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質就不能改變，也就是革命性質『不動』！他們不了解革命的『完結』與『完成』，他們不了解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的階級相互關係來決定，因此，只相信不動的客觀而不信任能動的主觀，於是便從機械論的不肖門徒發展到宿命論的不肖門徒了。

他們忘記了土地革命（土地國有）乃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最基本的任務之一，然而資產階級，有的因為害怕的向私有土地進攻，恐會破壞一切私有財產

權；有的因爲自己已經領有土地，所以，永遠不能履行這個歷史的任務！列寧說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並不會指示我們純粹的土地國有』。我們難道可以說，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等國，資產階級沒有把土地國有的所謂『客觀任務』完成』，那末，未來的革命還不能『超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範圍』，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嗎？！當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二月革命之後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在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寫道：

『1. 舊時的俄皇政權，祇代表很少數的大地主，他那發號施令的整個兒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官僚），已經崩潰取消，但還沒有打死。帝制制度在形式上還沒有消滅……極大的農奴制度式的大地主制度還沒有取消。』

『俄國的國家政權已經落到了一個新的階級手裏，就是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手裏，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俄國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

命已經終結。』

這裏很明白地指出，革命性質的轉變，由於社會階級相互關係的轉變來決定，而不是由於『客觀任務』完成來決定，因為此時『極大的農奴制度式的大地主還沒有取消』。就是說，所謂客觀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所以，列甯特別以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爲斷定當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已告『終結』。『終結』之後繼之不斷的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

列甯以後根據自己十月革命的經驗在革命四週年紀念的講演中還說；

『無論任何國家中，當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已經終結之後，始終不能完成其任務，而我們於幾星期之內，便把這些問題解決了……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相互關係，前一個革命可轉變到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附帶解決第一個革命的諸問題。第二個革命以堅固第一個革命的事業。』

這裏不僅指出任何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不能完成其任務，并指出只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纔能夠把這種任務『完成』！不動的『客觀任務論』乃目前中國革命最有毒質的革命送命湯：不僅以農民的落後思想來欺騙工人階級，實際上，就是預先替未來革命發展中的羣衆開了一條到坟墓去的死路！

現在再來說說他們『直覺』的觀點罷，這也不過是機械論的一個特質罷了。具着這種觀點的不肖門徒觀察事物，只是偏面的：看見了正面便忘記了反面；看見了反面便忘記了正面。只是直線的：看見了凸處便忘記凹處，看見了凹處便忘了凸處。所以，他們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穩定的估量。便只看到資本主義世界在戰後經濟的發展，而不看到整個世界階級力量的對比。當他們做出結論時便說：資本主義雖然是暫時——自然界和社會內部一切都是暫時的——穩定，但是資本世界整個的矛盾是不斷的緊張，資本主義世界愈趨於崩潰！這裏他們只見到『矛盾』不斷的緊張，資本主義愈趨於崩潰的凸處，而恰恰忘記這

個『暫時』穩定的凹處。他們這種論調完全是形式主義空洞無用的公式！人們必然地一天天與死的日子漸近，我不能以為知道人們之必死和一天天漸近於死自相誇大；因為在漸近於死的整個歷程中還有辯證的曲折，有因病發生很大的危險，身體突然弱衰；有時恰因病後身體反而復元超過病前的發育而更加長大，然而，無論如何他最後要死亡的，但是，我們能否因為他的必死，時刻把他收殮在棺材裏邊去呢！他們在反面只懂得封建勢力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忘記了正面資本主義發展有自己的法則不怕封建勢力。他們只懂得反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封建經濟的產物，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不了解另一面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削弱封建經濟基礎，使舊生產方法起解體作用和作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必要的條件與出發點！在中國問題上，也是這樣，他們始終以中國革命失敗是『暫時』的為理由便不斷的高喊所謂『高潮』來；自然，假使革命的失敗不是『暫時』，而是『永遠』的，那末，我們更何

必再談革命呢？坐在家裏等着死亡，不是死也要得着安閒，何須爲無結果奔忙呢？正因爲是『暫時』的，所以要注意到在『暫時』失敗中應當怎樣做，怎樣使以後的高潮快些到來，怎樣使革命更澈底的勝利。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是失敗，但在『暫時』的學究字義推敲之下便成爲『馬上到來』；實際上，就是沒有承認革命的隊伍被敵人打得粉碎。於是，便如法泡製背誦公式，統治階級雖然『暫時』壓服革命，但內部矛盾日趨緊張，日趨崩潰（自然不日趨崩潰，矛盾不日趨緊張，革命失敗便是『永遠』的了）。於是，經濟罷工也是革命高潮；兵變也是革命高潮；工廠倒閉也是革命高潮；統治階級分贓混戰也是革命高潮。這時便忘記一個主觀的客觀之革命羣衆組織和自覺，只憑金錢來開張各級黨部，在鄉村中招兵買馬，自僱羣衆上街示威以進行其『盲動政策』和『軍事投機』！

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革命危機和一般經濟危機。革命危機是處於舊社會將要崩潰，新社會將要誕生的緊急關頭，最主要的表現爲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該

社會代表主要經濟力和生產力的階級——爭取政治政權的鬥爭，而定期的經濟恐慌，如資本主義社會十年一次的危機，或因自然條件的影響，如天災、水旱等等，乃社會經濟力尚有充分發展時期所習見，并且資本主義每次經過每次危機之後，生產力常是向着新的更擴大的基礎上發展。他們完全不了解每種定期危機乃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必經的法則。固然，當着經濟危機，當着統治階級內訌的時會，常是適逢真正革命的局面，并且這種局面最有利於革命階級爲奪取政權的改變社會制度的鬥爭；但是，并非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革命的局面。機械主義者的不肖門徒即因爲不了解這個，於是便造成了瘋狂的盲動主義，驅策革命戰士向着無出路的境地走，而供無結果的犧牲。這就是他們沒有整個了解矛盾，發展之辯證的革命過程！

馬克思主義遭遇之不幸在中國亦和世界其他各國一樣；受人塗抹、篡改、曲解、庸俗化……是更僕難數的。然而，我們的任務不但在於從馬克思和

恩格斯所情願『讓給耗子們去囓嚼批評』的許多著作中去找尋化石的真理，同時還要堅忍不拔地和馬克思主義不肖門徒作不可調和的思想上鬥爭！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於上海。

我們的反批評

——對於『新修正派』與『徒叛的機會主義者』的答辯——

因為『五里雲霧』籠罩着的中國思想界，同時人們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又鬧得像『烏烟瘴氣』一般，在政治苦悶生活中的我們，迫不得已起來第一次公開地向『新修正派』開火，在動力雜誌上，相繼發表了兩篇論文，目的在乎挽救『馬克思主義』之被『曲解』與『修正』，并藉此，作為提倡研究『中國社會經濟

結構』的濫觴。這樣『論戰體』的文章中，實踐材料的不充分自不待言，然而，在基本理論的說明上，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抱佛脚』與『囫圇吞棗』研究的產物。一切缺點的發生，自然，不得不委諸我們所處的『時期』和『生活條件』與我們以冷酷的限制。

我們的主要論敵，固不是弱者，他們逞着『炙手可熱』之史達林式的『粗暴尊嚴』，對於這樣足以『凌辱』他們而有莫大歷史和革命意義的『挑戰』，既不能『唾面自乾』，那末，對我們的『反攻』自不必說。可是，直到今天，還只有極微弱的迴聲和無來由的造謠、中傷、誣蔑、謾罵。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自古已然。何況落後的而同時又充滿了時代落伍者的中國；怎麼對此前進的思想，能不帶着十三分濃厚的醋意呢？

於是乎，來了一批『牛鬼蛇神』自命爲『中國經濟研究』大專門家，又『想』做『中國左派反對派』，其實是機會主義者出身的叛徒之『某些人』，偷偷摸摸地

冀從『過左』的一邊來『鬼混』，向我們作不關痛癢的『襲擊』。這些先生們之『誇大誑妄』與『不自量』，比之史達林主義者來，只有『過之無不及』！他們在『中國經濟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很自負地誇耀自己如何有『經驗』，有『理論』，有（？）『研究』！把自己和自己如膠似漆的朋友都描寫得好像在中國革命中第一流老資格的『革命專家』一樣，可謂『目空一切』地以冷眼看待他們所視如『眼中釘』的『後生小子』。畢竟這些革命『前輩』和『元老』對於他們自己的『老師』、『長者』是否存有『敬先賢先聖』之意呢？不！他們昨天還是史達林、布哈林主義之最忠實的守成者和宣傳家，換句話說，模範的機會主義者；而今天却於『五分鐘』之內，由於自己『個人利害』的觸動，馬上變做『過左』的一翼，背棄其原來的主人與長上，這未免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很可憾的！既是這樣有經驗、有理論、有研究，『想』『重新建立理論』的老革命家和大學問家，又何用擺着不可一世的英雄架子，『互相標榜』以作『先聲

奪人』之計呢？這未免太蠢笨了罷！

袁子才說得是：『行己立身，如坐轎馬；要他人扛，不必自己扛。』我們很誠意地向這些先生們盡一忠告：『請你們還是少作點足以污辱「中國革命運動史」篇幅的事業爲妙；「爲我鬥爭」是不值得的，而且也不會成功的！』

不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劉序』中所引的話）人們要來說革命的『漂亮話』，我們是絕對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他們的；這正如我們沒有方法足以阻止他們的『叛變』一樣！但是，我們應否對於敵人偵探而『冒充』革命的叛徒，不加以無情的『揭穿』和嚴密的『防備』呢？當然是應該的，而且必要的！

是的，革命的『良心』（？）『昨日死』了，『今日生』下了向敵人告密的『良心』！這是一個『否定』；向敵人告密的『良心』又在『昨日死』了，『今日生』下了再來革命的『良心』；這是『否定之否定』。在這種情形之下，任誰也不敢相信他

不會再來一次『第三個的否定』；我們爲要避免預防的許多麻煩起見，只得老不客氣地請他們『滾蛋』好了，不要再來玷辱我們的旗幟罷！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現在且將人們所非難的各點，一一解答於後。

二

現在先來一說『新修正派』吧！

史林達主義者人們，以百般忍耐不住的憤恨心腸想來作排脫『新修正派』

這個頭銜的苦戰，到底是無望的，可悲的失敗了。他們當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自己的機關報——紅旗日報——上，發表了兩篇大文，意即來指出我們的『錯誤』（？）并爲自己辯護說，不是『新修正派』。然而，事不瞞真，『新修正派』的本相和原形恰恰就在這兩篇文章中活現出來的。

『史達林在此，百無禁忌！』

該報大主筆先生曾這樣地埋怨道：『在動力雜誌的第一期中，他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除却暗箭中傷蘇聯，說蘇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說蘇聯新興資產階級有復辟的可能，整個世界將回復於資本主義的統治……企圖削弱羣衆擁護蘇聯的鬥爭情緒。』

本來『暗箭中傷』就是史達林及其門徒的能事。我們在那裏和那篇文章中說過『蘇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呢？我們承認蘇聯是國際無產階級的祖國；對於牠是擁護的，對於濫用權力的史達林及其徒子徒孫可不擁護的了。我們不但要熱烈擁護，同時還要向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羣衆公開警告說：蘇聯國內外有許多困難；內部有資產階級復辟的可能，外部有帝國主義直接破壞和消滅蘇聯的可能。也只有這樣纔能使全世界的革命階級懂得這種危險性，自覺地起來『擁護蘇聯』，提高他們的『戰鬥情緒』，也只有史達林主義者纔放膽否認蘇聯國內外這些困難和帝國主義與國內資產階級有推翻蘇聯無產階級統治

的可能性！也只有他們纔幻想在一個國家內祇須在蘇聯的國門之外掛着一張：『史達林在此，百無禁忌！』的符咒，便可關起門來從事和平建設？！假使蘇聯沒有被消滅的可能性，那末，還需要你們這些只知搖旗吶喊的『口頭革命家』做什麼？你們要『擁護』什麼？你們反對帝國主義進攻什麼？只有和平主義者，他們主張蘇聯現在什麼危險沒有的人，纔是『企圖削弱羣衆擁護蘇聯的戰鬥情緒』！

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

這位革命大家還說：『所以，根據取消派（？）的見解，帝國主義的統治是非常合理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是有進步的作用，能破壞封建關係和建立比較封建制度進步的資本主義經濟，並且到如今仍是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的，因此當然中國不必驅逐帝國主義，不必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了。』

十足的狂狗亂吠，無的放矢！誰告訴你們說，中國革命可以『不必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呢？難道你們要承認資本主義制度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勢力，比封建勢力還要落後嗎？只有最反動的史達林主義者，纔認爲資本主義的統治『是非常合理的』！他們只要推翻封建勢力，驅逐帝國主義便滿意了，他們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取『若即若離』的友誼態度；他們說：『要等到資產階級向我怠工時，纔沒收他們的財產』；他們說：『這種沒收是政治的沒收，而不是經濟的沒收』？！何謂『政治沒收』和『經濟沒收』呢？他是不能答覆這個開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新紀元的『滑稽辭句』的！世界上從何處可以找到『不』『向我們怠工』而幫助我們革命推翻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假使是這樣，他們根本不能成爲資產階級了！我們肯定說，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在歷史的地位上是比封建制度進步的，牠是到處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擴大剩餘價值的來源，擴大工人階級的勢力，絕對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關係。但牠對於我

們的統治却更爲堅固、更爲慘酷，因爲牠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反動的。所以我們要在中國和全世界取得政權與勝利，要得到解放，就必要把牠的統治推翻得干干淨淨！

中國是『複雜的資本輸入的國家』麼？

紅旗主筆的理論家最後尙自鳴得意道：『客觀的事實與取消派(?)的理論完全相反(?)，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雖然在中國建築了數千里(?)的鐵路，開辦了幾個(?)工廠、銀行，稍微(?)灌輸了一點(?)資本主義的種子到中國，雖然帝國主義的確也是猛烈的破壞農村，但是他并不破壞(注意！并不破壞——作者)農村中的封建關係……固然不錯，列甯說過，資本輸出對資本輸入國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不是簡單的(注意！不是簡單的——作者)資本輸入國，而是殖民地的國家……。』

這段話不啻是他們承認自己錯誤和『反動的供狀』！

『客觀的事實』的確『與』『新修正』派的理論完全相反。因為，『客觀的事實』是：『數千里』，『幾個』，『稍微』，『一點』；『帝國主義的確也是猛烈的破壞農村經濟』；但是在『理論』上又『但是他并不破壞農村中的封建關係』！

真正豈有此理！帝國主義既是與封建勢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綫上，在歷史的地位上絲毫不比封建制度進步，在中國『擁護』『封建關係』，何以『帝國主義資本的輸出』又有『雖然在中國……建築……鐵路，開辦……工廠、銀行……灌輸資本主義的種子到中國』的可能呢！既然『帝國主義的確也是猛烈的破壞農村經濟』；則『農村中的封建關係』，立足在什麼經濟的基礎上面而『并不破壞』呢！一個頑皮的小孩子要開他父親的玩笑，向他說：『爸爸！我吃完了雞蛋之後，會使牠的外殼仍舊「并不破壞」。』他這愚蠢而不肖的父親竟拍案叫絕道：『好囡！你真是個神童！』可是『神童』在世間是沒有的。

史達林主義者，隨處都想在「殖民地」的「特點」掩庇之下來澈頭澈尾地進行「修正」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反動工作！列甯在那一本著作中，那一篇文章中，那一次講演中，有說過「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只對於所謂「簡單的資本輸入國」纔「有很大的幫助」？！列甯在那裏主張過「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對於所謂「不是簡單的資本輸入國，而是殖民地的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幫助，甚至於障礙呢！難道在世界上還有所「複雜的」資本輸入國麼？！難道現在的中國、印度、南非洲各處的殖民地國家，仍舊都是保持着帝國主義勢力未侵入以前的現狀麼？！其實，列甯對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意義之中心思想和基本概念，還是着重於指出先進國對於後進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列甯說：「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生產；現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難道「殖民地國家」不是落後的後進國麼？！難道史達林主義的理論不是明明白白地反了列甯主義之「新修正

派」的理論麼？！

戰爭性質呢？戰爭影響呢？

這位先生，同時也是虛偽的革命家之最本色的伎倆，便是把別人的文章加以「宰割」後來個極無恥的造謠。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他又在紅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荒唐大論，他說：

「他們（指我們——作者）把革命和軍閥戰爭平列起來，他說「……歷來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內戰是否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呢？是的，任何戰爭，革命，都是破壞生產力。」（讀者注意！他只引這一半，後半便故意不引出來了。——作者）所以，據取消派（？）的見解軍閥戰爭和工農革命都是一樣的……同時更抹煞了馬克思主義認識革命是發展新的生產力，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的意義。」

這是何等的無稽！我們是說明戰爭、革命對於生產力發展之因果關係和反應作用，他竟然造謠說我們把革命的性質和軍閥戰爭的性質『平列起來』（？），這種含血噴人的鬼把戲是欺騙不了明眼人的！此外，好像只有他們懂得革命的意義，而我們好像只看到革命『是破壞生產力』。我們且把他們所不敢引用的後半意見舉出來，想聰明的讀者，當不至受這種卑鄙的文氓所愚弄！我們在那裏繼續寫道：

『可是任何戰爭、革命，始終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這種生產力發展之結果的戰爭、革命，對於生產力的破壞只限於暫時的；（注意！）并不是以消滅社會生產力，并且經過這戰爭和革命之後，生產力更在新的更擴大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馬克思說：『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動力第一卷，第一期，『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P.26.）

難道上面這一段話，說得還不明白嗎！？

誰用「數量」決定問題呢？

他接着又來一個滑頭。他說：

「取消派（？）又引托洛斯基的話，「正因為這種資本主義佔主要的地位，我們纔能真正的說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的遠景。」他們完全犯了孟雪維克的錯誤，把無產階級的領導看成數量的領導，而不是無產階級政綱的領導。」

如此想『倒打豬八戒一耙』，却露出了自己『狐狸的長尾巴』；未免太淺薄、無聊、可憐、可笑！

本來以『數量』去決定問題，乃史達林主義衣鉢相承的家傳秘訣；我們正因為以『質量』的關係來決定中國『資本主義佔主要地位』，痛駁他們以中國農村的『數量』超越城市，斷定封建關係居支配地位之反動理論；而他老先生却在這裏

作似是而非的強辯！『他們完全犯了孟雪維克的錯誤』，他們以為只要一個『政綱』便可領導革命；單憑着一個空洞的『政綱』就可以領導革命嗎？只有孟雪維克纔忽視了『政綱』以外的『政策』和『組織』的作用；因此，他們很自信『僱傭來的』市僧、文氓、富農、小政客，都可以在『政綱』（？）領導之下去幹革命！這豈不爲是他們這一輩子『卑劣無恥』的小醜們自己寫照嗎？我們再舉一段證據給革命的讀者看看，到底是誰個『看成數量的領導』？

我們在結論中說：

『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內以質量的關係便可決定的！譬如列甯說俄國小生產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社會主義成分的經濟居領導地位。中國小生產一樣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資本主義成分的經濟佔領導地位。』（同上P.33）

還有什麼可以狡辯呢？『新修正派』先生們，可不要這樣下流罷！

蘇聯可以離開資本主義世界而『孤』立存在麼？

他們的確好像懂了一點理論似的，又來一套一知半解的議論。他說：

『取消派（？）又藉口『帝國主義世界是整個的經濟系統』，而說，『中國不得不依賴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既是這樣，中國當然是不該獨立了。當蘇聯無產階級國家已存在十餘年，他們還認爲世界經濟是整個系統，顯然的否認蘇聯的存在，否則便是把蘇聯也看成帝國主義國家。他們根本不認識世界上兩個社會制度，兩個經濟系統的對立。』

誰向你們說：『中國當然是不該獨立』的呢？誰個『否認蘇聯的存在』呢？誰個『把蘇聯也看成帝國主義國家』呢？『新修正派』人們污濁的手是不足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的！他們公然把蘇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看做『孤立的』兩個

經濟系統的對立』很顯然地，是曲解了列甯主義對於蘇聯目下社會主義制度的觀察；露骨的表現了不懂唯物辯證法的機械論的真正面目！

把二十世紀的世界截取一個歷史上的特殊階段來看作帝國主義的時代——這時代仍舊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賡續。但是，這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業已完成了對全世界的支配與統治。這種截取，是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看作靜止的部分來作抽象的研究是正確的、合理的。同時，把各個國民經濟從邏輯上與整個世界經濟分立出來當做個別的靜止各部分（亞洲式的、古代的、封建農奴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等等社會形式）來作抽象的研究也是正確的、合理的。可是，抽象研究的結果必需歸結在具體的實際事實上面；并應當慎重地注意到局部與總體的聯繫及其相互關係。

『新修正派』人們，把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看做只有兩個完全孤立之對立的經濟系統和社會制度是錯誤的，是明顯的事實的錯誤！因

爲在今日世界中把分立的各國家孤立來看是不止兩個對立的經濟系統和社會制度的。我們在整個的世界和全人類歷史之特定階段看來，只能當做整一的經濟系統和社會制度來研究的。然而，『新修正派』對這個是不會理解而且不會理解的！

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分立起來孤立來看是代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在國際的聯繫上看來，是不會脫離資本主義世界的支配的；這個支配的力量是充分地在蘇聯與國際進行資本主義的分工和商品交換之上的。蘇聯經濟在國際的分工和交換的立場上看來是無計畫的、無組織的；目下蘇維埃經濟之組織化與計畫化，在國際領域內在某種限度之內（即在蘇聯政府對外貿易壟斷的極限之內）是有作用的、進步的。若果超過了這個極限是不會繼續生效的。假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到來，蘇聯也是遲早必不可免地要捲入這個混沌的漩渦中去。只有無知

的樂天派之史達林主義者，纔會否認這個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至於蘇維埃政治制度的存在，適足以證明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直接對立的沒有政治制度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尙未成立；牠不過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之一個『過渡』的社會制度罷了。牠在蘇聯前進可以促進共產主義社會之急速到來；退後可以回復到資本主義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國際的，不限單獨一個國家的；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蘇維埃制度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還只是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所發生和發展之新生矛盾勢力的表現，尙不會達到『奧伏赫變』(Aufheben)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地步；只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成立，纔是這種社會制度『蛻變』之最高的表現。這樣還沒完全排脫前時代歷史支配的勢力而轉來支配前代的歷史。假使，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範圍內勝利了，那末，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便成爲歷史的過去；那時便不是『有組織的』經濟對於『無組織的』經濟之對立，而是『無組織的』經濟對於

『有組織的』經濟之對立（同是局部與總體的對立）。前者是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全世界經濟系統內之『對立的統一』；後者是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全世界經濟系統內之『對立的統一』。前者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存在的一個對抗性，是歷史的未來成分與過去成分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不斷地擴大和發展以至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崩潰爲止。後者是歷史的過去的成分與未來的成分之矛盾；這個矛盾日趨減縮和消滅，達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完全實現爲止。前者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矛盾現象；後者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現象。反對這個，不了解這個，忘記這個的都必然地會跑到『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理論方面，而墜入機械唯物論的泥沼中去。

列甯不懂『辯證法』！

他們除了斷章取義的無理謾罵之外，還作了不少文不對題的胡鬧；現在試

來一看他們對我們指出新思潮雜誌所提出問題『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之錯誤見解的回答罷。他們說：

『他們（指我們——作者）在對新思潮論爭上，完全曝露了他們不懂得作為方法的唯物辯證法（注意呀！——作者），完全不理解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之相互關係（再注意呀！——作者）。他們把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完全對立起來（第三個注意呀！——作者），完全不理解（？）辯證法是包括着形式論理這回事。』（文化鬥爭第一卷，第二期，P.4.）

他們自信『懂』了（？）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相互關係之後，又說了些什麼呢？他們繼續道：

『是——否和否——是』這一公式，無論在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所用的意義上來講，或在黑格爾所用的意義上來講，都是要表明一切皆在運動，一切在變化這個意義。……「動力社」諸君却把這一公式當作爲

(?) 某一事物底複雜性、錯雜性看……(全上)

這位執筆的革命先生似乎讀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黑格爾的所有全集，並且好像完全了解這些全集中一切辯證法思想和意義似的之後，又大發其所謂偉論於下：

『……所以，從這一社會之經濟的發展階段的意義講，若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佔支配的社會毫無疑問的，斷斷不能像「動力社」諸君所說那樣：「這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同時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若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領導地位之時，我們同樣只能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斷斷不能像「動力社」諸君所說那樣：「這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同時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問題不在分析一社會內的經濟的複雜性，而在確定這社會之經濟的發展階段呵！』(全上)

的確是句句真理。可惜，真理中會包含錯誤的！

由『新思潮派』的革命書生們看來，好像他們所提出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一問題，是合乎『形式論理學』，是在『一定限度內有正當的存在理由』的。其實這正是『超越這一限度就要失却其正當性』的純粹資產階級的『形式論理學』。這却是對辯證法茫無所知的『新思潮派』人們所意料不到的！

其實，他們只是『機械的』懂得『形式論理學是辯證法的特殊部分，肯定地認為牠不與辯證法對立；他們却忘記了，形式論理學在與辯證法的相互關係中是『對立的統一』，當牠『超越』於『一定限度』而應用時，便是直接和辯證法『對立』起來了。換句話說，就是離開辯證法的立場去應用形式論理學，那便會與辯證法相對立的。資產階級的形式論理學之無用，并非因為形式論理學『自身』之無用，而倒是因為資產階級是摒棄了辯證法而站在『機械』和『孤立的』立場上去應用形式論理學。

辯證法是物質和萬有運動的公律。運動的體，同時在某一點內，同時又不
在某一點內，這是個現實的矛盾。辯證法就是要立腳在這個矛盾的基礎上面去
應用的。

形式論理學的原則是辯證法推理之特殊場合，亦如靜止是運動的特殊場合
一樣。兩者是彼此相互關係和影響，前者離開後者，或後者離開前者，都會失
丟其作用和意義；不過運動和辯證法是基本的、主要的。因此，我們不能離開
運動的觀點去研究靜止，正如我們不能離開辯證法的立場去應用形式論理學一
樣！

此外，物質的運動不僅在『時間』的形式中表現出來，並且還要在『空間』的
形式中表現出來。所以，物體的運動可說在某一時間內，也可說不在某一時間
內，可說在某一空間內，也可說不在某一空間內。因此『是——否和否——是』
的公式，不僅表示物質運動之時間的實際性，並表示空間的實際性。故此，這

一公式在表示物質自身內在的矛盾性時，便是「表明一切皆在運動，一切皆在變化這個意義」。若是「作為方法的唯物辯證法」的立場看來，這一公式即指示我們，在觀察事物時：不僅要從縱的方面去考察歷史的經程，並且還要在橫的方面去考察邏輯的聯繫。這是辯證法實踐應用時所不可忽視的特點，而「新思潮派」和許多「冒牌」的馬克思主義者竟然把這個特點棄置不顧了！

『我們從前作文（動力第一期內）是批評他們不應非辯證法的提出問題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這一命題的錯誤，而他們却以『隔靴搔癢』的態度來攻擊說：我們沒有肯定的答覆這個問題。這樣安得不『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呢。

很明顯地，形式論理學中有三個如下的基本法則：

1 同一律 『A』爲『A』。

2 盾矛律 『A』非『非A』。

3 排中律（不即容間位律）

『A』爲『B』乎，抑爲『C』乎？二者必居

一。

『新思潮派』先生們的這個問題，便是借用資產階級形式論理學中的第三個法則（不容間位律）而提出的。這個法則只有在極狹隘的範圍之內，即在只有兩個判定而絕無第三個判定存在其間的前提之下，這個命題方可適用的。因此，在這個命題中由推論的結果 A 若不是爲 B，那便是 C；A 若不是爲 C，那便是 B。兩者不能同時都是錯誤的；且必得出一個正確的判定。然而，資產階級的論理學家往往在超出這個範圍時，也把這一法則去應用，因此，他們屢屢碰着走不通的難關，這個難關不外是在『B』、『C』之外還出現了『D』、『E』、『F』……判定。他們爲急救形式論理學之最後破產起見，於是便想一個『例外』來通過這個難關。然而，終竟是無結果的，不切實際的！

『新思潮派』所提出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一命題，很顯然地，就是犯了上述的錯誤。他們竟敢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開始，把中國社會發展拘囿於兩個範疇之內，完全忽略了還可以具有其他種種的社會形態和階段的。據他們的意見對中國社會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只能有這樣的兩個答案，即：『中國』若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便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者說，若不是『建封制度的經濟』，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即是：『A』若不爲『B』，那便是『C』；『A』若不爲『C』，那便是『B』。前一答案是把一切『非封建制度的經濟』的諸範疇都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的一範疇包括殆盡；後一答案是把一切『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的諸範疇都以『封建制度的經濟』一範疇包括殆盡。這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毫不足怪的，假使這個問題，由『新思潮派』人們自己來回答說：『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由其他人來回答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那都不甚容易發現這個錯誤；但是，若果我們在此請了俄國的馬札亞爾和中國的鄧演

達來回答這個問題，那不但感覺到『所問非所答』，『所答非所問』之苦，同時，他們的錯誤便立時暴露出來！這時馬札亞爾一定說：『中國是亞洲式的社會形態』；鄧演達一定說：『中國是半封建制度的經濟』，也不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新思潮派』所提出的那個問題是可以適用的麼？！這還不是『超越一定限度』而應用形式論理學的麼？！竟有不讓『新思潮派』專美於前的所謂『過左』一翼的人們，而實際是正宗的機會主義者，也來附和并大膽向讀者去擔保這種錯誤！他說：

『至於革命派的左翼中，某個人（按指作者個人——作者）的理論也是很錯（？）的。他在其經濟論文裏，非難右翼（按指『新思潮派』——作者）的觀點，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注意！完全是機會主義的！——作者）一個社會中的經濟形態雖有多種，可以用『是——否和否——是』的辯證邏輯，然而考查出何種佔優勢的必要和可能。用佔優勢的來代表

全社會的經濟特徵，絕對合理。（原來如此！可惜，我們老早就知道了這個——作者）所以辯證邏輯的科學化者和唯物化者曾「在大體的劃分上，……把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定為社會的經濟組織幾個進步的時代」，因此，右翼提出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一問題，並沒有錯（注意呀！並沒有錯！——作者）。那位抄寫盧賓斯坦的經濟論文作家（按指作者——作者），對此實際問題，必須具體答覆的，竟欲用「是——否和否——是」去應付。』（『中國經濟研究』中劉光著的反修正主義論。P. P. 410——411）

說句老實話，『過左』的機會主義者和右翼的機會主義者共同承認：『並沒有錯』的一個問題，自然要迫我們不能『具體答覆』，幾乎不敢『具體答覆』；因為這是『實際問題』，於是『對此』不得不來『應付』，『應付』！何以故呢？因為馬

克思會『在大體上劃分……把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定為社會的經濟組織幾個進步的時代』。所以，我們對此，只提出『兩個』進步的時代』之『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一問題，已是『目迷五色』，更何論有『具體答覆』呢？不敢，不敢！假使有人提出這樣的『實際問題』於我們面前說：『中國社會的發展到了那一階段呢？』那末，我們就敢『具體答覆』說：『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地位』。（動力第一期，P.33）『資產階級業已取得政權』（全上N。P.66。）換句話說，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了。若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實際問題』於我們面前說：『中國社會內部經濟的結構怎樣？』我們便肯定地『具體答覆』說：

『我們此地也不妨依照列寧的方法，把現在中國各別的社會經濟層次的諸成分分別列舉於下：

『1, 原始家長制的自給經濟；

2, 小規模的單純商品生產；

3, 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

4, 國家資本主義。』(同上頁。1.P.7.)

這些由我們所認為對於『實際問題』之『具體答覆』，也就是用以『應付』『新思潮派』所提出的和『過左』的『某個人』所認為『並沒有錯』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一問題的！

哈哈！畢竟『右翼』的『機會主義』和『過左』的『機會主義』，其荒謬『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殊途同歸；是『並沒有錯』的呵！

再則，這個形式邏輯的『排中律』，若應用到一個正在歷史上過渡階段的社會形態時，那怕牠的不適用，之與辯證法直接對立，便立時可見。我們現在且舉蘇聯的實例來說。

蘇聯目下是個從資本主義達到共產主義之過渡的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依列

雷的意見是共產主義制度的第一階段。假使我們單獨來研究蘇聯的社會制度，只從社會發展幾個基本形式出發，而且按照『新思潮派』的錯誤立場，在這種情形之下來借用形式論理學中的『不容間位律』；那必定會提出：『蘇聯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共產主義社會呢？』這是錯誤的！因為蘇聯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牠是在兩者之間的過渡階段。在這個場合之內，也只有『是——否和否——是』這一公式可以適用；然而，由資產階級的邏輯學家看來是不可以的，不合理的；最大限度也祇能承認這個過渡形式是個『例外』。但是，由我們辯證論者看來，就必須與以肯定的答案斷定說：『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這并不是如『新思潮派』所說：『把這一公式當作某一事物底複雜性，錯雜性看』；而是應用辯證法的觀點來考察某一事物之『歷史的聯繫』！最後我們還要『確定這社會之經濟的發展階段』，認定牠是從資本主義達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

進一步說，我們若從整個世界的經濟系統來看，我們就不得不把蘇聯當作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總體的一部分。目下蘇聯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系統的關係，猶之乎人體中變態的某部分對於週身的關係。人類在生命的存續中，生與死的過程是相互關係和影響的。人體內細胞之分裂作用及其新陳代謝，很巧妙的表現了，生活的過程，同時又是死亡的過程。在這種場合之內，『新思潮旅』的『排中律』是不能適用的！但我們必須視某個人的身體上之生的成分與死的成分，何者存在生命進程中佔取優勢的地位，來決定其是生，是死，或有其他。譬如說，某個人身體上某一部失去作用，這并不能代表某個人身體上整個失去作用或死亡。就舉偏中的麻木不仁來說，如果這個人在未死之前，麻木不仁的部分是受着整個生理規律所支配，而保持其不至腐爛。牠要腐爛，必須等到這個人的嗚呼哀哉之後。這時纔完全受死的過程所支配。無可爭辯的！蘇聯還是一個不能離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孤立生存的社會。牠的再生產和剪刀危機等

等特有的經濟公律，是不足以支配現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而目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經濟公律如無政府狀態的總危機，等等——是可以影響和支配蘇聯經濟生活的。因此，蘇聯在世界的領域內看來，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總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說：『俄國可以說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為在國際範圍內是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的地位，并且境內還有資本主義的成分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經濟；俄國可以說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因為無產階級業已取得政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領導的地位。』在這個場合之內，也只有『是——否和否——是』這個公式可以適用；然而在『新思潮派』的人們看來，是不可解的，神異的，『斷斷不能』的！但我們若果不是研究整個世界經濟的性質，而是單獨研究蘇聯經濟的結構，那末，我們就必須把蘇聯從世界經濟系統中分立出來，就其內部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佔領導地位，確定牠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同時在國際範圍內看來，不得不說牠是：『資本主義世界總體的部分』。這也并不

如『新思潮派』所說：『把這一公式當作某一事物底複雜性看，錯雜性看』；而是應用辯證法的觀點來考察某一事物之『邏輯的聯繫』！

只有這樣，纔談得上『懂得作爲方法的唯物辯證法……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之相互關係』。

『不幸得很』！在虛偽和機詐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真理』是很難伸張，是遭人唾棄和猜忌的！因此，從『右翼』來的機會主義者說我們是『故意的曲解』；從『過左』來的機會主義者說我們是：『流於詭辯』，『投機』。夫復何言！？

我們會記得，辯證法家同時又是戰鬥唯物論者的列甯，曾在考茨基著的一本論『俄國革命的動力與前途』的小冊子上作了一篇『序言』。中間有一段關於估量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性質的問題，關於這點，列甯當時是贊同考茨基的意見而反對蒲列哈洛夫對問題之不正確的提出。蒲列哈洛夫當時會問考茨基道：『俄國到底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呢？』考茨基不客氣地譏笑他

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提出問題；是以資產階級的形式邏輯來『嘲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列甯就在這個『序言』中，作個公平的裁判者。他說：

『俄國可以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革命的動力不屬於資產階級；俄國可以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因為，無論如何，不能引導無產階級達到唯一的統治或專政……』

這裏列甯是以『是——否和否——是』的公式，來『應付』他的革命老前輩機會主義者的蒲列哈洛夫之形式論理學中的『排中律』：A是B、還是C呢？但列甯當時對於俄國革命性質的估量，是有肯定的答案說當時革命前途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但不停止於這個範圍之內。

這樣看來，列老先生原來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的『曲解』、『詭辯』和『投機』大家；我們最多也只能算做第二個罷！

三

人們既在我們面前放下『手套』，不收起來，未免瞧人不起；收起來時，又怕傷了別人的『尊嚴』。無甯收起『手套』，把『尊嚴』犧牲去罷！

離開整整三個月的上海，回來一看，好像一切沒有變改，其實已不是原來的上海了；因爲在此地的市場上又多了一本，所謂『對於中國的改造，無疑的將有重大的貢獻』之『中國經濟研究』那樣精深博大而又溫文爾雅的著作，爲可憐的中國裝裝門面。牠不但也批評和指出我們的『錯誤』（？）并且『不是尋章摘句，故爲挑剔』和『沒有成見』，更不是『吹大炮』的空前絕後的傑構！

我們以爲這位作家太客氣了，他有這樣寬宏大度不具『成見』，這是我們做不到的！我們必須抱着無產階級的『成見』來對付那般個人的『成見』，並說明他們對我們所指出的名曰『錯誤』！現在就開始罷。

『中國範圍內』有真理在。

這位『中國經濟研究』大家曾引了我們一些片斷的意見，並加以『批評』和

指責於下：

『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內以質量的關係便可決定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發生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承認舊制度的殘餘，並不否認新制度已經發展，而且發展到了有支配舊制度所殘留的一切勢力的程度了。』（動力）

『……這只是從中國土着的資本主義出發，——所謂『中國範圍內』……一切這樣的意見，都不外乎把中國的與帝國主義在華的兩種資本主義對立起來；這是不可能的。假使別人說，二十世紀的今日不能站在一個範圍內解決問題，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已構成中國經濟之一部分了，我們將要如何答覆？』（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第一卷 P.56。）

由某經濟專家看來，『中國範圍內』五個字是一種莫大的罪過似的。據這位專家意見，是否說，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只要注意到帝國主義對中國所謂『外鑠』便足夠了呢？只要注意『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問題中的地位』和『對外貿易』便足夠了呢？史達林主義者是完全忽略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之絕對作用，專門注意到殖民地的民族特性，這是右傾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這位剛從史達林營壘中脫逃出來的『過左』專家，他竟完全漠視了民族的特性，這是向左道方面走的機會主義。若果作『中國經濟研究』的大學問家，他倘是不特別注意到『中國範圍內』的許多特殊問題和社會發展基本趨勢，而只是簡單地以研究帝國主義世界對於中國的影響，便算滿足；那簡直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更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研究！也可說，連研究的常識都沒有！

當我們研究世界經濟時，我們就必須以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和主體；而各分立的諸國民經濟中的各別特性為其相互關係的要

素。當我們開始單獨研究各國民經濟時，我們就必須以某單位的國民經濟全部結構和民族特性作我們研究的對象和主體，國際關係對於這個單位的影響，作為其相互關係的要素。譬如，我們研究整個國際經濟所得的結論是：『在國際範圍內是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的地位』。（動力第一期P4.）正如我們研究中國國民經濟所得的結論說：『在中國範圍內以質量（即資本主義關係佔統治地位——作者）的關係便可決定。』（全上P.33）是同樣的方法。我們試問，當研究各單個國民經濟即世界經濟一個單位時祇注意到國際關係，而置各個國民經濟的特殊結構於不顧，可以得出具體的結論和答案嗎？列甯確定蘇聯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的論據絕不是因為由於判定國際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關係或國家統一獨立和對外貿易壟斷為主體；而倒是以蘇聯國民經濟內部結構是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分居支配地位而定的，這難道列甯不也是在蘇聯『範圍內』決定問題嗎？假使蘇聯境內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居支配地位，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或其他非社會主

義經濟成分居支配地位，那儘管蘇聯如何脫離帝國主義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干涉和影響，牠始終不能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制度』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假定目前在『中國範圍內』尙不是資本主義關係居支配地位，而是其他非資本主義經濟居支配地位，我們可以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而決定其為『資本主義社會』嗎？難道可以不管在『中國範圍內』的經濟結構如何，只要由於牠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和影響，便可決定其為『資本主義制度』嗎？再比此更淺薄和庸俗的研究專家是沒有的！

實際上，這位自負不凡的『經濟通』，不僅不懂得在『中國範圍內』有真理在；並且把我們當作『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內部』理解的『中國範圍內』五個大字，看做什麼『中國土著的資本主義』加以了解。這簡直是表現他並沒有看懂我們的文章，竟放膽地來了一個『瞎吹』！人們假使不是爲着自己要『出風頭』而故意來顛倒黑白，那怕他一定會看到我們早就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列

入於『中國經濟之一部分了』。(我們曾在分析中國經濟結構中，把第三項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用括弧註明；包括外國的、本國的、和中外資本家合資經營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為基礎的工商業資本——動力 N. 1. P. 70) 並且我們還向『新思潮派』指摘這樣的一句話：『我們最後還希望「新思潮派」諸君要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中國民族工業」弄個明白！』(同上 P. 44.) 這難道也是我們把『中國的與帝國主義在華的兩種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的證據嗎！這還不是，『尋章摘句，故為挑剔』是什麼呢？！假使若要我們『如何答覆』這個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相互關係的話，那末，我們可說在這部自命為『真是別有心得，見解超羣』的中國經濟研究未出版半年之前，便已『答覆』了的。當時我們會說：

『不成器的馬克思主義門徒李立三們，最可笑便是不懂「國民經濟」的本質是什麼？他們以為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一切工廠、礦山、銀行、鐵

道等等都不是屬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以內，所以不得不將「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國民經濟」這兩概念含混起來。因此，一見某部分民族工業受打擊或發展緩慢時，於是便結論說：中國經濟的不能夠發展，甚至於說受帝國主義的束縛不能發展？！他們不了解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帝國主義企業和民族企業就像各分立企業的相互關係。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正如他自己國內各企業間之互相排擠一樣。某些企業有時因資本力量的薄弱被大企業排擠而倒閉，但佔優勢的企業還是發達的，這樣排擠作用并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排擠中國民族工業，一樣不能證明帝國主義完全破壞整個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要想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領域內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破壞別的企業。所以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帝國主義資本和民族資本好像在世界經濟一個部門內合股經營；不過資本家內部不一

我們的回答是：

這難道也是說明：『中、外資本主義對立』的證據麼？！

『假使別人』說，廿世紀的今日『可否只限於』『一國範圍內』去考察問題呢？
『動力』(N2.P.P.46——47)

致，大資本家想吞併整個企業傾軋小資本家一樣，資本家的傾軋固然可以影響營業方面，但主要目的還是要這個部門營業可以發達，要使小股東受大股東的支配罷了。實際上，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也沒有自由意志能够限制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中國資本主義成分經濟的發展是受資本主義發展之客觀法則支配的。

『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濟問題，假使不將牠和整個世界經濟相聯繫起來，那便證明沒有辯證法的觀點。』(全上P.P.1——2)

以上的兩段意見，不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寫的，也不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寫的，而是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間寫的，不然人們將『指責』我們不但

『抄寫了獵狄克和盧賓斯坦的文章』，甚至於抄襲了叛徒理論家的意見！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羅伯爾杜斯（Rodbertus）曾冤枉馬克思說是『剽竊』了他的『剩餘價值說』的見解；我們那怕中國式的羅伯爾杜斯，還沒有這種『冤枉』別人的勇氣罷！其實，還沒有這種『能力』呵！

『沒有對立』才『沒有矛盾』。

在本題未答覆之先，我們必須再四聲明一下：即我們一貫地要把『中國民族工業』這個概念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一個概念區別得十分清楚的。

『中國民族工業』是看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受外國資本支配和資助而自己獨立創辦的資本主義企業。至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指在整個中國國民經濟系統內之一切（中間包括，中國的、外國的、中外合資經營的）資本主義企業。讀者明白了這個意思之後，同時便可明白人們之無理取鬧！現在試一看

『想』『重新建立理論』的經濟研究大家，對於我們的意見怎樣引證又怎樣地批評？他曾引我們的意見一些於下：

『當現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已到了壟斷的地步，而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不管任何形式下的競爭終於遭帝國主義最後的打擊。』(動力 No.2. P.18.)

他接着加以帶譏諷的批評和提出自己的主張道：

『左的意見中（按指我們的意見——作者）亦何嘗不承認「相對的阻礙」，變相的與右的意見一致……。」

『人們一致的說：「中國民族工業尚在幼稚時期」。』(中國經濟研究 P. 129) 『我們則中、外「一視同仁」』(同上，P.152)

這是何等的淺薄無知！而且故意地截斷我們的整個意見！

我們現在先來補足我們被下流的經濟研究家所糟蹋整段文字之後，再來批

評他們的庸俗見解罷。我們在動力第二期十八頁上的意見是這樣：

『若說中國民族工業能夠痛快的發展，使中國達到完全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這當然完全是一種幻想！因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不但操縱一切財政機關，並且在政治上得了許多優越地位，尤其使中國關稅不能自主。況且……（注意！這一段是任先生細割下來的上面所引的話——作者）……但也不能說中國民族工業一些也沒有發展的可能……』

這就是我們直到現在，還要承認的『帝國主義相對的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的結論！

據任信探員的意見，我們不該根據理論和事實來說明『中國民族工業幼稚』（說中國民族工業幼稚並不是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幼稚），應當隨意誇大說：『中國民族工業是無限的『強大』纔能表現『民族精神』！應該像『標榜』自己著作的如何『宏深博大』一樣，來替中國資產階級『吹大炮』！』

我們的博學多才之士，假使以中國民族工業中之最發達的部門僅佔『百分之二十八資本』之紡績業來證明『中國民族工業』不是『幼稚』，想『希望讀者能舉一反三』，我們還抱憾沒有『聞一知十』的讀者，會瞭解他所說的話全是『牛頭對不着馬嘴』！若說，帝國主義不是『相對的阻礙』中國民族工業，那很顯然地、無異說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工業之間不存在任何盾矛。那就是中國民族工業一點不受帝國主義的『阻礙』，而是，『中、外一視同仁』，『共存共榮』（任氏的結論——作者）到底！

這是怎樣糊塗與荒謬！想冒充托洛斯基理論的繼承者的偵探先生，他竟然不但忘記了馬克思的基本學說，甚至於忘記了托洛斯基本人的意見。托氏說：對於『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之『中國資產階級』『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對工人和貧農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後一分鐘內，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這並不是說中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沒有

衝突；不過沒有比資產階級與工人和貧農之間的衝突爲甚罷了。假使，中國民族工業是同帝國主義『共存共榮』沒有任何『阻礙』和『矛盾』存在其間，那末，我們將無法了解和說明他們彼此之間的『衝突』。假使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一些也不受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控制而可與牠『分庭抗禮』，那末，我們將不能解答：『整個經濟前途，却是愈益殖民地化』，（中國經濟研究 P.89）這一段帶有所謂『先天』結論臭味的名言！

我們知道，中國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立場看來，同是向着發展和擴大剩餘價值來源的道路走，彼此是同一體，而非『對立物』；但因爲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力向國際發展，而矛盾由民族限界內發生，於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於以造成，關稅障壁便成爲阻礙全世界生產力和抵抗外國資產階級唯一的武器。所以，若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階級特性和無產階級最澈底的國際主義之階級特性同一看待，相持并論，他一定不會了解，『帝國主義

大戰』何以發生，資本主義世界的『自由競爭』何自而來？并不能了解帝國主義何以要來操縱中國經濟命脈和把持中國關稅制度。所以，托氏所說：『中國所緊要的，就是要有國家統一與經濟獨立，就是關稅自主。或更正確的說：對外資的獨佔。這對於中國即表示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我們從這裏可補充說一句：這就是表示解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範圍內』與中國民族的『矛盾』、『衝突』和『阻礙』。這是『婢學夫人』的『過左』先生們所不懂的！

他竟把托洛斯基所說：『外國帝國在中國內部生活上是一個直接的因素』一句話中，把『直接因素』完全誤解為『絕對』和『基本』的因素一樣。好像『唯我獨尊』的發見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其實，這并不『新奇』；而且，將帝國主義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大有視爲『喧賓奪主』之概；這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據他們的高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中國經濟研究 P.84.）這豈但離開馬克思主義三萬八千里！

這好像沒有帝國主義則中國資本主義永無發展的希望，似乎中國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毫無『內在』的因素！其實，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固然，是受了帝國主義侵入的推動而加劇和促成了這個發展的過程；而中國長期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發展，尤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必不可少的『內在』而『基本』的因素。有了這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必要前提』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即沒有帝國主義的『外鑠』，牠也會按着社會發展一般的必然法則而發展起來的！這個『內在』的發展與在『外鑠』幫忙之下的發展，只有速度快慢之差程度高低之比，而不是『能』與『不能』之別呵！歐洲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從沒有『帝國主義』的時代就按『內在』的公律發展了，而且發展了自己的『帝國主義』！

『不知所云』？『云人所知』？

任氏『中國經濟研究』大家，為要證明他自己『見解超羣』（？）起見，於是

便『大放厥詞』於下：

『革命左派的人（按指作者本人——作者）所爭的，只指出了過去有發展一點，現在則似乎不知所云？』（中國經濟研究 P.135）

實在這位大研究家自己祇看見作者的文章『前半』和『後半』，對於『中間一半』則似乎不知所云？并且連前、後兩段的意思也『不知所云』云云！你看他製造『阿莫尼亞』罷：

『他（指作者本人——作者）還是同別人一樣，東抄西襲，堆了許多不相干的統計。大都是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一年的；主要的是表明歐戰期間中國工業的發展，而不是證明戰前後若干年發展的情形。這樣便恰好證明了別人的主張：只有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的大戰關係纔是中國工業的黃金時代。於此，我且引點他的說話：

『我們試舉從一九一三——一九二一年，帝國主義輸入中國機器的

增加，便足證明他們不但沒有方法阻止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加緊向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反而輸入進步的資本主義技術來促成這個過程的。（中間隔了『不過』一十有一個頁，他接着引下——作者）

『機械論者以歐戰和排貨作基本的原由來解釋中國民族輕工業的發展……他們根本不了解戰爭，排貨乃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反而把這些現象來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命！』（動力N^o2.P.P. 12——22）

『這不獨沒有推翻別人的主張，反而掘毀了自己論據的基礎。……這無異掌了自己的嘴！』（中國經濟研究 P.P.231——233）

荒唐無恥至於此極！我們在動力N^o2.十二頁中一段（即任某所引的前一段——作者）意見，主要的是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受帝國主義勢力的束縛，並且在後面還舉出一九〇二——一九二〇年在中國銀行的發展和一九一九

到二五年，并說到去年紡織業仍是繼續發達，這一切統計都是用以證明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在三十年內都是向上發展的趨勢。（自然！我們在雜誌上發表的只是兩篇論文，并不是有『五大卷』的經濟『名著』（？）所謂『中國經濟研究』，材料搜集的不充分，自不待說。）但是，誰人能夠放膽地否認那些是，『不相干的統計』呢？那些統計是『掘毀自己論據的基礎』嗎？那些統計難道就因為別人說過這幾年中是歐戰關係，於是就失去證明資本主義發展的價值和作用嗎？甚至於與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不相干』的嗎？！我們要問：據高明的任老爺的意見我們所舉的一九一三——一九二一年的統計既是『不相干』，那末，要證明在一九一三——一九二一年以內，中國資本主義也是發展，到底要在這幾年內找出什麼樣子的統計，纔是『相干』的呢？這到底要『掌』誰個的『嘴』！蒲列哈洛夫這正如所說，輕氣球向上飛騰和浮動不足打破『引力法則』一樣。

至於我們在上述雜誌二十二頁中一段（即任某所引的後一段——作者）特別是接着我們舉出一九一五——一九二五年中國紡績業的發展，并附帶批評『新修正派』方法論上的錯誤，而且接着就舉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之紡績業的進步趨勢。他如何這樣地可憐，說我們『沒有推翻別人的主張』呢？難道任先生還相信在一九一三——一九二四年以內，應當拿『帝國主義戰爭』和『排貨運動』來代替我們所舉的從一九一三——一九二四年的機器進口表，而『當作基本的原來解釋中國民族輕工業的發展』嗎？！

很難得而且很感謝！任先生製了一個很詳盡的『近五年各種機器進口的比較』表，因為，牠可以供給和幫助我們做研究的材料不少。這個表在術技上的工作雖好，但在方法上和作用上亦不外『云人所知』云云！甚至於可說：『云』所謂『不知所云？』之『人所知』云云。

『錯誤』不在於『同樣是放鬆了反對剝削制度』，而在於『尋章摘句』，

故爲挑剔』與曲解『革命』的意義。

讀者再看他對我們所指出的所謂『錯誤』罷！

『然而反對修正派的人，指責修正派拿「剝削形式做基本的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因而「不得不專去剝削關係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一切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鬥爭。簡單的例子就是：不沒收富農土地，不沒收資本家財產，」(動力 N. S. P. G. I.) 這裏雙方(?) 均是錯誤的。被指責者的錯誤不在專去剝削關係上去革命，而在未能堅決的站在被剝削方面，澈底反對剝削制度。指責人者的錯誤，亦同樣是放鬆了反對剝削的關係。你看他說「反映到……一切策略都是爲減輕剝削程度而鬥爭」一語，當可明瞭他是不理解由減輕剝削乃至澈底推翻剝削制度的革命意義和過程。假使說革命的策略不爲減輕剝削乃至推翻剝削制度和壓迫而鬥爭，難道是爲了擁護牠而鬥爭嗎？革命而不專於反對剝削乃至壓迫，

又專於反對什麼呢？革命根本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之剝削的行爲。」

（中國經濟研究 P.319 可惜！在最後一句話中，把他所有的一切：『通』、『博』、『大』、『有研究』、『有經驗』、『有理論』、『非常科學』、『非常精審』、『非常正確』、『非常妥當』、『有歷史價值』和『有革命價值』的『著作』以及『重新建立的理論』。『自信』通通破產了！——作者。）

任老先生閣下，這段意見真如『懸壺瀉水』灑灑洋洋，大概是他生平得意傑作罷！很可憾的！此中不但有『斷章取義』之嫌，而露出了『機械論』和『形式論』以及『行爲』主義的長尾巴！

我們是否反對剝削制度呢？反對的！是否承認小的鬥爭如『加工』、『減時』、『抗租』、『抗稅』等等對於革命有意義呢？承認的！我們在文章中是否只主張『沒收富農土地』，『沒有資本家財產』而反對一切較小的鬥爭呢？我們曾在『簡單的例子就是……』下面接着說：『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按指「新修正

派——作者）所認的封建剝削太厲害了，資產階級只要他們實現八小時的工作制度便夠了，因為八小時制的剝削沒有地租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那樣厲害，所以是允許的！」（動力之2.P.61）讀者如審慎一看便可了解我們中心的意見。假使我們譏笑『新思潮派』說他們『允許』『八小時的工作制』的『實現』而滿意，那就很明白地，我們認為單單『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是『不夠』的！這完全表現我們主張在革命應該要比『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也正是更『堅決的站在被剝削方面，澈底反對剝削制度』，是要更進一步，並不是說，不要『實現八小時工作制鬥爭』。難道認『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為不夠而進一步要求『沒收富農土地』和『資本家財產』的人，『是放鬆了反對剝削的關係』嗎？這不但是理論上說不通，連造謠者亦無所施其技！這還不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和『尋章摘句，故為挑剔』嗎？！

好了！照任老師的高超見解：『革命根本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之剝削的

行爲』這就是他『非常』與『自信』地『理解』了『革命的意義』。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革命乃是代表社會新生產力利益的進步階級，進行改革足以阻礙新生產力發展之舊制度的鬥爭。牠在事實上的表現，便是：國家政權落到一個『新』的階級手裏。『反對剝削』乃至壓迫不過是包含革命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罷了。這個意見，我們不知道『不多』想『做馬克思主義門徒的機械論者和形式論者以爲如何！？假使『革命根本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之剝削的行爲』，那末，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已被推倒的封建貴族在復辟運動中之反對資產階級的『剝削者之剝削行爲』是革命的麼？那末，蘇聯已被推倒逃亡者的資產階級和新富人（Nepman）及富農之企圖復辟，進行反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者之剝削行爲』是革命的麼？十八世紀西歐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制度和壓迫的鬥爭，他並沒有推翻剝削制度和壓迫，而且取得政權之後還要『爲了擁護牠（剝削）而鬥爭』；難道你們能否認其歷史和革命的意義嗎？你們問我：『革命而不專於反對剝削乃

至壓迫，不專於反對什麼呢？」我們的回答是：「革命是不專於反對剝削乃至瀕道；本「牠」根本」上除「爲減輕剝削乃至推翻剝削制度和壓迫而鬥爭」之外還要爲建立自己的統治而鬥爭！」你們不但中了「新修正派」之「機械論」和「形式論」的遺毒，而受了資產階級應聲蟲之郭任遠博士「行爲心理學」的影響；於是你們的爭鬥的最高峯是：「專於反對剝削乃至壓迫」爲止！你們「根本上」是「專於」『反剝削者之剝削的行爲』；我們認爲你們『根本上』與其論敵——革命派右翼——修正主義者同出一轍。』（中國經濟研究『劉序』P.13）奇哉！奇哉！——你們竟然露出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馬脚』來了。

『抄襲不能解決問題』；『總清算』也還未『清算』到『問題』本身。

『隔靴搔癢』完全表現了『不知所云』？你看他又來鬧笑話了，這位任『清算』大家說：

『不久以前又有人根據一些販運來的理論，於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時，

有這樣的說話：

『一旦世界大戰爆發，或美孚、亞細亞煤油公司倒閉，我們以為不但上海、漢口、廣東、天津要發生問題，即極偏僻的農村都要引起騷動的。』(動力N—1.P.34.)

『事實上，是否只因煤油一件商品的來源斷絕，就會引起全中國的大問題，甚至於農村還要騷動起來，我們沒有當前的事實，不敢就機械的贊同。但人造錠在戰前已深入了全國各地，比目下的煤油推銷還要普遍，而大戰發生人造錠絕跡，也沒有大不了的問題發生，亦可見這種販運來的主張不切實際。』(中國經濟研究 P.262)

如果不是輕佻的人，他一定不會『走馬看花』的來讀我們的論文。很明白地，我們在動力上面所寫的這段意見，正是要人們能夠『舉一反三』的去注意資本主義關係的領導作用。我們舉『大戰』和『煤油』爲例，不過着重於說明上面一句

重要的結論：『鄉村再生產行程不但靠城市的再生產行程，並且依賴於國際市場交換的順利進行。』(動力N。I.P.33) 而且我們在上面還說過：『中國很僻遠的鄉村中都要購買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業品』，以此來說明城市領導農村，也許比迂腐的數學經濟研究家舉個『民九及十八兩年各省暨國全平均每人所佔進出商口品數量的比較表』來證明中國不落後、不是封建制度要實際些罷。這位算術家既不能用數字來推翻我們所主張的中國城市領導農村再生產行程的結論，反而，來傍敲側擊說一些不關問題痛癢的話說：『是否只因煤油一件商品來源斷絕等等……』。『不敢贊同』只聽你們的便，難道你敢來否認在今日中國農村中不需要『煤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業品』，而可以進行其再生產(這自然就一般的說)嗎？如果到了世界二次大戰爆發，或亞細亞、美孚公司倒閉的時候，即已經不是『只』煤油一件商品的來源斷絕的時候了。這是十足表示他們不懂現象聯繫的機械論者。也許有學院主義的人們，因為這個

問題，便去研究『煤油』和『人造錠』是否『商品』，並且有煩瑣的哲學家們，很玄學地去推想，也許『人造錠』是一件染料，『煤油』是一件日常生活品，一日『煤油來源斷絕』，可代以薪炭，洋臘燭，茶油，魚油等等，也許有數學家很肯精密而詳細的去計算『煤油』與『人造錠』深入中國內地的『比較表』。但這與本題的研究都不生重大關係！假定，說『人造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不影響到中國農村的理論『切於實際』，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最少這個中國已經是第一次大戰後十七八年，甚至不到二十三十年不等的另一中國，如果再應用這個『切於實際』的理論說：『人造錠』和『煤油』不至影響於中國農村，還是『切於實際』嗎？二十年前的『實際』與二十年後的『實際』，也許有些『不同』罷！就此小小的一點，便證明他是沒有歷史眼光的『形式論者』；他們根本不了解在資本主義生產佔支配的地位的社會內，一切社會再生產行程必須經過『交換』纔可完成。他不了解我們舉煤油的例子，正是說明交換關係的發達及中國與國際

聯繫之密切。『研究』云乎哉?!『錯誤』云乎哉?!『清算』云乎哉!?

這位好像有『重新建立理論』可能，而討厭『先天結論』的創造(?)大家，他不滿意我們的『抄襲』和『販運』，於是把我們從盧賓斯坦論文中所節取的一段意見，以其『不能解決問題』，是故大費氣力一一抄寫出來，并加以批評，俾觀『面面』。茲錄原文和這位批評家的闢論於下：

『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中——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前期關係的遺跡，與其牠形形色色異常複雜的封建殘餘……

『由上面生產技術的複雜，自然反映社會內部有各種各式的生產關係和社會經濟層次……再到新式工業與後階段的財政資本。(動力)』

P. 6—7)

『從上面所謂研究看來，可以比喻劉姥姥初入大觀園，簡直無所措手足。只見着無奇不有，當然只有『目迷五色』了!……我們但只問：

(一)就交通工具看來，到底的新式是輪船火車佔優勢，抑或舊式的帆船和手搖車佔優勢？(二)就工業說來，到底是手工業的產品支配了整個的經濟生活，抑或機械工業的產品？(三)就人物看來，到底是戴瓜皮小帽士頭士腦的鄉下人居於治者的地位，抑或戴博士呢帽大腹便便的資產階級居於治者的地位？』(中國經濟研究P. P. 262—263)

問題提出的幼稚可笑，『這裏我們還不同他們計較』，但我們只說他『不懂』什麼『所謂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不但從具體中去找尋抽象法則；並且可以應用抽象的法則去預測具體的實際，不但由結果中去探求原因，并在找出原因時，可預言其結果。假使人們承認原因與結果之聯繫性必然性，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和歷史唯物論之可以應用到中國社會的研究時，那末，我們將大膽相信根據馬克思學說中的基本原理和科學結論，就中國社會現象的觀察，便可以了解其經濟原因。這是我們必需利用被『算術派』的馬克思主

義所不齒的『先天結論』。我們此地不會預備出版『五大卷』的什麼『中國經濟研究』名著，因此，零碎的統計問題，此時，還是請統計學家的『中國經濟研究』博士去搜集，比較，『孰多孰少』，孰佔優勢？孰佔劣勢？其實，如果不懂得何者『所謂研究』的人，縱使他堆集了無數統計的材料，始終還免不了，『目迷五色』的！由我們抽象的研究看來，很容易答覆他們所認為不可答覆的三個問題。我們由中國社會內部一般基本的經濟現象看來：銀行和的商業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關係社會分工的發達，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危機，生產集中和鄉村的土地集中以及階級向兩極分化，政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等等完全支配了整個社會生活，我們在理論上便可結論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支配了全部經濟生活。』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居於領導的地位。因此，我們回答：根據以上的許多基本現象看來在目前中國；不管是新式輪船、火車和帆船、手搖車，在『數量』上之比例如

何，但領導全社會再生產行程，無疑的是新式的資本主義技術。不管手工業的產品和機械工業的產品在「數量」上的比例如何，無疑的是，資本主義式爲交換而生產的商品支配了整個經濟生活。不管戴博士呢帽與瓜皮小帽的人物孰較「文明」，無疑議地，是城市的工商業者的資本家和鄉村的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我們一概稱之爲資產階級的人物，居於治者的地位。他們坐在統治地位的金交椅上，不但有戴博士呢帽大腹便便的紳商富賈并且也有戴瓜皮小帽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之間團團的富家翁呢！

實際上，我們在動力(N. P. I. G. T.)上面所採用盧賓斯坦對於中國社會現象的描寫，並不是用以解決經濟上基本問題，我決定在中國經濟生活中，何種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成分居支配地位，而是藉此形容中國內部『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複雜，以指摘『新思潮派』不應把中國社會內部看作只有兩種經濟的成分：資本主義的經濟和封建經濟，而忽略其他經濟成分。而他們却不

領會這個意思，反來大瞎鬧而特瞎鬧一場。我們可說，任你『劉姥姥』們如何圓滑、詭詐，你們始終不能否認中國社會內部生產技術和經濟結構的複雜這一回事！你們難道敢來否認盧賓斯坦所描寫的這一段現象在中國沒有嗎？你們難道敢說這些所描寫的現象和事實是『不切實際』的嗎？！

從機會主義者出身的人們，任他口頭上說得如何漂亮，無論怎樣，他是脫不了，剝削立場、數量觀點、形式邏輯、機械主義的圈套的！他們始終會以數學運動來代替物理運動的說明，而把唯物辯證法拋到『九霄雲外』去的！

一點『方法』不懂也配得上『重新建立理論』？

『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如果是至理名言，那末，我們現在說：『老機會主義者出身的叛徒永遠不會有革命的新創造！』最少也包含大部分的真理。

事實却在我們意料之內，『人們不但機械的舉出許多「孤立」而「個別」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和責難我們』（動力之。I. P. 2）並且還採用『算術

家的統計方法」來代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抽象研究與具體的歷史說明；其了解之皮毛與論據的膚淺自不必說，然其態度之浮誇與出言的不遜，更是可嗤可恥！現在我們就開始對這些偵探的理論家冒大不韙之罪加以「方法論」上的批評罷！

1. 所謂「把握着問題的中心」。

中國人很奇怪，愈是最不漂亮的人，他便愈會說「漂亮話」；他責難別人：只憑「先天理論」，沒有「真知灼見」，其實他自己便是一無所知的抄襲了別人的結論來作自己的意見；罵別人爲「反革命」、「叛徒」、「機會主義者」；而自己便是原原本本的「反革命」、「叛徒」、「機會主義者」。這就是中國人所特有的「掩耳盜鈴」的本色！

你們看「中國經濟研究」專家的同伴和摯友劉某，怎樣地爲他的朋友介紹「中國經濟研究」大著的呀！他說：

『牠（指中國經濟研究一書——作者）從帝國主義商品之輸入，說明中國經濟的變動，以致舊的封建經濟破壞，新的資本經濟興起，人們的研究，應以帝國主義爲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中國經濟研究，劉序P. 14.——）

至於本書的作者怎樣說明他之『把握着問題的中心』呢？他說：

『不管你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如何估價，總不能不承認近八十年中國纔有急劇的變動，而這一變動的原動力便是帝國主義經濟的侵入。由此纔有新的都市以外與世界市場內與窮鄉僻野相聯繫的新式商業、新式農業、新式工業，以及金融經濟。這絕不是由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誘導出來的。所以就把握着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亦不能說明現在的經濟性質，必須把握着帝國主義問題……』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鑲……』（同上，P. P.

從上面高明的儻論中，我們可以把牠歸納兩點加以研究，研究，以期達到『把握着問題的中心』之願望！由他們的意見看來。

第一，『帝國主義問題』是研究中國主義發展的『中心問題』。

第二，『舊的封建經濟破壞，新的資本經濟興起。』只有『從帝國主義商品輸入』之後纔有可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外鑠的』而不是內在的至於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絕不是』『誘導』『新的都市』，『新式商業，新式農業，新式工業』等等的要素。換句話說，就是，商業資本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樣看來，似乎這位博學的『中國經濟研究』大家，恐怕『把握』不着『問題的中心』罷。這個抓不着『中心』的結果，大概是因爲他自己也來牽就『先天』的結論之故，其實，他是不曾了解托洛斯基所說的：『外國帝國主義在

中國內部生活上是一個直接的因素。『先天的結論』；因此，背誦了這個『先天的結論』，到處找尋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影響的『現象』——即他們所謂，從『真知灼見』的事實中找尋理論——來代替一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與說明；於是免不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第一，什麼是『問題的中心』呢？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不是只看『現象』而是先從所謂『先天的結論』開始，作『抽象』之『方法論』上的探求。我們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方法』上，絕不能提出到底是『帝國主義問題』爲『中心』呢？或是中國『歷史上商業資本』爲『中心』呢？抑有其他別的『中心』呢？假使不信任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合乎實際真理的『先天的結論』，那末，他將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或者是考茨基主義者，伯恩斯坦主義者，卑斯麥主義者，或是叛徒！

我們所相信的『先天的結論』，就是『唯物史觀』的『結論』，我們在『方法』上

的第一個問題，應該研究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否按照『唯物史觀』中所探究出來的歷史公律發展？這是『問題的中心』，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社會經濟發展之『方法論』的『中心』！

中國在整個社會的發展上看來，牠也和其他一切國家的進化一樣，曾有過原始的共產主義制度、封建制度、以至於今天的資本主義制度；這是證明人們所鄙視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之『先天結論』的正確。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是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而不是研究『國際經濟』，那末，我們在『方法』上，必要以中國社會自身為研究的主體與對象；必須先把握着在目前中國經濟生活中那一種『社會法則』支配了人們生活。我們的『數學主義』的經濟研究家，即因為沒有歷史的眼光，於是不得不被外來的『現象』嚇倒；所以，把托洛斯基所說的『直接的因素』，誤解為『基本的因素』。因此，便完全否認中國商業資本的歷史意義。他只看見在『現象』上帝國主義的『外鑠』促進了中國社會轟轟烈烈之

『急劇的變動』，却看不見在『本質』上中國『內在』的資本主義發展勢力。中國資本主義之純粹由於『外鑠』的或『內在』的，抑是『內在』和『外鑠』的發展等等，這都不是『問題的中心』，而『問題的中心』就是要找尋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是否受資本主義制度基本公律所支配，中國整個社會再生產行程是否受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領導？目前主要的生產是否建立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社會再生產是否必需經過交換纔能完成，等等？全社會生產的基本出發點是否創造交換價值和剩餘價值？這個『問題的中心』是我們無研究方法和能力的『統計學家』所『把握不住』的！假使，我們只從『形式上』把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經濟生活，認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那根本是『舍本求末』之市儈的把握『問題的中心』，而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把握『問題的中心』！因為，他們僅是說明『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而不是說明中國是否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帝國主義的『外鑠』，可以『內在』發展嗎？

誰都不會否認近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是受『帝國主義經濟侵入』的巨大影響的。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作用和影響只是次要的、附帶的；而中國社會經濟內部自身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經濟前提和條件是主要的基本的因素。我們的認識是這樣：中國社會的發展有牠自己內部必然的公律，牠從前可以不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而從原始社會不斷地發展資本主義的初期；所以，在理論的研究上，我們可以從一切社會的觀察中可推論牠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影響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帝國主義僅僅是『促進』和『加速』這個發展過程的『直接因素』，而不是這個發展過程中的『絕對』的和『基本』的因素！在十八世紀以前，世界上還未發生帝國主義時期，我們若不把『暴力』、『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看做造成『資本主義生產』之原始積累的『前提』與『出發點』，那麼，我們將不能說明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究

竟從何而來？而我們『中國經濟研究』家却大膽地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看做與『問題的中心』不關的一件小事！他們毫無歷史眼光的認定：只是『從帝國主義商品之輸入』，『以致舊的封建經濟破壞，新的資本經濟興起』。這裏很顯然地，把帝國主義侵入當作中國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分水嶺』。據他們的意見如果沒有『帝國主義』，中國『舊的封建經濟』還不至『破壞』，『新的資本經濟』也不能『興起』。這是多麼荒唐無稽的呀！這樣不是說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以前中國還是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好像，『八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是『一點不動』，而『七十九年前一年』起便大動特動起來。怎麼沒有看見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發展對於中國封建制度之長期的『破壞』呢？怎麼沒有看見中國歷史上有過忽必烈之掠奪中歐，與『三保太監下西洋』等等事實呢？為什麼沒有看見到中國歷史上農民的暴動呢？為什麼沒有看見中國曾有長久的資本主義前期的手工工廠業的印刷業、製紙業、釀酒業、鑄鐵業、造船業、磁器業等

等的存在呢？假使，在中國沒有發展的交換關係，沒有商品經濟的基本前提，沒有發展的商業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又怎麼能夠輸入商品呢？假使，沒有因破產而失業的中國農民，中國人沒有對貨幣和外國商品交換的需要，帝國主義商品的『機器』和『資本』可以變成『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嗎？據他們的意見，必然會得出結論：以為沒有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便不會發展，這樣，必然會推論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論是不適於中國。這便是一切叛徒變節的基本原因和理論根源！

2. 瞧不起『統治階級』的『主觀』作用對於經濟性質的影響。

自命為『把握着問題的中心』的經濟研究家說：

『至於從統治階級的性質……為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同上 P.85）

這樣說話，真正是『毋乃太過滑稽』！據他們的意見，統治階級的主觀作

用，對於經濟性質是沒有關係的！列甯『毋乃太過滑稽』了，他以為，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內的協作社和在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內的協作社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和性質！在蘇聯的賃銀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賃銀制度也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和性質！蘇聯生產的組織化，和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組織化也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和性質。蘇聯的國有企業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和性質。哈哈！一個『中國經濟研究』大家，同時又是『重新建立理論』的『自信』者，竟連此A. B. C.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也不懂，這也『毋乃太過滑稽』了！

3. 一個『不知所以然』的『比較』法。

『比較』專家說：

『我們要估量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必須要有標準。第一我感覺得這個標準應該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看是誰個佔優勢……』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經濟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面的記載：

『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

	一八七五	一九〇五	一九一五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輪船	八五	九一	九三	九七	九八
帆船	一五	九	七	三	二
	100	100	100	100	100 (合計)

這位『工具』的『比較』專家，除了舉出這個最得意的比較表之外，還舉了不少『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比較表，無非是證明人們『先天的結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

我們太對不起了，也許說得『太過火』，因為，『英雄所見略同』，也許這位專家是由自己苦心孤詣研究的結論而不是『先天的結論』，不然，他也許是不會反對這個的！可惜！他既舉出了這些比較表，何以又不了解它的意義和內容

呢？因此，不得不使我們懷疑起來。

我們的『象徵』主義者，他只看到帆船『是封建的表徵』却不懂得『表徵』祇是形式的表現，這個『工具史觀』的立場好像和『新思潮派』是同一鼻孔出氣，同是機械的形式主義者！『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是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他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毫無歷史和進化的眼力，自鳴得意地以為舉出一些『數字』便認為『研究』；到圖書館去抄些『統計』就算得有『研究』嗎？實在離『研究』還差得很遠呵！懂得基本『理論』和『方法』是談不上實際研究的！大家很

明白地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從這裏怎樣可以看出『是誰個佔優勢』？怎樣足夠證明資本主義『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這一事實呢？怎樣可以作為『標準』呢？這等於沒有『比較』！難道一九二六年資本主義勢力佔九八％『噸』封建勢力佔二％『噸』麼？假定我們暫時允許這位『工具』崇拜者的比較方法，可以應用這個場合，那末，我們請他來用『交通工具』的比較法，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比較』，『比較』，『看是誰個佔優勢』？！那一種交通工具載噸數為多？我們以為，如果在實際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運輸的『交通工具』也是『火車』和『輪船』和資本主義國家『交通工具』一樣沒有區別；那麼這『比較』大家，又怎樣能夠顯其『比較』的本色呢？輪船與輪船比較，火車與火車比較麼？不然，應把飛機同火車、輪船比較，說『飛機』可以表現社會主義時

代的交通工具，輪船、火車『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資本主義的『表徵』，很可憾的！資本主義國家內也有『飛機』，那又怎麼辦呢？取消這個『比較』方法罷了，『毋乃太過滑稽』乎？

其實，上面所舉的統計表，和工廠產品和工廠產品的比較表都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即大生產吞併小生產）的趨勢。而不能用作表示，封建與資本主義勢力之誰佔優勢的標準。然而，我們的研究家不懂這個，於是便也把握不着統計的『中心』！可憐呵！費了不少心血，『研究』的結果還是如此，如此！不見『研究』，只見可憐的『噸數』！

4. 『不是東抄西襲』，而是『研究』的結果發現了卡爾·馬克思時代的『帝國主義』，

所謂『把握中心問題——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家說：

『這裏我們先要把唯物論大師對於中國經濟分析的方法摘錄出來：』

「當着機器生產踐着手工業而擴大，那末其發展一定是很可靠的。這一個時期能夠給出大批的利潤，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可惜在中國，這一個時期却便宜了其他國家，因為牠們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早過於中國。中國起得太遲了，這也就預先決定了牠今後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固然征服了舊有的生產方法，然而這一個過程却在帝國主義時代與殖民地政策之下進行的。」（原文見“Capital”，中文見宗華譯的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二七頁）

「這是他距今五十年前所昭示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亦即是在這裏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結構，應當把握着中心的帝國主義問題的原因。」（同上P.82）

不『拿教條來作鎮壓真理的符咒』的『中國經濟研究』專門家，引了這段似乎不是『教條』的所謂『唯物論大師』在彷彿『距今五十年前』好像『對於中國經濟

分析的方法摘錄』之後，幾乎令沒有『研究』而迷信『教條』的我們讀了以後，簡直驚破了膽！因為距今『五十年前』的馬克思竟然會預言到五十年後之『帝國主義時代』的中國！我們因為沒有『研究』，於是便懷疑起來，何以，馬克思有這樣神通廣大呢？隨後因為從沒有『研究』進而稍微『研究』，『研究』；果然出乎意料之外，發現了這段意見有一大半是『帝國主義時代』一九二八年即『距今三年前』的俄國『馬克思』說的，那『距今五十年前』的『唯物論大師』德國的卡爾·馬克思祇說得一小半。馬克思只是說：『當着機器生產踐着手工業而擴大，那麼其發展一定是很可靠的。這一個時期能夠給出大批的利潤，所以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句話為止，而後面接着：『可惜在中國，……然而這一個過程却在帝國主義時代與殖民地政策之下進行的。』這段話是『被人誤認為馬克思』的俄國馬札爾亞說的。

宗華的譯文大意並沒有錯，但文句不大明顯，我們在這裏無須來作義務校

對；只是要說說這一段『引語』中，馬克思和馬札爾亞的根本意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係說明機器生產既已排擠了手工業而擴大，牠的發展是靠得住的。因為，在這個時期內可以獲得大批的利潤；這是就一般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初期而言，並不是『在距今五十年前』就已『昭示我們研究中經濟的關鍵，……應當把握着中心的帝國主義問題。』馬札爾亞引用了這句意見之後，不過接着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排除手工業的過程來得太遲了，因為牠在帝國主義時代和殖民地政策之下進行，而有決絕意義的第一個時期，可以獲得大批的利潤，却為比牠先蹈進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其他國家沾光了的。然而，博大的『中國經濟研究』特等專家却連這點小小的事體也忽略了。也許是『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罷。距今二千年前尚有『孔子貌似陽虎』的故事，難道，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可以有『馬克思名誤馬札爾亞』的笑話麼？其實，不是把馬札爾亞認為馬克思，而是把馬札爾亞的話認為馬克思

的話。這『毋乃太過滑稽了』，此正如任先生自己所說：『老僧入定，不問寺外的雨雨風風』。

我們看見了馬克思時代的『帝國主義』，以為馬克思現在還活着。那裏曉得這位姓馬的乃是二十世紀的馬札爾亞先生，而不是『距今五十年前』沒有說過後半話的那位馬克思。

這是何等可憐、可笑、不要臉的東西呀！他罵這個『東抄』，斥那個『西襲』，自己連『抄襲』都不行。俗諺說：『盤書過紙也要三分通』，這樣不學無術的小傢伙恐怕并這『三分通』也沒有的。纔會惹起如此離奇的笑話來！天下之大，何奇不有？！

本來引證的錯誤誰都會發生，因為他這些老先生過於張大其詞，怎樣自誇說：『牠（中國經濟研究一書——作者）的方法，非常科學；牠的材料，非常精審；牠的說明，非常正確；牠的結論，非常妥當。』（全上P.5）

既是非常『科學』，『精審』，『正確』，『妥當』；何以在這個地方，不一『科學』，『精審』，『正確』，『妥當』呢？他們在這段下面還加上註腳：『原本見（Capital）』當然，是把宗華的譯文和資本論校對過的，何以，不會發現出來呢？不然便是看不懂資本論，何以不請自己親密的朋友代看一下呢？其實，在這裏『小小』的事實中，便表現了他們並沒有見過資本論的面，並且，毫無半點『研究』，不然，終不至於能夠『製作』許多所謂『精煉』的『統計』，對此『小小』的『考證』的工夫都沒有用過！看到馬克思會說『帝國主義』時代的事體等等些不會引起懷疑嗎？

這樣看來，我很相信有一位知道這位『中國經濟研究』家的我的朋友會告訴我，他的『劉序』也是他自己做的，總有三四分可信。想這樣爲自己作『廣告』，大吹大擂，向社會招搖撞騙的市井無賴，我們能夠留他說話的餘地麼？！本來想欺騙世人，最後却欺騙了自己，羞耶不羞？！

這樣一竅不通，不管你們要想出版五大專集的『中國經濟研究』，即出版五百部『中國經濟研究』專集，也是無用的呵！

四

我們現在要來作個結束。

馬克思主義之偉大，就在於牠是全人類實際生活之真實的反映。牠的創造是富有時代性和條件性。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擴大與發展，不但需要『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並且還需要具有正確認識這個時代特性，而同時又是這個時代產物之馬克思主義之真正實行家和擔負者天才的列甯。

歷史上有過不少的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而其實是不肖門徒如伯恩斯坦、考茨基、蒲格丹洛夫、盧拿卡爾斯基等等。他們都想從馬克思以外另闢途徑，美其名曰：『修正』或『擴展』馬克思主義；這些先生們都曾經自負有創造天才

的『新理論』的『建立者』。然而，不但歷史的條件限制了他們，並且他們自身的才智也限制了他們自己；於是許多『想』『改造』馬克思主義偉大事業的理論家，始終都要在這個『改造』的進程中『叛變』了，『沒落』了。

中國有許多人，不但『自信』太過，而且『膽大妄爲』！他們開口閉口是要『重新建立理論』，鄙薄所謂『先天理論』，這安得不種下他們變節的深根呢？理論需要發揮和發展的，但這一個人並不是由於某一個人的主觀『自信』可以做到，而是含有十有分深厚的客觀基礎的！

『新修正派』人們如果錯誤是不『自覺的』，那末，俄羅斯十月革命十餘年之偉大創造，無產階級真正文化與物質力量基礎的增加，是足以挽救他們重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而『過左』的『偵探』而實是叛徒，我們不管他口頭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而始終對他們抱『絕望』的態度！因為，我們所求於他的，不是他的『已經死滅去了』的革命性，而是不要他再去『告密』，然而，他的『告密』事實

還是可以，『重新建立的』必要呵！

這樣，『新修正派』從左向右跑；『過左』的叛徒從絕路故意向左轉；因此，他們必然地在理論上是『異曲同工』，在結果上要趨於在機會主義道路上『殊途同歸』！

第一，他們在『形式論理學』孤立應用的立場上，完全是同意的、一致的，因為，他們一致承認；在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開始可以提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這一命題，是『合理的』，『並沒有錯』！

第二，他們在『技術觀』的立場上是一樣的，『新思潮派』認為因為中國鄉村中沒有新的生產技術所以不能發生資本主義關係；『過左』的先生們，只要從『象徵』上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比較，便可斷定資本主義與封建勢力之孰佔支配，這是同樣的『工具』的崇拜者！

第三，他們在『剝削』的立場上是一致的，『新修正派』以剝削的關係決定一

切問題，『過左』的先生們是承認：『革命根本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之剝削行爲』！

第四，『否認階級的主觀作用』是一致的，『新修正派』以『客觀任務論』來說明革命性質之不依賴於階級相互關係；而『過左』的人們是說：『至於從統治階級的性質……爲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

第五，偏面的見解他們是一樣的，『新修正派』只看到中國封建的勢力，而忽視了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有直接的影響；而『過左』的一派，却只看見帝國主義是『直接因素』，而完完全全不顧到『內在』的發展規律性、必然性與民族特性。因此，一方面是『外壓論』說，中國資本主義是受帝國主義的束縛和阻礙不能夠發展；一方面『外鑠論』是說，中國資本主義只由於『外鑠』纔發展起來，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工業之間是沒有矛盾和衝突的，他們是『一視同仁』的看這兩者是『共存共榮』的！

總之，他們之間，『新修正派』是從『現象』出發，只依直覺去研究和觀察問題；『過左』的叛徒是以『算術統計』的方法去研究和推論孤立的現象。兩者，一方面是象徵主義者，一方面是數學的唯物論者。他們一樣地不懂歷史過程，不懂社會聯繫，不懂形式與內容，局部與總體的關係；總說一句話：他們都是不懂『唯物辯證法』的，形式主義者，機械論者之最危險的『機會主義者』。

他們的錯誤是『半斤和八兩』之差，我們今後應毫不容情地，不屈不撓地，站在正確的辯證法立場上向這兩方反動思潮開火！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於上海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政治

周佛海著	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	十一版	實價六角
周佛海著	三民主義的基本問題	四版	實價六角
薩孟武著	三民主義政治學	三版	實價九角
薩孟武著	政治學之基礎知識	五版	實價四角
樊仲雲編	政黨論之基礎知識	卽出	
鄧初民著	國家論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陶希聖譯	國家論		實價六角
樊仲雲著	最近之國際政治	五版	實價一元
樊仲雲著	最近之國際政治續編	卽出	
樊仲雲著	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	再版	實價五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吳其祥著	帝國主義與國際經濟		實價八角
馬哲民著	帝國主義之基礎知識	四版	實價四角
楊允修譯	近代世界史	卽出	
張永懋等譯	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	卽出	
王斐蓀譯	帝國主義之諸種學說	卽出	
施伏量譯	歐美無產政黨研究	再版	實價六角
施伏量譯	日本無產政黨研究	三版	實價五角
陳寶驊譯	法西斯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實價四角
邢墨卿譯	法西斯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實價四角
施伏量譯	蘇俄政治制度	三版	實價九角
高晶齋著	蘇俄黨爭之解剖	再版	實價四角
胡慶育譯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再版	實價五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陶希聖著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再版	實價九角
				樊仲雲編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再版	實價五角
				陶希聖編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一元八角
				劉鏡園譯	革命與反革命		實價七角
				劉隱譯	法國革命與階級鬥爭		實價四角
				文舉著	各國革命史	三版	實價八角
				羅超彥譯	行政學總論		實價七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經濟

薩孟武等譯	各國經濟史		三元六角
陶希聖 樊仲雲譯	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		實價二元
周佛海編	經濟理論之基礎知識		實價八角
薩孟武編	財政學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朱新繁著	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沒落		實價六角
吳樹仁譯	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即出	
陳寶驊 邢墨卿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		實價五角
薩孟武 邢墨卿譯	馬克思十二講	即出	
黃澹哉譯	資本主義的浪費		實價七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社會

李鶴鳴編	社會學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熊得山編	社會主義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施伏量編	社會問題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王斐蓀譯	社會進化論	再版	實價六角
王斐蓀譯	社會組織論	卽出	
王斐蓀著	三民主義社會學	五版	實價二角
薩孟武譯	社會主義社會學	三版	實價九角
薩孟武譯	社會革命論		實價六角
李膺揚譯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再版	實價八角
鄧毅譯	農業的社會化		實價七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李進之譯	薩孟武譯	陶希聖著	樊仲雲編	李之鷗譯	施伏量譯	周谷城著	周谷城著	周谷城著	陶希聖著	陳寶驊譯
革命的發	法律與階級鬥爭	法律學之基礎知識	婦女解放史	帝國主義與文化	辯證法與資本制度	中國社會之前途	中國社會之變化	中國社會的結構	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	進化論與階級問題
		再版	再版	三版		即出	即出		四版	
實價七角	實價七角	實價四角	實價二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一元二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三角

新生命書局圖書目錄

陶希聖著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實價四角

資耀華譯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卽出

胡一貫譯 唯物史觀的改造 實價五角

余祥森譯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卽出

高品齋譯 由唯心論到唯物論 實價二角